

小加德尔

贝塞拉小姐是住在拐弯处的大夫的姐姐。她要托里比奥把狗带到附近的公园里去遛遛，但他推辞了。这孩子十七岁了，个子老高。脸上还略带稚气。一双眼睛又大又黑，颇讨人喜欢。他是个孤儿，他的姨父把他从土库曼带到这里来，同他们一起住在巴拉圭大街的公寓里。

托里比奥喜欢在帕勒莫区闲逛。他在阿尔维亚尔大街上认识了几个小青年，他们是卖长毛小狗的。这些狗的脖子上装饰着红色或蓝色的带子，陈列在街心公园的草地上。

汽车停了下来，妇女发出温柔的尖叫声，男人则询问价钱。有时候，女人对狗的赞美和男人的慷慨大方有幸地巧合了。托里比奥目睹了几起买狗交易，价钱贵得离奇，因为到那时为止，他一直以为小狗只是作为礼物送人的。

托里比奥走上前去按了大夫家包了铜皮的大门上的铃，告诉老太太说，他愿意把狗带出去遛遛。那位老处女看到这孩子终于答应替她办事，显得很高兴。她说：

“以前是由女仆把狗带出去路街的。但现在她要照看门诊室。可怜的小东西关在家里憋得难受。”

她把布基交给了他，那狗的脖子上挂着一条崭新的皮带。托里比奥取道萨尔盖洛大街，随后来到阿尔维亚尔大街。布基是一只好玩的猎狐的小狗，眼神聪明伶俐。但是谁也没有注意到它。傍晚时分，托里比奥把狗交还主人。主人给了他五角钱酬金。

第二天，他又把狗带出来遛街，也是无人问津。在他穿过赫拉女神大街回家的路上，一位衣着时髦、穿灰色外衣、戴红色礼帽的妇女停下步来察看那只小狗。托里比奥终于遇到了一位对那条狗感兴趣的人。他决意把狗卖掉，然后回去告诉他们说，狗在帕勒莫大街上走失了。

那妇女仔细观察着小狗，越看越来劲。这只狗是一个新品种，护理得很好。她俯下身去抚摸小狗，一面斜眼看了看那个小青年：裤子是旧的，衬衣褪了色。看来他不象是这只如此漂亮的狗的主人。托里比奥明白，那位贵妇人看得上狗而看不上他。

“这小狗是谁的？”那女人问道。

“是我的。”年轻人回答。

“这狗怎么到你的手里的？”

“老早以前我拣来的。听说这狗很名贵。您喜欢吗，小姐？”小伙子怀着希望问道。

“你住得远吗？”女人问道，语气勉强而轻蔑。而托里比奥则对她撒谎。他总是撒谎，不是逢场作戏，而是撒谎成性。

“我住在阿维亚内达大街。”

“那很远哪。”

“是很远，小姐。”

时值夏季，小狗张嘴喘着粗气。那女人又摸了摸小狗。布基也报以感激的目光，几乎使那女人掉下激动的眼泪。她犹豫了一会儿，说道：

“你为什么不坐出租汽车？”

“小姐，坐出租汽车？我没钱……”

他默不作声，等候那贵妇人发善心。那女人打开钱包，取出一张钞票，大声说：

“我们截一辆出租汽车，你就坐上。天气这么热，小狗走不到阿维亚内达大街的。”

她弯下身去又摸了摸小狗，随即叫住一辆出租汽车，要求司机准许年轻人带着小狗上车，并且把一张五比索的钞票塞到年轻人的手里。

托里比奥坐上了车，把小狗放在腿上。他们取道迪亚斯上校大街，这是一条宽阔的林荫大道，两旁高楼林立。大街从国家监狱旁边通过。托里比奥扭过头来，看见在高墙顶上踱来踱去的哨兵。

他想象自己正在这条大街上奔跑，在枪声中扑倒在一棵树旁。他借着这棵树的掩护，下令自己的人开火。所有这段街区的小青年都听他指挥，有比鲁洛、加里巴尔第、卡米沙等人。他们穿着长外衣，戴着外国军团的军帽。这一回守卫这座大院的是阿拉伯人。

托里比奥和他的手下人百发百中，毫不费力地打败了这些衣袍飘忽的阿拉伯人，他们的缠头巾在国家监狱的墙堞中间忽隐忽现。可是在他下令攻占这座城堡之前，他们的汽车开过了高墙，面前出现的是帕勒莫啤酒厂。后面是阿勒纳莱斯大街的空地。小青年们也许正在踢足球呢！

他们穿过圣塔菲大街，他叫司机停车。汽车的里程计算器上仍指示着开始时的五角钱。

托里比奥结了他那张五比索的钞票。司机板着脸看了看他，说：

“我让你带了狗上车，你什么也不给点吗？”

“好吧，给你两角钱小费。”年轻人同意。

“两角钱顶什么用！你把狗带上我的车走了五段街区！找回你四比索。”

司机生气地嘟囔着把车开走了。

托里比奥把狗交还主人。老太太又给了他五角钱。

“你把狗带到哪儿去啦？”

“到公园里去了。”

“布基高兴吗？”

“我觉得它很高兴，太太。”

“你把它的皮带解了吗？”

“我不知道是否可以解它的皮带，太太。”托里比奥低垂着脑袋回答。

“如果远离马路，你可以解下。”

“下次我把它带到树林里去。”

“那儿可以，可要当心，别让它掉进湖里。”

“放心，太太。我会看好的。”

他弯下身来抚摸小狗的头顶。那个戴红色礼帽的女人也是这么做的。

“我实在喜爱您的小狗，太太！”

“这狗不错，是不是？”

“这狗真聪明！”

他把四个比索用手帕包好，便到阿勒纳莱斯大街的豁口踢足球去了。只有司机的严厉的面容冲淡了他的喜悦。

第二天下午，他又带了狗外出遛街。可是这一回他并不把狗带到树林

里去。他在赫拉女神大街和迪亚斯上校大街的拐角处停住脚，等候那位曾给过他五比索的小姐经过。

他等得不耐烦了，以为不会见到她了。这时，她却换了一身衣服。戴着绿色的礼帽出现了。她停下步来抚摸小狗，随后问道：

“昨天你们平安地回家了？”

“是的，小姐。”

那女人盯着年轻人问道：

“谁给狗洗的澡？”

“我的姨妈。”

“你家里的人对狗爱护吗？”

“我们是爱护小狗的。”

他低下头，又想起来说：

“可是邻居们不喜欢它。稍不注意，他们就打它。我们住在一个大杂院里，你知道吗？他们威胁说要毒死它。”

“毒死它？这个小东西有什么罪过呀？”

“是人有罪过，小姐。”托里比奥说，一面抚摸着布基。同时，他斜着眼观察那位妇女：只见她张着嘴，两眼显出惊恐的神态。托里比奥的本能告诉他，他的进展顺利。

“这小狗叫什么名字？”

“叫布基，小姐。”

“布基！”那女人喊道，小狗初她抬起头，摇摇尾巴。托里比奥庆幸自己没有撒谎。

“要是小狗在你家里吃苦头，甚至会被弄死，你为什么不给它另找主人呢？”

“我倒愿意把狗给您，小姐。我知道您会很好照料它的。可要是我回家不带狗，他们会把我打死的……”

这回那女人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他。很明显，她倒是情愿他被打死而让狗活着的。

托里比奥又说：

“不能空手回家，什么也没有……”

那女人显出不高兴的样子：

“你想要多少钱？”

“没什么……不多，三十比索。”

“我给你二十比索，了结这场戏。用一个可怜生灵的痛苦来做买卖！”

那女人打开钱包，给了他两张十比索的钞票。

“行了吗？”可是她的权威的语调不允许说不行。托里比奥两手颤抖着接过钱：这是他一生中得到过的数量最大的一笔钱。他心里真想拔腿飞跑，但他控制了自己，想起了自己计划的全部细节。他解下了挂在狗脖子上的皮带。那女人对这种掠夺行为表示抗议。

“这条皮带是一个邻居借给我的，我应该还给他。”托里比奥解释说。

那女人弯下身去抓住狗的项圈。

“再见，小姐。”托里比奥向她道别，带着体面的神态走开，控制着自己想要象刚偷了东西的小偷那样逃跑的欲望。他的两手发抖。他既感到忧愁，又感到满意；既感到担心，又对自己满有把握，这是对冒险行为的一种既酸

又甜的滋味。

他回到家，躲在厕所里思考如何对狗的主人交代。最好是按计划办。他拿起皮带，朝贝塞拉小姐的家走去。她站在门口，看着街上，好象是在等他。他由于害怕，喉咙好象发干了，但他继续朝前走。他向她问候，声音有些发颤：

“晚上好，太太。”

“布基出什么事啦？”老太太直截了当地问他。

“皮带，太太……皮带……”托里比奥张着嘴巴，嗫嚅着。他的两手颤抖着，把皮带拿给她看；两眼睁得老大：一副白痴的脸相。这正是他的计划。

“当然，皮带……你解开了……我明白……”老太太帮助他说。“狗跑了，是不是？”

“它跑得快，走失了。我拼命找。这是实话，太太……”

“也许这是我的过错……我叫你把它解开，让它跑一会儿的……”

她停了一会儿，脸上露出喜色，又说：

“幸好，布基自己回家来了。”

“您说什么，太太？”

“太高兴啦！是不是？”

她回头向家里喊：

“布基！”

小狗从院里跑了过来，向托里比奥表示亲热。他们已经是老朋友了。

年轻人以为是在做梦。布基一定是从那个付了二十比索的小姐手里逃走的。这小东西一点也不笨。他们两个一起，还可以走得很远。他弯下身来抚摸小狗。

“真高兴，太太！”

老太太看着年轻人如此激动，抚摸小狗时两手发抖，说话时声音便哽在喉咙里，得到了良好的印象。

这天下午，由于他带狗出去受了风险，她给了他一张一比索的钞票。托里比奥把皮带交还给她，又摸了摸布基，向地道了谢，转身便走。

“托里比奥，听我说！”

“什么事，太太？”

“今天出的事……”

“我非常抱歉，太太……”

“我知道，孩子。但是你也不用这么垂头丧气。幸好，上帝保佑，一切顺利。明天……”

她犹豫不决，不知如何说下去。

“我听您吩咐，太太。”

“明天你还带狗去遛街，可要当心，哎？”

第二天，他留意不带布基经过那个买了它的女人所在的街区。同时他也决定不必走到帕勒莫夫。天气很热，他觉得疲倦，便走进索勒尔大街上的一家小酒店。他口袋里有二十五个多比索的钱，这是一笔大钱了。他要了一份排骨，就着青果、腊肠片和奶酪吃起来。

他把拴狗的皮带系在桌子的腿上，把腊肠片的皮和干奶酪扔给布基吃。有一颗青果核掉在地上时，小狗也把它吞了下去。接着便用明亮的眼睛望着他，摇动着尾巴。年轻人哈哈大笑，在小狗身上抚摸了一下。酒馆里是阴暗

的，锌皮的柜台，门口挂着一块麻布作帘子。他们俩似乎对这个地方感到高兴。

酒店老板一边侍候喝酒的客人，一边照料着旁边的小卖部。他对小狗很同情，给它送来了一堆吃剩的肉皮和骨头，用一张纸盛着放在布基身旁。托里比奥也顺便又要了一份排骨，边吃边思考着最近发生的事情。

一切表明，有那么一种人，他们不但同意而且需要欺骗，甚至为此付出代价。主要是让他们自己欺骗去，决不要强迫他们。很显然，无须为欺骗任何人而作出努力，他们是自己欺骗自己。他只想偷一条狗，把它卖掉，弄到一笔钱。他现在是落到了一个狗类爱好者的世界上，这里的人容易为狗动心，乐于打开钱包。最好是不要着急，表现出喜欢这条狗，带着它遛街，直至遇到新的机会。看来很明显，谁也不会为了他而给他钱坐出租汽车，也不会把他看得值二十个比索的。

他想起那位衣着华丽的女人就感到特别高兴。上一次他见到她，告诉她有人威胁要毒死这条小狗时，她惊呆了，张着嘴巴，眼睛在发楞。她个子比较高，身材苗条，胸部鼓起。他知道自己骗了她，感到高兴，这也象是一种收获。他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念头，想要鞭打这个女人，就象当年罗马人和阿拉伯人为了使女人顺从而鞭打她们那样。

他又津津有味地回忆起这次骗局，把手伸过衣袋里，摸到了那两张十比索的钞票，决定永不花掉。

接着，他又想起那位老太太。他正在取得她的信任，但不是因为同情他，而是因为她喜爱她的狗。他有点气愤地看了看布基，又丢给它一颗青果核。但这一次小狗没有把它吃下去，它正在吞着发霉的香肠皮呢！这对一只平时按科学方法用饼干和汤喂养的狗来说，才真正是一顿美餐。

托里比奥又等了一会儿，然后付了钱，便起身回去把狗交还主人。老太太给了他一个比索。他把钱收好，便到阿勒纳莱斯大街的空地上去踢足球。他从来没有踢得这么糟：因为喝了啤酒，头有点晕，并且脑子里又满是凭空想象的计划。

第二天，托里比奥很早就起身。他买了一本杂志，一包“金元牌”香烟，在意大利广场的一家酒吧间里坐了下来。他要了牛奶咖啡，要了信纸和墨水。

在杂志上刊登的求爱广告中，有一位妇女寻求一个富有的男朋友。这是一件有趣的事。托里比奥本能地接受了人们传说的一句名言：求爱的人付出爱情，要钱的人付出金钱。

他写了一封信，署名罗伯托，地址写上“热切的心”，投进了邮筒。

下午他又去领狗出来路街。贝塞拉老太太心神不安地接待了他。布基病了，谁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托里比奥显出担心的神情，要求看一看小狗。老太太叫他穿过一个花园一般的院子，里面的花盆都上了漆。在院子的尽头，是漆成蓝颜色的狗窝。但是布基却在老太太的寝室里，躺在一个枕头上。房间里挂满神像，托里比奥认为这是亚洲的气派。狗认出了它的朋友，它抬起头，摇了摇尾巴一又卧倒在枕头上。

“狗有什么病？”

“我们不知道。好象是消化不良。可是它没有吃什么不好的东西：昨天和平常一样，吃了生肉和燕麦粥。”

年轻人想起前一天布基吞下的那些香肠皮，显出负疚的神色，摇了摇

头。老太太安慰他说：

“可是看来不严重。我们已经请兽医去了。”

这一天他没有带狗出去，也没有拿到钱。第二天布基还是躺着。兽医给它服了浓烈的泻药。房间里一股臭气。

布基看见自己的朋友过来，又很高兴，这几乎使女主人流下泪来。

接着他到付给他二十比索的那位小姐所住的街上去转悠，可是没见她出来。他决定去按她家的门铃。一位冷漠无情的女仆出来开了门。他要求和小姐说话，但不知道她的名字。女仆差点要把他表走。可是他说明他要告诉小姐一件“关于狗的要紧事”，便一切都解决了。女仆说了声“啊！……”让他在门厅等候。过一会儿小姐出来了，她穿着家里的便服，更好看了。

“您来干什么？”小姐皱着眉问道。（她不再象对小孩那样称他为“你”了，对此，年轻人感到满意。）

“小姐，请您原谅我来打搅您。可是家里人要我把狗带回去。大家都喜欢它，我也很想它。我把二十个比索还给您。”

那女人迟疑地朝他看了一眼。托里比奥把手伸进衣袋，拿出那两张十比索的钞票。

他的手颤抖着把钱递过去，脸上装出一副白痴的样子。

“小姐，请拿去。我要您把布基还给我。”

他的神态十分悲伤，那女人低声说：

“可怜的孩子！”

她转过脸去，胆怯地说：

“狗跑了。”

“怎么会跑掉了呢？”托里比奥有些生气地问道。这一仗他打赢了，又把那两张钞票塞进衣袋里。

“在街上那小狗对我很亲热，看来非常高兴。可是当我要它进家门时，它却不见了。”

“您没有在报上登个寻狗启事？”

“没有。我以为小狗回到它自己家里去了。”

“但愿如此！”他想不出什么话来说明布基是怎么逃跑的。出了什么事故？象平时那样，还是小姐自己解决了难题。

“当然它不会回自己家去！您住得那么远！是在阿维亚内达大街、是不是？”

“是的，在阿维亚内达大街。”托里比奥回答说，他记起了自己说过的谎。他越来越对自己有了把握。他说：

“有人专门偷良种狗，以换取一笔酬金。”

“要是不在报上登寻狗启事呢？”

“他们会把狗卖了……”

接着他又低沉地说：

“……或者把狗宰了……”

她惊讶地睁大了眼睛。

“小姐，您想想：偷了一只狗为了一辈子养着它，这不是好算盘……”

“现在您打算怎么办？”

“我不知道，小姐……反正狗不是我丢的……”

那女人思索了一会儿，说道：

“要是找到了狗，我想总该是我的……”

“那当然，您是付了钱的……”

“好罢……我在报上登个启事。”

“请您快一点！”

“今天下午我就上报馆去。”

“现在我有一个要求，小姐。”

“您说吧。”

“要是上帝保佑，布基找到了，我能来看看它吗？”

那女人犹豫不决。

“至少让我看一次，小姐。”托里比奥要求道。

“好罢。既然您这么喜欢它，您可以常常带它出去遛街。”

他再三道谢，出了大门，来到意大利广场的一家邮局，在邮局待领的信件中取了一封。

“我对这种贫困的、没有乐趣的生活感到厌倦了。我寻找一颗豪爽大度的心，它能理解我，帮助我。”接着详细描述了署名“热切的心”的品格和职业，但没有一件是值得注意的。有些活动往往是虎头蛇尾，和小狗布基的情况正好相反。

信件的作者留了一个地址让人给她回信，并说不要前去看望她，因为她的一个姐姐日夜看着她。尽管如此，托里比奥还是写了一封信装在口袋里前去看望“热切的心”。

她住在帕特里西欧斯公园的一个大杂院里。他说自己是罗伯托这么个人的雇员，把信交给了她。那女人草草看了一遍“孪生的心”所提的要求，倒向托里比奥提了一大堆关于他的主人的地位的问题。他告诉她，他的主人是一个中年男子，一家卷烟厂和理发馆的老板。这等于是在沸水上浇了油。那女人平静了下来，抱着美好的希望微笑着。她还年轻，可是肌肉发达，象个搬运工。她在信里说她的生活贫苦，这倒没有撒谎。

他从这个可怜的手工业者的手里接过了一封信和几个硬币。

“你别对罗伯托先生说你在这里找到了我，这样衣衫不整。”那女人对他说，“也别告诉他我住在大杂院里。”

“我对他说，您同您的母亲住在一间小房子里。”托里比奥显出聪明的样子。

“不要提母亲。我同姐姐在一起。”那女人嘱咐道，并伸手从衣袋里又拿出两个硬币给了他。

在电车上他打开了信封，里面约定在波埃多大街和圣胡安大街的报亭旁约会。他把信扯得粉碎，从窗口扔了出去。接着他数了数钱，刚凑够一个比索。他感到失望，真想立即跑去把骗局告诉那女人，讥笑她，把那点小费还给她。

可是大街教给人以遗忘的智慧，而这种教导能象森林的教导那样深深铭刻在人的本能里。托里比奥是大街上的学生，大街是碰运气的，并且不赞成后悔。

他发誓再也不到大杂院去同那里的人费口舌了。一个编得圆满的故事，结果却只有几个硬币的小费！他恶心地朝窗外吐了一口。

他回到家，在厨房里喝了一杯牛奶，姨妈拿给他一大片面包。

“姨父还没下班回来？”

“回来后又出去了。到铁厂去了……”

年轻人没有多问什么，她便接着说：

“你知道他去干什么吗？”

“不知道，姨妈。”

“工头告诉他说，铁厂需要一个小伙子。”

“啊！”

“他是去替你要这个位置的。”

托里比奥把一小块面包放在牛奶里。当他拿起来时，面包快要化了，他赶紧低下头去用嘴接住。

“你没什么话要说？”

年轻人没有回答，只顾把面包和牛奶吃完。

“再见，姨妈。”

他到阿勒纳莱斯大街的空地上踢足球去了。

时值夏季。他们一直踢到天黑。要不是因为比鲁洛在罚球时把球踢进了啤酒厂，他们会象上几次那样在电灯光下继续踢下去的。小伙子们筋疲力尽，汗水淋淋，聚集在拐角处。

“托里比奥，唱一支探戈。”

“象加德尔^①那样唱一支。”

可是这一回托里比奥不想唱，也不想模仿加德尔扭着嘴、皱着眉、两道眉毛一上一下。也不想模仿马加尔第^②和伊格纳西奥·科尔西尼^③。他有心事：他在捉摸着比鲁洛和加里巴尔第的脸。找哪一个人帮忙呢？两个人都是他的知心朋友。最后他选中了比鲁洛。这个人年纪比较小，似乎对他有点敬佩。而加里巴尔第却自以为是，爱闹独立性。^{①②③}均为阿根廷有名的探戈歌手。

“比鲁洛，你愿意陪我走一段路吗？”

有人谈起比鲁洛的姐姐，大家都笑了；他们二人离开了大伙儿，托里比奥邀请他的朋友到圣塔菲酒吧间去坐一坐。

“你想喝什么就买吧，啤酒、苦艾酒。……随便要好了。”

“我可以要樱桃酒吗？”比鲁洛胆怯地问道。他对这次被邀请好象摸不着头脑。

“天这么热，喝樱桃酒？”

“我们在家喝啤酒和葡萄酒，可我从来没喝过樱桃酒……”

侍者送上来樱桃酒和炒杂碎。

“你喜欢吗？”

比鲁洛少许喝了一口，尝了尝酒，点了点头。他接过了他的朋友递来的香烟。

“我需要你帮我办一件事。但首先，你要向我起誓，不把这事告诉任何人。”

比鲁洛点了点头，托里比奥便将自己的计划告诉了他。他将到赫拉女神大街去看望那位小姐，问明她是否已在报纸上登了寻狗启事，表示要酬谢把狗送还的人。而这只狗将由比鲁洛送回去。

“是什么狗呢？”

“街上的一条狗。我用皮带拴好给你送来。你把狗交给她，领取几个比索。怎么样？”说着，托里比奥的鼻孔和嘴巴里喷出了烟雾。

“樱桃酒很香醇，但引起口渴。你有钱吗？”

“干什么？”

“我可以要一瓶桔子汁吗？”

“你要吧。送狗的事你答应吗？”

托里比奥拿出一张十比索的钞票付钱。他的这种炫耀震惊了比鲁洛。

“这一件事情办成之后我们还可以办别的事。”托里比奥建议。

二人在拐角分了手。这时托里比奥想起，他已经有两天没去看布基了。不应该显得漠不关心，尤其是现在狗正生病的时候。另外，他也不想晚饭以前回家去。他姨父吃饭时是从来不讲话的，吃罢饭就操着托斯卡纳语，唠叨他的愚蠢的心事：要他学一门手艺。当技工或仓库保管员！更为可笑的是要他穿上灰色围裙，学会铁厂里的上万件屁事。

这能是一位未来的民间歌星过的日子吗？

他到了包铜皮的大门前，按了铃。贝塞拉大夫亲自出来替他开门，他吃了一惊。

“小姐不在家吗？”

“她不舒服……躺着呢……你不知道今天早上我们的布基死了吗？……是那个愚蠢的兽医给它取了泻药。好象是腹膜炎穿孔。”

托里比奥脸色发白，呆呆地站在门口。

“哎！小伙子！你怎么啦？”

贝塞拉大夫不得不把他扶住。

“没什么，大夫。是一时的刺激，现在我好了。”

“你的神经真脆弱！”

“是我对布基的感情太深了！”

“这我看得出来，小伙子，可是必须控制自己。”

他看着托里比奥慢慢离去，耷拉着脑袋，象是泄了气的皮球。大夫难过地摇摇头，回到屋子里。

那天晚上，姨父在家里等着他告诉他铁厂里的工作找到了。要是他再不答应，姨父准备再和他争吵一番。可是托里比奥答应去当学徒，避免了一场争论。

第二天他穿上灰色外套，开始了他在灰尘飞扬的铁厂里的灰色的生涯。

下午他下工很晚，所以不再到“空地”去踢足球了。这样他度过了单调得可怕的几个星期。有一天他下工时遇见了比鲁洛。

“我是来找你的。你不再和哥儿们来往了？”

“我现在上工了。”托里比奥解释道，并且避开他的目光，似乎对此感到羞愧。

“对，这我知道。大家都在谈论这件事。”

两人都不说话。

“关于那狗的事怎么样了？”比鲁洛问。

“办不成了。你问这干吗？”托里比奥不客气地反问。

“没什么。我本来倒很高兴去做的。你告诉我的时候，我曾设想如何带着狗到一个豪华的人家去。我把小狗（或许是一条大狗？）留在那里，离开时手里有了钱，我们又可以玩一阵了。你告诉我的时候，我觉得这事很容易。干起来很漂亮……我本来很喜欢去做的。”

“我本来也很喜欢会做的。真是天赐良机！可就是没有能办成。你以为

只有你才喜欢钱？”

“不是为了钱，你知道吗？即使没有报酬我也很乐意去做的。我们也许会笑上整整一个月……”

比鲁洛望着他，好象期待他说出什么不平常的、或是有趣的事来。托里比奥请他上酒吧间喝点儿去：

“你想喝樱桃酒吗？”

“干吗？我上次已经喝过了。”

“那我们喝杯咖啡吧。”

他们靠窗坐下。夜色笼罩着圣塔菲大街。

“哥儿们对我有什么议论吗？”托里比奥问道。

“起初他们觉得奇怪……当然我们都笑话了一阵。有几个人从铁厂经过，看见你穿着外套在干活。加里巴尔第看见你拿着个便盆一样的东西从楼上往楼下搬，几乎笑破了肚子。”

他又改变话题说：

“送狗的那件事妙极了！你一个人干的？”

“我跟你说过没办成。”

“我的意思是说，是不是你一个人想出来的。”

托里比奥得意地微微一笑。两人都不再说话。一会儿之后，比鲁洛又开口问道：

“你不想再上台唱歌了吗？”

托里比奥心中想道：

“他这么问我，好象他们已经议论过我，认为我这辈子只能在铁厂里干活了。”

果然，没等他回答，比鲁洛又说了：

“你在铁厂干活，习惯吗？”

托里比奥迟疑了一下，才说：

“有什么办法？”他无可奈何地笑着说。“我必须攒几个钱买一套衣服。我需要一件丝织的衬衫，一条上好的领带。衣着不整，你哪儿也去不了。”

他拿出香烟，放在桌上。

“你不想再喝点别的什么？”

“喝咖啡就行了。”比鲁洛说。

“比鲁洛，你等着瞧！我就会叫他们认识我的。”

对方惊讶地看着他。

“不只是阿勒纳莱斯大街上那些人。这些人算什么！”

他伸出手，比划着一个广阔的范围：

“我告诉你，全布宜诺斯艾利斯都会认识我的。”

他把脸凑近比鲁洛，好象有什么秘密要告诉他。

“杂志和报纸将要刊登我的照片。”

他放低声音，几乎是耳语：

“这几天我就要上台首次演出了。”

两人都不说话，空气中充满了希望。

“什么时候？”

“我已经去试演过，他们很满意。可是我现在必须等待。首先我要买一套衣服。应该象个样子。修饰和声音一样重要，懂吗？”

“我明白。”

“所以我去干活。我必须攒些钱。”

“当然。”

停了一会儿，他又说：

“你要是看得上，我可以把衣服借给你。”比普洛主动提出。“我的那件蓝色上装是新做的。上星期天我就是穿了它去看电影的。”

托里比奥郑重地点头同意。

“还有一件新衬衫，和一条白丝围巾。”

“我正需要这些。我们俩的身材是一样的。”

“可是我要是借给你的话……”比鲁洛犹豫起来，“那也只能借几天。我爸爸妈妈送给我的，不能让他们知道借给别人穿了。他们会生气的。”

“你怎么想得出来！谁告诉他们去？”

“那好！这个星期之内我借给你几天。因为星期六和星期天我必须穿上这身衣服。”

“放心，你拿来吧。”

“你什么时候要？”

“这个星期快过去了……下星期一怎么样？”

“行。”比鲁洛同意，但又有些担心。托里比奥安慰他说：

“你放心。我只要用两天就行了。这样我星期二就上电台去，马上就还你。”

“你几时去唱呢？”

“我还需要等一个月。首先要和伴奏合一合。你帮了我大忙了。下个月我就去定做衣服。”

“你第一个月的工资够做一套衣服吗？”比鲁洛问道。

“我分期付款。另外，我还有别的朋友帮忙……”托里比奥这样回答，让对方不要以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

这天晚上，托里比奥很晚才回家。刚一进家门，姨妈就把一碗汤放在桌上。姨父的情绪非常糟糕。年轻人一句话也没说，拿起调羹机械地一匙一匙往嘴里送，同时发出和谐的吮吸的声音。他用左手端起碗往嘴里倒，喝得一滴不剩，便放下调羹，用手背擦了擦嘴，等别人吃完。

“姨妈，还有别的吗？”托里比奥问。

“这位先生想吃烧鸡吗？”姨父挑衅地反问道。

“什么也没了。”姨妈惊恐地说。

“你当心，明天就连汤也没有喝的了！”姨父宣布道。

托里比奥用眼睛向他们探询。姨父也目不转睛地盯着他，露出讥讽的微笑。姨妈赶紧解释：

“你姨父今天被解雇了。你知道，工程进展不顺利……”

托里比奥也放下调羹，长叹了一口气。

“你没什么话说？”姨父问道。

“我正在想。”托里比奥说。

“想什么？要是想这个，那我已经想够了，你可以省却这番心思了。我要是从头找个新的工作，那我年纪已经大了。每次我从一项工程中被解雇，就难以找别的工作。找到了也干不多久又要被解雇……”

“是啊。”年轻人说。

“你姨妈总对我说，她的已故姐姐的孩子是聪明的。也许她说得对。那你应该明白，你要把这个家的担子挑起来。要不，我们大家就得喝西北风……”

“是的，姨父。”

“下星期是月底，你要领到铁厂的工资了。你姨妈（你非常亲爱的姨妈）刚才在说，你要买衣服和别的什么东西，我也弄不清楚。现在是时候了，你要知道，你应该为家里出点力。吃饭第一，穿衣第二。”

说到最后，他在桌上猛击一拳，震得碗中的调羹跳动起来。托里比奥抬起头，两眼看着姨妈，好象向她询问该怎么办。

她在低声哭泣。她两眼发红，眼泪从鼻子两旁流下，更显得苍老难看。她从椅子上站起来，把碗碟收走。

“你的工资归家用，至少现在我们这样讲定了，啊？”姨父坚持说。这时看见他女人在哭，便不再说话、他们吃晚饭的厨房里一片肃静。厨房是他们用木板搭成的，外边好奇的孩子们在探头探脑。有些邻居的孩子听见吵嚷，便在充作门帘的粗麻布外面走来走去。

姨妈还在低声哭泣。姨父站了起来，摇摇晃晃地走出门去。

“这老头着了什么魔啦？”

她用抹布拭干眼泪，说：

“你怎么这么说。他失业了……另外，你知道，任何不幸……真正的不幸……只有在酒店找到安慰……你不可怜他吗？”

“醉鬼！”托里比奥骂道，并厌恶地啐了一口。

“你别这样说你的姨父！这个可怜的人，他有什么别的办法？人家把他象狗一样赶出来了，你觉得还不够吗？”

“那我有什么过错？”托里比奥紧接着问。“我原以为你哭是因为他对我吼叫而不是因为可怜一个醉鬼。”

“我哭是为了你，为了我可怜的老头，也为了我自己。我为我们大家而哭。”

泪珠又从她脸上滚落下来。

“今天晚上可以睡觉吗？”托里比奥问道。

他穿过院子，走进屋子。他睡在一个角落里，一块褪了色的旧布帘把他和姨父母睡的双人床隔开。过不一会儿，他听见姨妈也上了床。

“托里比奥，你睡着了吗？”

“姨妈，你说吧。”

“我要告诉你姨父，你这个月的工资打算全交给我。”

“随你怎么说去，只要让我安静睡觉。”

他使劲翻了个身，象睡着了似的有节奏地呼着气。在睡梦战胜他之前，他想好了自己的计划。

比鲁洛的蓝色上衣穿上去非常合身，好象是量了他的尺寸裁制的。六十比索的工资揣在衣袋里。托里比奥对着镜子瞧了好大一阵子，把帽沿拉得很低，盖住了眼睛。

姨妈上街去了（去买土豆和面条，别的什么也不买，他沮丧地想道）。姨父在某个老远的街区奔走，在有朋友当工头的建筑工地上找工作。

托里比奥拿起手提箱，放进两件磨破了的汗衫，两件普通衬衫和两双补过的袜子。

他向四周扫视了一眼，双人床几乎占了整个屋子，他的小床在一个角落里。他的两条腿迟疑不动了。他将来不会想念这一切吗？要是有一天他连一个睡觉的角落都找不到呢？他又瞧了瞧衣柜上的镜子：他穿着比鲁洛的上衣，戴着礼帽。看上去挺象个样。他哼起一支探戈，抬起手臂，皱起眉头，活象卡里托斯·加德尔演唱时的样子。然后他提起箱子，出了门。

他曾经打听过去在塔尔卡瓦诺大街的一家旅馆楼上租一个房间的费用。一位意大利人经营着这家旅馆，并直接主管厨房。老板在走廊里接待了他：“你来啦？这就是行李吗？”

他的一双猪眼睛显出怀疑和贪欲。托里比奥对这双眼睛感到不舒服，也对他用“你”称呼感到不快。

“过几天我的行李就要从罗萨里奥运来。”托里比奥说。

那位意大利人“啊！”了一声。显然，他不相信有什么行李。他站在那里，挡住去路。

“不管怎么说，你得先把钱付了。”

托里比奥把手伸过衣袋，摸出两张钞票。

“您把这二十比索拿去，待一会儿把收据给我。”

“我们是每月五十比索。”

“对。我先付二十。”

意大利人把钞票收下。

“等你把钱都付清了，我才给你开收据。”

老板把他带到走廊尽头的一个小房间，里面没有衣柜，门也不能上锁。

托里比奥打开黄幽幽的灯，一头倒在床上。透过开着的门，他看见长长的走廊。一个矮胖的妇女拿着脸盆和水壶走了过去。一个男人小心翼翼地从一个房间里走了出来，象猫一样溜下楼梯。接着又从那房间里出来一个女人。托里比奥唱起一首探戈：

去吧，去吧……

命运如幼苗……

那女人很快转过脸来。托里比奥哈哈大笑。那个胖女人又回来了，这回手里提着水桶和拖把。后面跟着出现的是那个意大利人的身影，托里比奥赶忙把房门关上。

“难道他没有付钱吗？”提水桶的女人不满地说。

“可是他没有把小费放在桌上啊？”

“我怎么知道！您没看见我还没有进去吗？”

托里比奥在设想着如何跟这个街区的小青年谈话。他情愿遇见加里巴尔第，而不要遇见比鲁洛。

“我有了一个房间，在市中心，”他用一种确信住在这个城市是无上光荣的人的口气说。“我独立生活了，住在我的朋友们附近，他们在电台工作。”另外，他还要让人看到，他同一个女人住在一起。加里巴尔第会把这事告诉这里的小青年们的。重要的是不让他们确切知道他住在哪里。比鲁洛会跑来向他索取衣服。姨父会疯疯癫癫地、醉醺醺地突然到来，跟他清算荒唐的监护人的帐目。

这一天晚上他是在旅馆用的晚餐，然后在市中心的街道上闲逛。当他回到旅馆时，对那里不寻常的活动场面感到惊奇。他觉得自己身上有着花不完的钱，便坐下来，要了一瓶啤酒。

一阵奇怪的风从街上吹过，在那些古老商店的拐角处掀起旋涡，随后吹进有腌酱气味的客店，条件简陋的旅馆和可疑的房间。他渴望冒险，而这阵风为他敲了一个警钟。

他在旅馆里看到的是一浓浓郁郁、令人既伤心又快活的流浪生活的气氛：烤肉和高锰酸盐的怪味，潮湿的床单，无人顾及的角落里堆着的陈旧纸张的气味，神秘的房间里传出的各种低语声，退休的侍者要求晚间为客人搬运行李。女佣人和粗俗下流的小贩们调情，他们带着小猪来、带着包裹走。

两个女人对着桌上的砂锅炖鸡哈哈大笑，只有她们两个在狼吞虎咽地吃。其中一个每举起酒杯就朝他看看。

托里比奥周围的人有的面色红润，有的面色苍白，还有的由于刚刮过脸而下巴铁青，象是刚刚从床上爬起来。他们对自己的女人总是笑脸相迎，同她们絮絮而谈。他试图给这些人股分类：有的是戏台上的配角，有的是卖报的，有的是小贩，有些人可能是小偷，很多人是普通店员。但他们都和他属于同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他自己选中的。突然他感到自己是个幸福的人，他正坐在冒险事业的中心。他觉得整个城市他都唾手可得。他喝完啤酒，便回房去过他独立的人的第一个夜晚。

一个月过去了，情况依旧：托里比奥加入了旅馆和“意大利”餐厅的繁忙的世界，可他仍然没有找到一个有收入的工作。

他和厨房里的一个下手以及每天晚上都在诺通咖啡馆聚会的一伙人交上了朋友。那个厨房下手是科连特斯人，神态严肃，脸上有一道刀痕。但是托里比奥从老远就能看出谁是忠厚老实的人，即使一个面容孤僻而心地善良的人也逃不过他的眼睛。雷翁西奥--那个科连特斯人--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托里比奥身上只剩两个比索了。他不再在旅馆吃饭，而只能买些面包和冷菜拿到房间里去吃。有一天下午，雷翁西奥问他为什么中饭和晚饭都不在旅馆里吃了。作为厨房里的助手，他觉得要是厨房有什么过错使他的朋友不高兴，那他也是有一部分责任的。

托里比奥认为有必要把故事对他从头讲起：

“我是探戈的作曲家，已经作了好几个曲子了。”

他略为停了一停，又说：

“我还是个歌手。”

他带着谦逊的神情问道：

“你从来投听过收音机里萨尔瓦多·达维拉的演唱吗？在电台上我就用这个名字，人家也叫我小加德尔。”

“我没有收音机。”雷翁西奥解释说。

托里比奥十分扫兴地挥了一挥手，接着，又带着探戈的伤感情调说：

“我不走运。有什么办法？问题是没有人帮我一把。我先是碰到一件倒霉事，接着又是一件倒霉事；突然，大家都围着一个人转，于是好象大家都取得了一致意见，大家都出力……把这个人活埋了！”

这位科连特斯人看了他一眼，感到有点脸红。这个对世上没有人情的抱怨触及了他自己：他是那个危及这位艺术家的安全的物质世界的代表。他不想问他困难到了何种程度，只是低声问道：

“那你是……？”

“我说过了，老朋友，我正在走下坡路。”

他用手在肚皮上拍了三下，表明里面空空如也。

“活见鬼！我们交朋友就是为了这个！”科连特斯人喊了起来。他向四局看了看，说：“你回房里去。我随后给你送点吃的来。”

“算了吧，老朋友，你别麻烦了！”托里比奥推开他的手，断然地说。

“听我说，回去！”厨房的帮手吩咐道。托里比奥听从他的话，回到自己房间，斜靠在床上，等着他的晚餐。一会儿之后，科连特斯人进来了，腋下夹着一个包得并不严实的纸包，手里拿着另一包东西。

“吃吧。”他把东西往地面前一放，打开一包法国面包和烤肉片。托里比奥立刻吃起来，抑制着内心的兴奋。科连特斯人看见他吃着，心里感到得意。他又打开另一包东西：一只酒瓶，里面装着半瓶酒。他把酒递给托里比奥，说：

“我不能看着别人这样干吃，没有过。我的嘴里也会觉得干。”

托里比奥点点头，嘴里塞满了吃的。他拿起酒瓶往嘴里倒，长长地呷了一口，然后用手背擦了擦嘴说：

“谢谢，你真够朋友。”

“只要我在厨房工作，总有你吃的。”

他正要出去，托里比奥把他叫住：

“切^①，雷翁西奥。”

①阿根廷人的一种称呼，表示尊敬和亲热。

科连特斯人在门口站住。

“今天晚上你干什么？”

“我要上班，切。”

“我希望和你一起喝咖啡，给你介绍几个朋友。”

科连特斯人的眼睛里闪耀着感激的目光。

“星期四我休息。”

“那就等到星期四吧。”托里比奥向他告别，听到对方回答说：

“可是明天我们要见面。我给你送点吃的来当午饭。”

托里比奥听见他的脚步声在走廊里消失了。他吃完了面包和烤肉，又喝了两口酒，便把酒瓶放在小桌底下，躺在床上休息一会儿。

然后他走出旅馆，在沙明托大街上跟踪每一个妓女模样的女人。他谨慎地或者带着神秘的表情同她们搭讪，并以扮演各种角色来取乐。这些女人不是轻易骗得了的。她们十分不愿意白费时光。一旦生意谈成，她就挽住你的胳膊，要想摆脱她就麻烦了。重要的是--妙趣也就在这里--不辜负好不容易取得的这些女人的信任。托里比奥和她们拉着关系，随后又离开她们，而不显得粗暴。有时候他听到背后那个先是被追求后又被摒弃的女人的咒骂声。最好是接受她们的全部条件：

“你在前面走，我跟着你。”

托里比奥在后面察看着那个第一眼看上去有吸引力的女人的缺陷：她走路有气无力，两只善定的脚十分粗俗。在第一个拐角处，托里比奥消失了，他不再听见那个女人的骂声。

那天晚上他搭上了一个女人。他想冒充调查人员。他身上没有钱，希望那个女人能答应同他呆一会儿以换取他的保护。可是那女人几乎挖了他的眼睛，对他吼叫着说，她认识市里的所有警察，他那套鬼话回去说给他妈听去，并且做出样子要去叫一个真的警察来抓这个骗子。

托里比奥从自由大街溜走，进了诺通咖啡馆。他靠窗坐下，观看街上

熙来攘往的人群。

“我现在什么也不想喝，待一会儿再要。”他对待者说，接着他又面露痛苦地说：“我不舒服。”

“那您为什么不喝杯菊花茶呢？”

“这有好处吗？”托里比奥问，神情活象一个将信将疑的病人。“等我不痛了再说罢。小哥儿们还没来？”

“他们原先在这儿，后来走了。”

托里比奥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他希望日前他在这个咖啡馆里认识的两个朋友能替他付钱，希望侍者到别的桌上去照应。他终于又回到了街上。

天色还不算晚，他几乎在床上躺了一整天了。现在他毫无目标地随意走着。忽然发现到了拉瓦叶大街的五光十色的电影院前面，自己也觉得惊奇。即使当他在铁厂干活时。

情况也没有现在这么糟。他步履艰难，脑子要想什么事情也很费劲。他从家里逃出来就是为了这个吗？这种自由有什么用？

他在那个行人和灯光的旋涡中间的拐角处站了一会儿。这种自由有什么用？他思考了一下：这种身无分文的自由有什么用？就是这么回事，他明明知道。没有钱，要在街上行走都是困难的--这些灯光没有什么作用--生活毫无意义。他咬紧牙关，又钻进旅馆的房间里。他把裤子仔细叠好，放在褥子下面的报纸中间，明天早晨褶皱就象刚熨过一样笔挺了。他把上衣挂在椅子背上，便躺了下去。他想睡觉，睡它整整一个礼拜。可是他一闭上眼睛，便觉得心乱如麻，旅馆里喧声震耳，大街上车水马龙，走廊里人们川流不息。原来口袋里空无分文，连睡觉也困难哩！他想起放在桌子底下的那瓶酒，便拿来喝了，躺下就睡。

科连特斯人把他叫醒了，给他送来半张饼和一块面包。托里比奥感觉嘴里发黏，肚里发酸，可他还是抓起就吃。他饿得发慌了，可这张饼的意义不只是一顿饭：它是对厄运的一种可能的回报，是他在孤苦伶仃中的一点补偿和安慰。

雷翁西奥看见酒瓶空了，又惊又喜：

“原来你也喜欢喝酒？”

托里比奥点了点头。

“我再给你拿点来？”雷翁西奥半开房门，向走廊看了看，便走出房间。他回来时带来一瓶酒，自己先喝了一口，然后把酒瓶递给托里比奥。

“你在旅馆里工作很久了吗？”

“将近一年了。”

“习惯吗？”

雷翁西奥难作肯定的回答，便说：

“慢慢混着。”

“你喜欢布宜诺斯艾利斯吗？”

他又难作肯定的回答，便说：

“差不多，切。我不喜欢这里的人。但是我在这儿干活，积攒几个钱。”

“你想当个富翁回家去，雷翁西奥？”

“我当然要回去。我在这儿感到孤单。”

两人都不说话。托里比奥在舔一颗大牙，发出啧啧的声音。

“攒几个钱是好事。谁也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托里比奥一本正经地说。

“我想回到老家去开一片小酒店。”

“好主意。”托里比奥表示赞同。

“我不能老在这儿当帮手。”雷翁西奥说着便在床上坐下。

“当然不能！你是哪儿人？”

“我是厄斯基纳人。”

“我一定到厄斯基纳你的酒店去看你。酒店叫什么名字？”

雷翁西奥笑得乐不可支。

“现在我只关心攒钱。以后再考虑名字吧。”

“不行，老朋友。名字很重要。另外，要是我不知道名字，我怎么到厄斯基纳去找你的酒店呢？”

雷翁西奥哈哈大笑。在他通红的脸上，闪亮着两只乡下人的眼睛。面颊上那条年代不长的疤痕，好象肉上的一张嘴，刚张开惊叫了一声就被缝上了。在这样一个面孔上，笑容就象在孩子的脸上那样使人容光焕发，笑声是农民内心感情的自然流露。

“可是，切，朋友……那我们想个名字吧！”

“你觉得叫‘尖刀’怎么样？”托里比奥提议。他立刻意识到，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是看着对方脸上的伤疤的。对方用怀疑的目光看了他一眼。

“有一首民歌叫‘尖刀’，我的演唱节目里有。”托里比奥解释说。

“我们以后再谈这个。”科连特斯人说，他的声调里到底是含有一种伤心的味道还是隐约的威胁，这很难知道。他没来得及说声谢谢，便从床上起来，回到厨房去了。

托里比奥出来上厕所，碰到了旅馆老板。

“早上好。”

“下午好。”那个意大利人纠正他说。“已经是下午两点钟了。”

老板站在走廊当中，用肚子挡住他的去路。

“尼科拉先生，有什么事吗？”

“我正要问您呢。什么事？今天是这个月最后一天了。房租您几时付给我？”

“尼科拉先生，请耐心一点。这几天我就要上班去，就会付给您房租的。”

“您上班去？干什么？那个雷翁西奥到处跟人说您是歌星，一位了不起的歌星。可是我这里不需要什么歌星。我只需要房租。”

“请您耐心点，等我两天。我没有更多的要求。”

意大利人往边上一站。托里比奥走到走廊尽头，感觉到老板在背后用凶狠而愤怒的眼光望着他。

当他从厕所出来晚老板还在走廊里等着他。

“可是您还等什么？先付给我几个比索也好。难道您连二十个比索也弄不到吗？”

“现在我没有，这是实话。过两天我全付给您。”托里比奥觉得身上不舒服。“我正在找工作，尼科拉先生。请您耐心等两天。”

可是这个可恶的家伙用忧伤的眼神看了看他，摇了摇头，表示不相信。

“我现在连吃的都没有，您要我拿什么付给您呢？”

“您以为我没有看见您老往厕所跑吗？要是您没有吃的，怎么老跑厕所？”

“老实说，我只是去小便。”托里比奥解释道。

他们走到房门口。托里比奥进屋后，随手把门带上。他对这位意大利老板的眼神留下了深刻印象，从这两只眼睛中看到了可恶的胜利的闪光。他巡视了一下房间，立刻发现：当他上厕所时，尼科拉先生把他的上衣拿走了。他冲出房间，走廊里一个人也没有。

他想大声呼唤这个小偷，给他出一场丑。但他马上明白，这样做他自己就全完了。他又回到房里，坐在床上，双手托着脑袋歇了一会儿，但什么事情也不能思考。胖乎乎的女佣人从另一个门进来了；拖着拖鞋，提着一桶脏水。她也是往厕所去，托里比奥便在门口等候。不一会儿他又转身回到房间里，继续守候着。那女人穿着工作服出来了。托里比奥认出了她：原来她是常在旅馆里吃饭的那个姑娘，饭后便到市内大街上去逛马路。

托里比奥微笑着冲到走廊上，差点儿撞着她。她见到他脸露喜色：

“怎么啦，年轻人？那么跌跌撞撞的？”

“我想跟你聊聊，可以吗？”

“现在我这么衣着不整的时候跟我聊聊？”她发出沙哑的笑声。

“那有什么？我们又不是在这儿聊，也不是在大街上。我们可以到我房间去或者到你的房间去。”

他几乎推着她把她带进她的房间。她没有反抗，只把手指放在嘴上，叫他别作声，并把房门先半关，然后再轻轻关上：

“但愿那老太婆什么也没看见。”

“你怕什么？”

“老板会把我踢出旅馆的。”

“这个坏蛋！难道他不把房间出租给一男一女吗？”

“那倒是。不过我们得每次付给他两个比索。”

“这个坏蛋！”托里比奥又愤恨地骂。

接着，她问他做什么工作。

“我是机械师。”

那姑娘拿起他的手来看。

“你这双手不是机械师的手。我有的朋友是机械师，我熟悉他们的手。你为什么不说真话？”

托里比奥惊讶地望着她。对她说什么呢？她知道什么叫真话？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电台上唱歌吗？”

托里比奥做了个鬼脸：

“你怎么知道的？”

“科连特斯人告诉我的。”

“我象是个示众的人，连我的屁股也会被人认出来。”

“猪猡！”她扮了个鬼脸说。

“你叫什么名字？”

“你叫我玛尔戈特好了。”

“雷翁西奥告诉我，你叫弗洛拉。”

“也有人叫我爱米丽亚。我有什么办法？但我最喜欢马尔戈特这个名字。”

他正走到科连特斯大街和巴拉那大街的拐角上，突然看见穿梭的车辆中间有一辆家用马车。手持缰绳的父亲是个干瘪老头，满脸皱纹。母亲头上包着黑头巾、紧靠在她丈夫的身上，惊奇地观赏这不寻常的城市风光。托里

比奥看见他们在这里出现，呆住了。

那匹老马站了一会儿。托里比奥的心直跳，他看清了是他的父亲和母亲。他们由于坐着这辆破旧的马车荒唐地在城里大街上奔走，显得疲惫不堪，神情沮丧。托里比奥已有多多年没有看见他们了，这多年来两个老人就坐着家用马车周游世界。现在他们正在那里出神，等待来往车辆能给他们的马车让出一条道来。托里比奥挥动手臂，想引起那两位老人的注意。他想叫他们，但他喉咙口几乎连小耗子般的叫声都喊不出来。老头向他转过脸来：但他的眼睛只是望着上天。托里比奥明白他已经不在人世了。他醒来满身冷汗，好不容易才神智清醒过来--好象在泥塘里吃力地使劲拍击翅膀。他不认识这个房间，也不知道是什么时间。

“你不舒服了吗？”一个女人的声音问他。这个奇怪的声音，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使他越来越迷惘。他觉得身子虚弱，心惊肉跳，象一张绷紧的弓。他在半睡半醒中充满粗鲁和欲望，又为意识到自己象个瞎子一样在摸索着往前走而感到苦恼。可是这个女人的刺耳的声音把他弄醒了，他面露苦相，而她还在问他：“你不舒服了吗？”

他眨了眨眼睛。由于身无分文和上衣被人拿走而感到灾难临头。他对这个女人不再有什么要求了，并且已经摆脱了梦中的苦恼。他只觉得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怒火，象是受了污辱，而这个女人的脸还向他凑近。他握紧拳头，使劲打过去。

“我碍着你啦？”她说，一边用手捂着脸，眼睛睁得老大，往后退去。他认出来了，那是马车上他母亲的正在出神的眼睛。他跳下床，朝那女人走去。她直退到墙边，他用在梦中见到的他母亲的眼睛望着她。

“我叫醒你不对吗？”她嗫嚅着说。托里比奥向她伸出孩子般好奇的手，这只手似乎想要特别认识一下那姑娘的脸：先是在她脸上摸，接着，为表示对它可以任意处置，便狠劲地捏紧她的下巴。这既是抚爱，又是惩罚。

他走出房间去找老板，看见他正在摆设桌子。

“把上衣还给我！”

那意大利人把头一抬，用下巴指了指餐厅里的衣架。

“在那儿。”

托里比奥把衣服穿上，认为是该他发火的时候了。

“下次您别跟我开这种玩笑！”

“这不是玩笑，这是个警告。要是一星期之内你不付房租，我就把你的衣服全剥光。”说罢，又轻蔑地朝他看了一眼。“你是不是想哭啊？”

托里比奥朝港口走去。他身上没有钱，也没有睡意，因此很难消磨时光。他逃避了市内的辉煌灯火--他感到难过，连一瓶啤酒也付不起，连一张电影票也买不了--踟躅在港口一带的街头。他避开了游乐区，想一直走到雷蒂洛广场，却突然碰见了深夜还在进行的大拍卖。他站在门口看：只见一个人站在一座平台上，手里拿着锤子，在大堆的提包、毯子和摆满手表的橱柜中间叫唤。他想进去呆一会儿，但店里冷冷清清的景象使他扫兴。他继续往前走，听见背后有人叫他：

“托里比奥！”

他站住脚，感到莫名其妙的激动。好久以来--自从他自家里逃出来之后--没有人在街上叫过他的名字。在一刹那之间，他曾想可能是比鲁洛在叫他，向他索取穿在身上的衣服；也可能是一个朋友，可以向他借钱。他转过

身子：一个又高又瘦的身影在拍卖行的墙边向他把手，这个人举起手，示意他走过去。托里比奥看不清他的脸，但不可能是比鲁洛。于是他走上前去，握住一只干瘪无肉的手。他认出是费阿西尼，五年前就离开这个地方了。托里比奥记得，他从土库曼来到这里不久，费阿西尼便离开了自己的家，再也没有露面过。

“你长大了。穿着这件蓝衣服，看上去挺潇洒。”

托里比奥没有理会他对比鲁洛的衣服的恭维，只是谨慎地谦逊一番。

“你工作了？还是你姨父挣大钱了？”

“我姨父失业了，自由自在，常常喝醉酒。”

他犹豫了一下。他的本能告诉他，跟这个瘦鬼费阿西尼是不能说假话的。

“我离开了家，现在一个人过。”

“我祝贺你。独立最可贵，特别是当你有这样一件衣服和想要干一番事业的时候。”

“我的运气不好。”

“没有收入？”

“没有。”

“连买香烟的钱也没有？”

“没有。”

费阿西尼递给他半包香烟。

“你拿去吧。”

“谢谢。”

“起码你总有住的地方吧？”

“我在旅馆里有一个房间。”

“这倒不错。”

“随便哪一天他们都会把我赶出来。两天以前老板把我的衣服拿走了，差点儿让我赤身裸体。”

“你住在哪里？”

“在塔尔卡瓦诺大街的一家旅馆。”

“我一生中最困难的岁月是在巴拉那大街的一座房子里度过的。他们没有把我的衣服拿走，因为我那时穿的衣服一钱不值。不象你的这件衣服，我的衣服还不值一支香烟。

然而一个坏东西叫人打掉了我三颗牙齿。我那时候的情况比你现在更糟，这是实话。但是现在你看我……”

他用食指越过肩头指指身后的拍卖行。

“这个店是我的。你看怎么样？”

“一定赚很多钱吧、”托里比奥摆出内行的神气说。“廉价拍卖总会有很多笨蛋上钩的。”

“你别这么想，小伙子。勉强只够每天的开销。”

店里传来拍卖员的喊叫声和疯狂的锤击声。

“我必须安排一批人的生活。有几天晚上唯一的笨蛋是我，我必须把进帐的几个比索分给大家。”

他面露无可奈何的神气，搔了搔下巴。托里比奥决定等到适当的时候才向他借几个比索。

“这么说来你眼下无事可做(口罗)？”费阿西尼又问。

“没有。”

费阿西尼又搔了搔下巴。

“我可以给你找一个小买卖。可这是只有我们两个人能知道的事。你有兴趣吗？”

“当然！”

“你住在塔尔卡瓦诺大街的哪一块地段？”

“在意大利旅馆，离沙明托大街很近。”

“明天我去看你。我们一但吃午饭，聊一聊。好不好？”

“好极了。可是我现在……”

“什么事？”

“旅馆里的人以为我是广播电台的歌星。”

“那怎么样呢？”

“既然你要到旅馆来……作为什么不就冒充一家电台的艺术指导呢？你要化装一下也没问题……”

费阿西尼哈哈大笑。

“我正喜欢这样，你知道吗？我看你倒是挺有头脑的。”

托里比奥表示谦逊。

“可是光有头脑没有用。”费阿西尼接着说。“你虽然很有头脑，可现在还不是倒霉吗？记住我的话；要紧的是能做到自己想好的一件事情。我满足你的要求：明天有一个艺术指导去看你，请金嗓子歌星吃中饭。你要不要我把合同也带去？”

“那倒不坏。”

“好吧，那就明天见了。”

“还有一件事，费阿西尼。”托里比奥拦住他。

“你还有什么事？我不能把店撇下不管。那些吹打的人会把陈列的手表都装到他们口袋里去的，而这些表也不是我的，都是成批代销的，你明白吗？”

“我想向你借几个比索，今天晚上我身无分文了。”

“你只当没有遇见我，熬过今天晚上吧。小伙子，再见。”

费阿西尼走进拍卖行中，不见了。托里比奥又向雷蒂洛广场走去，心里孕育着希望。

到了广场，河风拂面吹来，不觉一怔，原来自己正在大声唱着探戈呢。

托里比奥很早醒来，担心又会睡着，便跳下床，穿好衣服。他穿好上衣上厕所去，不让老板再把他的衣服拿走。他到了走廊里，问孔斯坦莎是什么时候了。时间还早，他便下楼走进厨房，科连特斯人递给他一杯牛奶咖啡，他很快就喝光。

“老板到市政府办事去了。”科连特斯人告诉他。托里比奥走到柜子前，切下一块面包，涂上一层厚厚的黄油。

“有什么新闻吗？”这个二厨师问他。

“今天广播电台的艺术指导来找我。”托里比奥平静地说，他已胸有成竹。

科连特斯人惊奇地望着他。

“他可能会请我吃午饭。昨天晚上我到广播电台去了。你没看见他们怎样接待我！”

我同艺术指导谈了话。他很够朋友。我把我的处境告诉了他，他说他今天来看我。”

“他给你弄到什么了吗？”

“我想他正要跟我谈这个。”

他吃完面包，问道：

“你看见马尔戈特了吗？”

“这个时候她还在睡觉。”

他离开厨房，上了楼。

他用指关节敲了敲马尔戈特的房门，但没等得里面应声，他便轻轻推开房门走了进去。她正坐在床上，对着衣橱的镜子梳头呢。

“我打扰你吗？”

“我看你很快就学会了门道了。下次进来以前要先问一声。”她带着讨厌的口气说。

她看上去疲惫而衰老，嘴唇上没有血色，脸上由于没有搭粉也显得蜡黄。

她一边继续梳理着头发，一边说：

“那一天的事并不能让你自以为有权利可以随时进我的房间。我不喜欢在旅馆里闹纠纷。然后又必须另找旅馆，而旅馆又不多。”

“我进来是要告诉你一件事。”托里比奥装出最天真的样子解释说。

“你是来请我吃中饭的吗？”她讥讽地问道。

“今天我不能请你，可是明天我非常高兴地请你吃饭。”

“明天……好罢，我就等明天吧。”她歇斯底里地大笑起来。

“现在你不怕外面有人听见了？”

“你看，现在我无所谓了。有时候我不愿意人家看见有人进我房里来。有时候我就要在这里接待男人，让那些不喜欢我这种生活的人大发雷霆。那么你不愿意同我一道吃中饭(口罗)？那个姑娘要一点钟才起床，而我不喜欢中饭吃得太晚，也不喜欢一个人吃。

这是我的习惯了，你知道吗？在我家里生活是很有条理的。我父亲是科尔多瓦的一个铁路工人。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切都习惯了，就是不习惯在十二点钟以后吃中饭。同样，早上七点钟我也不能不喝马黛茶。有时候我到天亮才睡觉，但七点钟时我的水壶里已经煮上水了。这是习惯，你知道吗？在科尔多瓦，我同一个机械师结了婚，便一起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来。我们总是六点钟起床，这个时间最好。我们起床的时候和喝马黛茶的时候，我男人跟我讲他这一天在车间里要干些什么事。中午他匆匆忙忙赶回来，晚上回来就劳累了。但早上喝马黛茶时我们总有时间聊聊天。这就成了我的习惯。我一大早就起床，点上炉子。人家叫我喝威士忌、香槟和其他美酒，可我最喜欢的还是早上喝马黛茶。

使我不能忍受的是一个人吃中饭。男人们会注意你，不时地看着你，这时我感到非常孤独。男人们向我挤眉弄眼，我吃东西也会恶心。”

“明天我们一道吃中饭去，可是今天我要等候一家广播电台的指导来看我。”

“我祝贺你，小伙子。”

“现在我走啦。”

“你可以再呆一会儿。”

“你刚才还生气呢。”托里比奥回答。

“你别在意。你喜欢我哪个样子？现在这样还是打扮后的样子？”

“两种样子我都喜欢。几点了？”

“我的表在那儿。”

托里比奥走到五屉柜前，嘴里哼着调子，拿起表来看时间。

“这表真漂亮。”

“这没什么。我结婚的时候有很好看的首饰。”她对着镜子自鸣得意。

“你不是说过你丈夫很穷吗？”

“他没有给我买首饰，那是我自己家里的。我家的姓在科尔多瓦也是有名的。”

托里比奥记得她跟他讲过，她父亲当过科尔多瓦的铁路工人。但他不去理会这一个和其他的谎言。重要的是要施展他的把戏。让她去自欺欺人吧，他认为这很自然，所以不怎么留意。

“再见。”

“再见，小伙子。”

离开房间以前，他不免先在半开着的房门口张望一番。他不愉快地想起，他对那个意大利老板有些害怕。他回忆起一种类似的感情：他父亲活着的时候，他从家里出来到土库曼的老塔菲区的街上去玩之前，总要先把门打开一半看一看。他在家乡住的时候，不论他们进哪一家果园去偷水果，总觉得他父亲在看着他。他在铁路工厂的周围玩的时候，总觉得他父亲的眼睛在盯着他。父亲死后，他被送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姨父家，这时一切都变了。在首都，没有果园可以进去偷桃子了，也没有可以向其投石子的沟了，在城郊的棚屋里也没有女孩子可以一起玩了。在首都，他看到的只是对金钱的迷恋。

现在他痛恨旅馆老板，但又害怕他的目光，这种害怕使他想起对自己父亲的害怕。

当那个意大利人用逼人的、似乎看透他的心思的眼睛望着他时，他想要报复的一切愿望都烟消云散了。他似乎认为他可恶，但又无足轻重，因此也就不会伤害人的了。

他随手关上房门。这时正是上午十一点钟，走廊里没有人。女仆已经搞完卫生，老板还没有回来。当费阿西尼来打听艺术家托里比奥·托雷斯，并要同他签订合同的时候，但愿老板能在场。想起自己突然身价百倍，旅馆里所有的人将要为之震动，他心里怦怦直跳。在回到自己的房间之前，他又开脚步，做出一个探戈的舞姿，以右脚为支点慢慢转过身来，唱道：

曼多林手唱出忧伤的调子

大厅里

一对对舞伴在稳重地旋转……

他一脚踢开房门。床还没有铺，他鞋子也不脱，和衣倒在床上，等候费阿西尼的到来。一会儿之后，他听见旅馆里闹腾起来，听见意大利人在厨房里大声吩咐。

可是阿尔贝托·费阿西尼没有来。托里比奥发觉自己太笨了，竟如此坚信不移地等着他。烤肉的气味一直传到他的房间里。随着肚子越来越饿，火气也越来越大。当餐厅里的一切活动都停止之后，他便下楼到厨房去。他在走廊里和老女仆劈面相遇，她穿着拖鞋，手里提着水桶，正要去清扫走廊。

尽头的最后几个房间。老太婆没有理他，头也不抬就从他身旁走了过去。托里比奥想，这个老太婆也值得他羡慕，她一定已经在厨房里高高兴兴地吃过中饭了。随后，有一对男女来租用房间时，她还可以从老板那里扣下几个比索。

他吹着口哨直接上厨房去。雷翁西奥正在洗盘子，一堆脏盘子堆得老高，摇摇晃晃地象是随时都会倒下来。厨师在一个角落里刮锅子。

“老板呢？”托里比奥问道。

“他先招呼了客人，便到厨房来对我们叫唤。他拿走了外快，现在正在睡午觉呢。”

“这个臭老板！”托里比奥咬牙切齿地说。

“生活就是这样。”科连特斯人不在乎地说。“可是你护怨什么呢？这几天你就要开始唱歌了。一有了钱你就可以换一个好房间。而我还要在这个意大利旅馆干很长时间。

结果怎么样？”

“什么事？”

“什么‘什么事’？你的会见结果怎么样？”

“啊，当然！结果很好，老朋友。”

“你签合同了吗？”

“在朋友之间无须签合同。下星期我到广播电台去签。”

“他到这里来找你了吗？”

托里比奥犹豫了一下，说：

“没有来。我们说好，要是晚了就在皇家旅馆碰头。他在那里要会见一名女艺术家。”

雷翁西奥“噢！”了一声，又接着洗盘子。

“雷翁西奥，”过了一会儿托里比奥言不由衷地说，“广播电台的那位朋友请我吃中饭，我们要安排试听的时间表，他还答应跟我何一张为期一年的合同。你看，现在还不是向他伸手的时候，你以为如何？”

“当然不是时候。”科连特斯人表示赞同。“那样影响会很坏。”

“我曾想向他伸手。你知道，我现在身无分文。于是我想……”

雷翁西奥停止洗盘子，看了他一眼。

“要是你能借几个比索给我，那就帮了我大忙了。下星期我去预支一点钱就还你。”

那个二厨师把一个盘子放在桌上，用一块油污的抹布擦了擦手。

“你等一会儿。”说罢，他就消失在通往后屋的院子里了。托里比奥站在一堆盘子旁边。厨师背朝着他，继续用金属刷子在刮锅子。

厨房里充满油腻和刺鼻的陈年烟火的气味。托里比奥愉快地闻着这股气味，同时又由于感到卑微而伤感。他看了看那一堆沾满油汁和酱油的盘子。大家都吃了炒菜和烤肉；大家都吃了，只有他没有吃。而雷翁西奥，那个脸上留着刀痕的科连特斯人，却要洗一整个下午的盘子。托里比奥认为这是荒谬的，令人厌恶的。他轻声干咳了一下，斜眼看了看厨师，便使劲朝那一堆盘子吐了一口。然后他走到厨师跟前：

“辛苦啦，卡塔尔多？”

厨师正在忙碌，只稍微转过脸来，眼睛里满是眼眵。他叽咕了些什么，令人难以听懂。托里比奥知道这厨师对他没有同情，便又朝盘子吐了一口。

“你从来没有想过这一着吧，卡塔尔多？”

“什么？”厨师又看了他一眼。

“你看这一大堆盘子。够干一整天了。给它踢一脚就全报销了。老板听见声音就会醒来，可他也无能为力了。老板的午睡，也就再见了。要洗的盘子，也就再见了。只要一脚。我踢啦，卡塔尔多？”

“您说些什么！您疯啦？”

“我把这些盘子踢一脚怎么样？你对老板这么害怕，不害臊吗？”

“你说的什么害怕？”

“我给盘子一脚啦？”托里比奥又说，一边摆出要踢的姿势，看到老厨师眼睛里那副恐怖的样子，他感到欣慰。

“这些盘子跟你有什么关系？我从来不愿意打破一个盘子。贵着哪！”

“很贵，是吗？是你花的钱吗？”

老厨师耸了耸肩，又转过身去继续擦铁锅。再跟他多说也没有用。托里比奥前院子里去，只见雷翁西奥系着厨房用的油污的围裙走来。阳光照着他的脸，两只眼睛在他的紫铜色的脸上看上去象是两条缝，疤痕则是一个苍白的标记。

他一只手插在裤子口袋里进来了，拿出几张折好的十比索的钞票递给了托里比奥。

“拿去。”

“太麻烦你了！”托里比奥回答说。

“我觉得朋友之间不应该开口要求两次。”

大家都不作声。雷翁西奥又洗起盘子来。角落里传来刷锅子的声音。托里比奥说：

“你干活吧，我走了。”

“你去睡午觉吗？”

“不，老朋友。我有许多事情要做呢。”

“祝你顺利。”

托里比奥迈着轻松的步伐走到大街上，他想跑，想唱。他由乌拉圭大街折进沙明托大街后，走进了一家餐厅，找了一张最不显眼的桌子坐下，要了一盘牛排和半升酒。他每咬一口肉，便感觉自己血管里的血液在开始流动。他明白，自己实在太饿了。他大大地喝了一口酒，轻松地舒了一口气。

这样自由自在地吃喝和思考，是人世间最美的事了。无论顺心的时候还是犯愁的时候，他都不应该丧失自己的意志。现在他口袋里有几个比索，这是事实：但他知道，这决不能维持长久。最多只能维持三、四天。这点钱他能做什么开销呢？他欠尼科拉先生两个月的房租，随便哪一天他都会被赶出旅馆。一个人没有钱就好比是落水之人。他必须想办法弄到钱，并且动手干起来。犹豫来犹豫去是什么事也办不成的。既然必须行动，最好就是马上行动起来。现在他已经喝完了一瓶酒，口袋里又有几张十比索的钞票的力量，使他重新产生了自信心。

吃完饭，他又进诺通咖啡馆去喝咖啡。他从那里注视着意大利旅馆的大门，等候玛尔戈特经过。他的计划已经考虑成熟了。

他醒来想起，玛尔戈特是习惯早起的。他半睁一只眼睛，仔细寻找电灯开关，拧亮了灯。马尔戈特在她身旁睡熟着，脑袋向后仰，嘴巴半张开，呼吸时发出轻微的吁吁声。

看来她睡得正香，这倒便于他采取行动。房间里的波利莫斯牌汽炉引人注目，五屉柜的大理石面上放着水壶，旁边是糖罐，糖罐上放着马黛茶。一切都为早晨喝马黛茶而准备好了。

托里比奥记得清楚，是右边第一个抽屉。那天晚上他给了她十比索。当他装着躺在床上休息时，偷偷看见她是把十比索的钞票放在什么地方的。她把那个抽屉锁上了，钥匙就放在旁边的一个抽屉里。

托里比奥下了床，穿好裤子和衬衣，走到五展相前面。也许玛尔戈特在听着，也许她是在梦中听着。他拿起炉子打气，增加煤油的压力。他用身体挡住自己正在干的勾当。

他把汽炉顶着墙，用一只手继续轻轻打气，而他的左手却在拉开抽屉，拿出钥匙，打开了另一个抽屉。他首先看见的是一只手表，便把表放进衣袋里。他摸了摸一张纸，下面就是那张十比索的钞票。他又往里摸，没有发现更多的钱。他不愿前功尽弃，决定停止寻找。

他希望亮着灯，万一玛尔戈特醒来也不会怀疑什么。她将会看见托里比奥在煮马黛茶。也许她在偷看，但更大可能是她没有醒来。托里比奥坐在椅子上穿好鞋。他抬起头来时，看见那女人睡眠惺忪地醒来了，用柔和的声音问道：

“你怎么啦？”

“没什么……”

“你为什么穿衣服啦？”

“我想上厕所去。”

“劳驾。”

“你说吧。”

“你点上炉子，把水壶放上去。”

“我正要点呢。”

她好象对每一个细节都出奇地关心。

“你上厕所也要从头到脚都穿戴整齐吗？”

“我不愿光着脚出去。”

“可是领带没有必要系上啊，切……”

她不再作声了。托里比奥从镜子里看着她。不一会儿她又睡着了。他一面结领带，一面看着她。很快，她有节奏地打起呼噜来。于是他从椅子上拿起上衣，到了走廊里。

只在楼梯边上有一盏黄色的灯。他努力控制自己，慢慢下楼来。紫色的曙光微微洒在大街上。他快步穿过科连特斯大街，往南走去，走过五月大街上好几个街口。咖啡馆还没有开门，桌子在路边上放着，柳条椅高高堆起。在走到利马大街之前，他看见一家牛奶店已经开了门。他要了一杯牛奶咖啡，以及面包、黄油和甜点心。热的饮料给他增添了勇气。他摸了摸我在裤子口袋里的那块手表。

他点了一支烟，等待新的一天到来。

他三次从这个拐角走过，想着这样做也许不够谨慎。最后他挤进了等候在窗口的男男女女的队伍。轮到他时，他把玛尔戈特的表交给了穿灰色围裙的职员。不一会儿，这个职员递给他一张典押的作价单，上写：“镀金女表一只，十六比索”。托里比奥嘴里嘟囔着什么。职员漫不经心地问他：

“留下吗？”

“不能再加点钱？”托里比奥反问他。

“不行，先生。你拿走吗？”

“当然留下。”

他走出典当，嘴里嘟嘟囔囔。这个脏女人的可恶的镀金手表！他不可能再回旅馆去住了，他同雷翁西奥的友谊也结束了，而他冒这次风险又是为了这块不值钱的小东西。

幸好马路还在，笔直地伸向远方。马路上行人摩肩接区，在这里，他的生命和千百万人的生命溶合在一起。一条大河在他面前展示了河床和河中的鱼群。同以往多次一样，马路告诉他不容后悔，也不容叹息。相反，倒是应该给这次行动作一个总结。在自由大道的一家转卖行里，他把手表的当票卖了。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又给了他八个比索。

他突然发觉这时他离意大利旅馆只差两个街口。于是他决定到离这地尽可能远的地方去，以免和玛尔戈特撞见。他在卡洛斯·贝叶格里尼大街乘地铁到宪法广场，决定另找安身之所。然后他再去找阿尔贝托、费阿西尼；他再没有别的可以与之求援的人了。

他来到费阿西尼的拍卖行。拍卖还没有开始，预告是晚上进行。他看见费阿西尼正在整理一堆皮包。

“出什么事了，小伙子？”

“没什么。那一天我一直在等你……”

“那一天我没能去。我的一个做生意的同事把我叫到西马达得拉去了。可是我第二天找你去了，却连你的影子也没见着。你要喝咖啡吗？”

他们走到维亚蒙特大街的拐角，进了一家酒吧。在一阵沉默之后，费阿西尼开口道：

“那个意大利人告诉我，你没付房租就逃跑了，而且还偷了一个女佣人的手表，是真的吗？”

托里比奥迟疑了一下，随即微微点头。

“我以为是一只金表。”

“你做错了。”费阿西尼郑重地说。“我可以帮助你，可你要答应我一件事：绝对不要偷盗。有大的事情要做，偷盗是最坏的行为，因为使别人遭殃。同意吗？”

“好吧。”托里比奥同意。他透过店铺的窗子观里着光复大街，街上酒店林立，廉价咖啡馆、希腊餐厅、土耳其烟店和叙利亚杂货铺比比皆是。孩子们在街上玩耍，几个刚来的老人坐在人行道上晒太阳。突然托里比奥想起，生活是美好的，丰富多彩的，而他，托里比奥·托雷斯，将尽情享受生活--没有多少人能这样做。太阳照在他脸上。只听见费阿西尼在说：

“你看，小伙子。你知道，我开始的时候比谁都糟糕。我连大杂院都没有进，那里总能学会一些东西，而是进了国立学校，那里不会教你如何在马路上抓到一个傻瓜。起初，我用从家里偷来的一笔钱作资本，经营梳子和鞋带生意。我从来没能把这笔钱还回去，也没这个必要，我带着这些鞋带和梳子走遍布宜诺斯艾利斯各个区。这个买卖的微薄收入仅够维持我饥一顿、饱一顿的生活。在这些马路上做买卖是最糟糕的事情。那时真不容易卖出一东西，甚至一连几个月都做不成什么生意，连仍然做一点都很难。做小买卖是最糟糕的事情。哪怕你拿了一叠票面一百比索的真钞票，以每张五比索的价钱卖出去，人家也只会拿来对着光瞧一瞧，然后又退还给你。你别以为这

种小本生意是好做的。可难着哪，小伙子！即使你把一颗颗金豆子撒在马路上，也没有人会弯下腰去拣的。但是你如果弄上一个会耍嘴皮子的人，再带着一只猴子或一条饿死、冻死的蛇，即使你把铁皮当黄金卖，你瞧吧，那些傻瓜会排着队来把钱送给你的。这就是生活。你想改变这种生活吗？真的不想吗？这一点我倒想通了。我把那一包东西全都卖了，便在阿波罗电影院①中到处可遇见的傻瓜们当中混饭吃。一个家伙叫来一名打手，打掉了我几颗牙齿，痛得我死去活来。我买了报纸查找招工广告。我去了，他们给了我一包商品的样品叫我去卖。我拿着铅笔、信封等等东西整整奔走了一个月，一条街一条街、一个家一个家、一个办公室一个办公室地登门兜生意。这比同阿波罗电影院里的那些同性恋者打交道还要难办，那里至少有些花花公子还能给你一个比索。有一次，一个人问我要两打铅笔。第二天我给他送去了。我清楚记得那个家伙的模样：戴着深度眼镜。他用放在书桌上的小削笔器把铅笔一枝枝削尖，削到第二枚，铅笔断了，他便捆在一边。第三枝又是这样，所有削断了的铅笔都被放在一边。最后他一共只付了八枝铅笔的钱，而把其余削断了的铅笔退还给我。我拿了这些铅笔有什么用？我们吵了起来，嗓门越来越大，我骂了他。他叫来两个伙计，把我赶了出来。那天晚上我带着一肚子气回到房间里。我把那一包铅笔、信封和其他没人要的劳什子放在地上，后退两步，摆好踢罚球的姿势，然后往前一冲，使尽平生力气一脚，一面喊‘中！’那包东西飞了起来，撞在墙上，铅笔、信封四面散落。这样我才觉得安心了，第二天便换了工作。我去帮一个放大照片的摄影师干活。直到那时我还没有见过比这更好的差使，我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在这之前，我碰到的都是些眼皮朝上的家伙，你给他们看的任何东西他们都瞧不起。现在情况不同了。我背着一包上了色的放大相片的样品：有面颊红润的小孩，有好象是电影中的新娘，有胡子稀疏可数的老汉。这个叫尼卡诺尔的摄影师简直是个魔术师。譬如，他拿着一个戴三角披肩的老妇人的照片和放大的样片，他把三角披肩变成了方头巾，而那个洗了一辈子衣服的老妇人变成了刚从理发铺出来的侯爵夫人一类的人物。我看见他给二十年前死去的人们的相片安上发套、修剪鼻子、熨平皱纹、还给面颊上色。我们差不多是使人复活的妙手。我们的顾客从旧物堆中翻找相片，有时候他们整天在箱子中翻找，在抽屉里翻找，抽屉里放着早已被遗忘的本世纪初的发票和房租收据。我一次又一次地登门拜访，直到他们找到相片为止。于是他们把奇迹般的相片交给我：一对移民，一个意大利士兵，帽子上插着羽毛；一个裤子没过膝盖的小男孩，或者是一个脸色苍白、傻乎乎的卖鸡妇人。通常是老妇人的相片，或者是死去的丈夫，或者是结婚照片。我拿到这些相片后，并不立刻把它们收起来。我大胆地用讨好的话语表白我对这些面容清晰无暇的印象，不难猜想他们具有一连串不同的美德，而就在我们一致认为上帝把他最优秀的子孙召回到天上的当儿，我拿出单据本，问他们愿意预付多少定金。实际上他们本来没有想要预付什么定金，但在这样的时代很少有人预付几个比索的。这件事对于我是要紧的，因为如果我没有拿到定金，我的老板就不会预付给我一个铜板的工钱。我记得有一个礼拜在新蓬贝亚区我的运气特别好。那天晚上我高兴地回到摄影师的家。我刚刚招揽了十位顾客，其中六位给我预付了定金。摄影师正在暗室中工作。一会儿他出来了，干巴巴地同我打了个招呼。他是个机灵的老头儿，我想一定出了什么事了。我告诉他那一天我的生意如何如何好，可是我的老板一挥手不要我说下去。他说；

①专门放映黄色影片的一家影院。

“‘对你好，对我却糟糕。有人来告诉我，在这里工作的是一个小偷，你知道吗？’他用手指指着我，‘而这个小偷就是你。’”

“我反驳，但老头儿说：

“‘他们是从麦普造纸厂来找我的。他们上你家去了，没有遇见你。有人告诉他们你在这儿工作，于是他们到这里来告诉我，他们在造纸厂等了你一个月，不看见你回去，便上这里来找你。你还欠着他们一千个信封，几十枝铅笔和诸如此类的东西；还有几笔买卖的收入，还有一只提包，你也一直没有归还给他们。我不喜欢这样，你还是另找工作去吧。’”

“你今天的生意不错？收了多少定金？”

“我说一个子儿也没有。摄影师两眼直盯着我说：

“‘把钱交出来。’”

“我只是装傻。”

“‘什么钱？’”

“我忽然火上心头，真想指死这个可恶的家伙。我几乎冲着他的耳朵说：

“‘我一个子儿也没有。你要是不信，伸手到我的衣袋里来摸摸看……看我怎么敲破你的脑袋。’”

“老头愤怒地看了看我，倒退了两步。”

“滚出去：’他对我嚷道。我就离开了那里。”

“在家里，我气得一个晚上都在床上辗转反侧，不能成眠。天亮时我才睡着，但不久又醒来。我记得那天中午，阳光灿烂。我把所有东西都收在一只提包里。一点钟时，大家都在我住的旅馆里吃午饭，我便乘这时离开旅馆，谁也没有看见我。我把脏衣服、脏袜子和一件破衬衫留给他们，但在提包里装走了放大相片的样片和单据本。那天下午我在石头大街的一家旅馆里落脚。一小时后我便往市区去奔走。我从萨胡布大街到弗洛伦西奥·巴雷拉大街，走访了所有的顾客。他们认识我，我对他们大减价，卖给他们真正的便宜货。我只向他们索取一点定金，因为这是我的可恶的老板要求的--我对他们这样说。在‘最后决胜’时我喜欢孤注一掷；可是在做生意时应该懂得及时撤退。另外，我的正式的单据本用完了。一个礼拜当中我攒起了几千个比索，便不再继续奔走。不久，老头发觉了，报了警。警察到那家老旅馆来找我，没有找着。谁也不知道我潜逃到哪里去了。我却肚子朝天，躺在虎湖①的一个游乐场里逍遥自在，每隔一天便同一艘水果船上的几个巴拉圭人到圣费尔南多大街去玩乐一番。从那时起我便习惯于捞取容易得来的钱和喝饮苦味的马黛茶。在伊塔比游乐场里的那些巴拉圭人当中，我结识了蒂托·梅希亚。他是个了不起的家伙，切。他在亚松森②杀死了两个人，是一只捕捉女人的老鹰。”

“他在圣费尔南多大街有两个情妇。起初我以为是由于他的相貌和名声：他像个艺术家，而且大家都知道他在巴拉圭杀死了两个人。可是通过梅希亚，我又认识了‘耗子’，我就更莫名其妙了。这人是小个子，骑手模样，几乎连一米高都没有。我觉得他很可笑，扣眼里插一朵丁香花，手里还拿一朵不时地闻。他笑起来歪着嘴，露出几颗金牙。这个家伙在西乌达得拉有两家地下妓院。他和保守党人有交情，如果和警察发生任何纠葛，他便去墨隆亲自解决。他是妓院老板，又是高利贷者。他保护着梅希亚，而梅希亚则帮我的忙。有一天政府忽然封闭了妓院，于是他们改作买卖。梅希亚在科连特斯大

街上开了一家拍卖行，而我在光复大道上占了那块地方，就是你遇见我的那个地方。‘耗子’在跑马场附近开了一家酒吧，他从那里监视我们的商店，这些店是他开办的。每星期五，我们结一次帐。不论运气好坏，我们总会有点钱在星期天赌些马票，日子还过得去。有一天梅希亚对‘耗子’说，从那以后他们将经营袜子生意。于是两个人吵了起来。过了几天警察来把这个巴拉圭人带走了。据说，‘耗子’告发了他，他被移交给了巴拉圭。

但是谁也不去证实这一点，更不去批评‘耗子’的这种做法。”^①
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一个有名的风景区。

②巴拉圭首都。

托里比奥看着街上，心中慢慢产生一种印象：生活是美好的。在他面前展示着大街，大街上标明着各种道路，哪里有运气，他就在哪里行骗。他心里深感满意。疑虑已经烟消云散，他现在对自己充满了信心。阿尔贝托·费阿西尼就在他身边，这个人和他在同一个街区长大，经受了马路上的磨练。托里比奥想起那个巴拉圭人，想起“耗子”，又把自己和费阿西尼相比，忽然觉得自己比他们都高明。他试图给自己说明为什么产生这样的印象。他们都是说干就干的人，能够深思熟虑或者采取粗暴的行动，但是托里比奥却具备另外一些条件，表明他是个具有特别天赋的人。他不是一直梦想成为一名探戈歌星吗？当然，他是一位艺术家，他始终这样认为，现在则对此确信无疑。他看着首都的那条行人稠密的大街，并通过这条街想象着刚才费阿西尼谈到的那些人物。他相信不久他就会超过他们大家。“我是一个骗子，”他突然愉快地这样想。“我过去骗过雷翁西奥，现在也可以骗这个费阿西尼。我能够骗随便哪一个人。”这个信念在他脑中就象心中的一支歌曲那样越来越强烈。他惊奇地微笑起来，便打断费阿西尼的话说：

“那么你能帮我一点忙吗？”

“帮什么忙？”

“我是说帮我找个工作或者别的什么。”

“可以。”

他想了一下，说道：

“明天你可以去找那个巴拉圭人。”

“哪个巴拉圭人？”

“就是梅希亚”

“你不是说他被抓了吗？”

费阿西尼哈哈大笑：

“你只当我跟你说的都是真话，又都是假话。梅希亚是商人，他确实生在巴拉圭，但他没有杀过人。他可能随时被抓，但现在还在做他的生意。啊，你别以为我不跟你一样装蒜。我也只当对你的坏事一概不知，我不告诉他你偷过一个妓女的镀金手表。梅希亚从来不要小偷工作，而你……”

他用手抓住下巴，严肃地看着他说：

“你可别告诉他说我开玩笑地讲过他的过去。这个人不爱开玩笑，会生气的。”

“我什么时候去找他？”

“明天。”

他从报纸上撕下一片纸，写上地址，说：

“拿去找梅希亚，告诉他是费阿西尼叫你去他的，让他给你安排工作。”

他正在找一个象你这样的小伙子，会录用你的。我过几天我一个下午再去看你。我们走吧，小伙子？”

在穿过有斜度的维亚蒙特大街时，可以看见港口的大棚屋和大轮船上的桅杆。

阿尔贝托·费阿西尼感到两臂麻木，那四台强大的发动机好象就在自己的脑袋里嗡嗡作响。他向后斜躺下来，闭上眼睛，想睡又睡不着。他离开里约热内卢已经飞了六个钟头了，他感到自己已被旅行和担心弄得精疲力竭。他想睡一会儿，但不禁又将大拇指在裤腰和衬衫之间摸一下，感觉到缝在裤腰里的几叠胀鼓鼓的钞票。然后他又抬起身子看了看机外的夜晚。飞机好象悬在空中，在胶状的夜色中一动不动。云彩和时而出现的月亮也停在原地。只有强大而声音清脆的发动机在空中凶猛地嘶叫。

女侍者微笑着给他送上一条毯子，赛阿西尼不要，他有迷信的害怕心理，好象盖了这条毯子就会感觉有病似的。他的头越来越痛，便把女侍者叫来，向她要了一片阿司匹林。可是他觉得水象油一般地稠，差点儿没吐出来。然后他又斜躺下去，闭上眼睛，决心要睡一觉。他让时光轻轻过去，考虑着一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之后便要做的各种事情。

他想到托里比奥，这是处理他藏在腰间的钞票的最合适的人选。他想自己没有必要为了某些预感而心烦意乱，便归罪于长途旅行的劳顿。

突然他感到飞行中有一点奇怪的事。飞机慢慢倾斜并掉过了头。发动机好象更来劲了。出什么事了。好几个小时中，这个小小的飞行世界就好像一直在等待着某个遥远而模糊不清的东西，现在突然奇迹般地出现了。费阿西尼向四周看了看。指示牌亮了，叫大家要系好安全带。有人把脸凑近窗玻璃望外看，费阿西尼也把脸凑过去。

布宜诺斯艾利斯在下面闪闪发光，看到这般情景他真要唱起来，大声哭起来。在漂流着沥清的河边，灯光密密层层，以各种不同的形状和色彩向城市的夜空放射光芒。红宝石般的光芒密集而直线地射向这座平原城市的天际。最后，夜色和荒漠消失了：在潘帕斯草原的边缘，偌大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现在他们面前。

飞机飞过新港繁忙的码头，码头上耸立着高大的起重机，还有马德罗港口隐约可见的码头和里亚丘洛河边弯弯曲曲的大堤，一直伸展到基尔梅斯的高处。飞机开始在聚光灯和一排排紫色灯光中下降，这些灯光指示着飞机跑道，旁边就是爱塞萨机场的用玻璃和大理石建造的大楼。飞机的轮胎轻轻弹跳着降落地面，于是费阿西尼又想起缝在裤腰里的钞票，想起托里比奥，这天晚上他大概正在酒吧间里消磨时光。

他认为，在着陆的时刻，上述念头意味着一个明显的吉兆。当天晚上他就要去找托里比奥，甚至一看见他就把事情给他摆明，也许就在两小时之内。

但是他重新踏上陆地的这种欣慰的感觉没有持续多久。当他在等候海关检查时，他又感觉旅行的疲惫，并担心人家会发现他藏在身边的钞票。他自己打定主意：不想这些钞票的事，就谁也不会发现这些钞票。他点了一支烟，打开手提包，等候海关检查员走到他身边来。检查完毕，他还需乘坐一小时的公共汽车才能到达刚才他在空中飞过的那些灯火通明的处所，这些灯火好象一棵闪烁的圣诞树，透过沉沉的夜幕还在他眼前闪闪发光。

公共汽车在高速公路上又把他送进了黑夜。城市的灯光遥遥在望。他

们从矗立在平原上的几幢显出白色身影的摩天大楼中间穿过。城郊的灯光在远处看去似点点繁星，这时费阿西尼已经深深地睡着了。

“他假装帮你的忙，‘小加德尔’。瞧你那张小天使般的脸蛋儿！”比卡约发表议论说；既带着笑又带着敬意。“你要那张身份证和护照干吗用呢？你看你怎么想到收集奇怪的东西，托里比奥！你想到欧洲去旅游吗？”

“他们为什么不会给我那张证件呢？我从来没有进过警察局，除非是干了孩子的蠢事。”

“我也是这个意思。”

托里比奥向四周看了一眼，他的眼睛好象警觉地盯住坐在咖啡馆里的每一个人的脸。

然后他又向外面看，在集中着几家电影院的拉瓦叶大街上是一片密密麻麻、熙熙攘攘的人群。

“星期六不能到市中心去。”比卡约不满地说，企图这样来试探托里比奥在想什么。

托里比奥以无所谓的表情耸了耸肩。

“你愿意我们出去走一会儿吗？”比卡约问道。

“干吗？我在这儿报好。”托里比奥毫不掩饰地打起哈欠来。“可是如果你想出去走走，你就去吧。”

“我想跟你谈谈。”

“我听着呢。”

比卡约干咳了一声，不知从何开始说起。他是矮个子，厚嘴唇，塌鼻子，头发油光发亮。托里比奥对于能使他处于这样低三下四的境地，内心感到乐滋滋。“这是个可怜的家伙，”他心中想道。“当个拳击手，一个不高明的拳击手，并不难，比赛中让人把鼻子打扁，然后在大街上遇到哪个倒霉的人就打破他的脸，消消自己的大气。”

“我在听你说呢，老伙计。你想谈生意，是不是？”

“对，托里比奥。你知道，这几天大个子费阿西尼就要从巴西回来了。就在他动身以前，我跟他谈了，让他给我安排个地方。”

“你想给我设圈套，”托里比奥想道，便漫不经心地问：

“大个子对你说些什么？”

“他叫我等他回来，并且说这取决于你。”

“对，”托里比奥点点头，“是取决于我。”

他又装得若无其事，接着说：

“生意是他交给我的，由我考虑如何做这笔生意。”

他停了一停，又说：

“此外，搭档由我选择。”

“所以我才要跟你谈呢。”

“干吗？”

“得了吧！”比卡约脸红得象只西红柿。“什么干吗？让你给我帮帮忙。”

托里比奥从口袋里拿出一支烟送到嘴边。他把烟匣留在桌上，找打火机。他在旁边柱子上的镜子里照了照自己：一张年轻而忧郁的脸，本地人的活泼的眼睛。他唇边强作苦笑，把丝织领带的结拉一拉紧。“我象乌戈·德尔卡里尔”^①，他对这一发现感到满意。“我可以拍电影”。接着他又看看大街上；一群陌生的脸在寻找每个星期的节目。

他们在电影院门前排队，这些电影院在拉瓦叶大街上挨着挨着。他觉得自己比卡约和那一群人之上。“我是艺术家，我可以叫任何人相信我想说的话”。他点着香烟，喷出一口长长的烟雾，象是满意地舒了一口气。“我会说单口相声，是个艺术家”。他指着在电影院的灯光下排来挤去的人群说：

“这帮饭桶，他们就会认识我的。”他自言自语着，沉浸在一种奇怪的激动之中。

比卡约两眼看着他，等着他的回答。他说：

“你不再打拳了？”

“现在不打。我身体超重了，要恢复原状得费些功夫。”

①阿根廷有名的探戈曲演唱家。

“你得好好费些功夫。推着水果车在街上走或者成天挥动铁锤，这样来促进肌肉发达，那倒容易。难的是要会打拳，这一点是长在血液里的，”托里比奥带着轻蔑的眼光想道。

“我也一样，探戈我已经有一年不唱了。”

他又照了照镜子，接着说：

“我要是再不练的话，声音和节目就都要丢弃了。”

“这太可惜。”

“当然。”

他带着思念的神态看了看电影院灯光通明的前厅里挤满的人群。突然他用手一挥，手指捏出“啪”的一声，叫侍者过来算帐。

“你要走了吗？”比卡约吃惊地问。“我同你谈的事情呢？”

“我必须等大个子回来。在这之前什么也办不了。”

托里比奥打开他的钱包，有意小心地摆弄一番。他偷偷看见比卡约脸红了，最后低声说：

“那么现在你能不能借给我几个钱？你知道我现在的处境……”

托里比奥拿出一张十比索的钞票放在桌上说：

“拿去吧。”

然后他站起身，又紧了紧领带上的结。

“我走了，比卡约。”

他挤在拉瓦叶大街上游逛的人群中往前走。

费阿西尼干咳着，不知如何说起：

“就这样，我今天晚上回来了。第一件事情就是请你吃晚饭。我们到托里比奥去？”

“好，就是还早了点。”托里比奥回答。

“我已经肚子饿了。在巴西我学会了早吃晚饭。两个月尽吃龙虾大米饭和菜豆大米饭。今天中午我吃了两块牛排，今天晚上我还要这样吃。我觉得自己象只饿虎。我渴，想喝酒。”

“好吧，我喝完这杯苦艾酒就同你一起走。”

拉瓦叶大街现在比较清静些了，行人不象原来那么密集了。托里比奥看到酒吧间里有一个人好象在对着咖啡杯自言自语。

“你从来没有想到过观察单身一个人？”

“你总是想些奇怪的事情！我从来不管这种事。”

“我却总爱这样做。我曾花整整地个小时观察一个单身的人在做些什么。”

我这样做并不仅仅是为了取乐，而是为了了解生活和各种各样的人。你记得吗？我曾在塔尔卡瓦诺大街的那家旅馆里住过。那时我无事可做，便成天观照着旅馆里的人。以前我同姨父一起住在大杂院里时我也这样做过。”

费阿西尼对这个话题感到兴趣，他想问他什么，但又没说，只是讽刺地微微一笑：

“那你学会了许多事哩？”

“你是抢着我，但也没关系。我当然学会了许多事。譬如说，我明白了，最好斗的人是最倒霉的。”

“你这个不是说我吧……”

“你想得出来！”

“还有什么？结果很有趣，是不是？”

“有趣，有教育意义，而且使人振奋。因为这个世界就是一个舞台，满台是蹩脚的艺术家的，一辈子重复一种枯燥的角色。”

他指着自己，自鸣得意地说：

“但是我是个单口相声演员，我能演得好一些……但现在我要谈别的事：你从来没有观察过别人，在他只是一个人并且不知道有人在看他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是在舞台之外，于是你就象是看见一袋土豆穿着一身人的衣服。这个家伙把手指伸进鼻孔里，站在镜子前面，一脸傻相，张开嘴巴看看自己的舌头，躺在床上或者在房间里转来转去。这种人和一条蛆虫是一回事。他只等着轮到他吃饭、睡觉和死去。”

“你这种哲学真见鬼！”费阿西尼打断他。“我们上餐厅去好不好？”

“你等一等。”

托里比奥敏捷地向四周看了看，然后说：

“你要跟我谈一件生意，是不是？”

“吃饭的时候我再跟你说。”

“我情愿在咖啡馆里谈。”托里比奥回答。他做了一个含混不清的表情，好象是说：“生意你就在这儿跟我谈吧，趁头脑冷静的时候。”

费阿西尼耸了耸肩，从口袋里摸出两张二十美元的钞票。

“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你说吧。你觉得怎么样？”

托里比奥看都不看一眼那两张钞票，他用手指尖把钞票又推到费阿西尼面前。

“我看不出来，但我想是假的。”

“也对也不对。一张是真的，一张是假的。你知道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吗？很难看出来。”

“我想任何一个老练的家伙都能马上说出来。”

“可能是这样。”

“印这些钞票是危险的，应核想些新的办法。”

“所以我想到了你。”

“是不是对半分？”

“你疯啦，小伙子？别开玩笑啦！在这上面我已经花了一笔钱了。我还买了一些真的美钞把它们掺和在一起……你要是能办些事并且办成，我考虑给你一笔酬金。百分之二十，你觉得怎么样？”

“让我想想。现在我们吃饭去，好不好？喝上几杯酒我会想出什么点子

来的……”

他们走出咖啡馆，朝河边走去。

托里比奥环视了一下宽敞的办公室，最后把眼光落在工程师加西亚·马丁内斯身上。

他是矮胖身材，两只锐利而狡黠的眼睛直盯着来人。他收住笑容，问道：

“那个东西您带来了吗？”

“当然带来了，工程师。我就是为此而来的嘛。”托里比奥回答，并递给他几张绿色的钞票。

“有多少？”

“两百美元，请您点一点。”

工程师俯下身子，在写字台上按了一下铃。

“我并不急着要收钱。”托里比奥声明，同时寻找着对方的目光。他知道，这种目光传达一种信任和热忱的感觉。这一点他是在脑子里设想有这种真诚的感觉时学会的。

他把这称之为“演一场好戏”。

“您可以叫人检查一下。”他又说。

“啊，行啦！”工程师回答。

“请您听我的！我也认不清。钞票是旅馆里一位顾客交给我的。他是个可靠的人，但这也不能保证别人不会塞一张假的过去。”

这时进来了一名职员。

“里卡多先生在吗？”

“他刚到，工程师。”

“请您等我一会儿，年轻人。”他们二人出去了，托里比奥一个人留在办公室里。

他想，他们一定是去找一个积钞票的人来一张一张检查的了……一定就是那个什么里卡多。他希望这第一次交货就让他们这样检查，所以他交出去的全是真美钞。但是他刚才从那个胖乎乎的人的眼神里看到有一种不信任，而在拿到钞票时又显得十分平静。几分钟以后他又回到了办公室。

“很好。我该给您多少钱？”

“一美元换二十五比索零二角，总共五千零四十比索。”

“您原来表示只按整数卖给我。不然我可以找另一个熟人买，而且保证不会有差错。”

“我的美钞也和别的任何美钞一样的可靠。”托里比奥回答说，态度坚定而得体。

“我不否认，可是我们讲好是按二十五比索零一角兑换的。”

托里比奥仔细地点清了是五千零二十比索。

“另一批美钞您什么时候给我带来？”工程师又问。

“按同样的比价吗？”

“当然。”

“我觉得不太合适。但是，看情况吧。旅馆里有一位旅游者想换一千。您想换吗？”

“我甚至可以换一千五百。”

托里比奥站了起来。

“您有电话吗？”加西亚·马丁内斯问他。

“没有，先生。”

“真是奇怪，这个旅馆里竟没有电话……”

托里比奥抱歉地微微一笑，工程师举起他一只胖乎乎的手一挥，说：

“我明白，他不愿意受李连。您别以为我看见您这样多疑会不高兴，我也是这样的。”

我每买进一张钞票都要叫人仔细检查。再见，年轻人，回头见。”

一架巨大而满载的电梯把他带到了底层。人们都匆匆忙忙，把他直在大街上挤。他走上巴托洛梅·米特雷大街，不多远便挤进了花街上的人群中。他下意识地朝科连特斯大街走去，但突然又停住了。“我必需要么现在就干，要么永远也别干，”他想着，紧咬着牙关。他向四周看了看，一群陌生的脸把他在北面拥。隔几个街区，阿尔贝托·费阿西尼就在科连特斯大街的一家酒吧间里等他。托里比奥转过身朝南走去。他穿过五月大街，走上了秘鲁大街。他觉得这条街上人太挤，便又折向河边走去。他到了圣特尔莫区古老的大街上，来到一个他过去从未见过的小广场。他曾常常想起要认识一下城里从来没有到过的地方，而现在来到这个小广场，周围都是古老的建筑，使他产生了一种距布宜诺斯艾利斯有许多公里、远离那个酒吧间的感觉，费阿西尼正在那里等着他，以期了解他出卖美钞的结果--一叠假钞票他带在衣袋里，已经没有希望再把这些钞票转给工程师了。他感到振奋：这些陌生的街道好象跟城里其他地方无关，使他感到有一种令人鼓舞的好兆头。他环视周围，想找一个休息的地方，便走进卡洛斯·卡尔伏大街的一家咖啡馆里坐下。

这时，费阿西尼开始不安起来，但他还要再等一小时。这是他们原来讲好了的。然后费阿西尼可以作各种设想，包括托里比奥已经被捕的可能性。一个人在兑换一千美元的假钞票时被捕，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费阿西尼肯定将动员一切情报手段，但谁也没法告诉他什么。即使在托里比奥住的旅馆里，人家也说不清他是怎么销声匿迹的。简单说来，托里比奥在当天就不见了；他睡了午觉出去后就再也没回来过。

因为托里比奥决定要离开这个咖啡馆，离开他住的旅馆，离开这个城市，离开这个国家。他带着这笔钱想找一个费阿西尼永远没法找到的地方去。他在那里将演唱探戈，远离故乡会使他演唱起来更带感情。他肯定会取得成功，现在就可以掂量他受到崇拜时的感觉。那时他将会有许多朋友，一个陌生国家里的朋友。他将出席盛大的集会，身边都是向他表示欢迎的穿着节日盛装的姑娘们。为什么这种想象不能成为现实呢？突然他又担心这一切都是诡计。他是个单口相声演员，经常用他编造的乱七八糟的事儿去骗人。

难道就不会发生他自己骗自己的事儿了吗？有时候他害怕会发生这样的事儿。他刚才卷进了什么糟糕的事儿了呢？费阿西尼会四处找他，知道自己被出卖了，他会当场把他杀死。托里比奥看了看绿树成荫的广场，四周是墙壁和古老的房屋，他对自己说：“我成了孤家寡人了。”

他不再想费阿西尼，用眼睛扫视了一下这个阴郁的地方，最后两眼盯着面前的白瓷杯子，撒出来的咖啡的印子好象画出了一幅地图。这个图样大概和桌上刀子的商标一样，该有一种意思的。也许是整个合在一起有一种意思，也许是每件有一个意思。广场上的树木，咖啡的印子，都指出他刚开始的这场新冒险的预兆。

他付了咖啡钱，朝南方走去。

突然，他在穿过宪法广场时感到极度疲劳，他的两只脚在石板地上拖着走。他低头沉思，两眼看着自己的鞋头。他走在这条尘土飞扬的小路上，回想起自己少年时在帕勒莫大街的公园里长时间徘徊，足球比赛循环进行，以及在河边来回奔跑。离他不远有一个水池，里面喷出一道水柱。他象小时候一样贪婪地喝水，喝得透不过气来，好象有人会前来阻止他喝水。喝足后他便抬起头来，嘴上湿淋淋，喘着大气。为什么在一个广场的水池里贪婪地喝水这一简单的举动就把他带回到已被遗忘的时代了呢？他那时大概有十二岁，或者十三岁，是个内地的少年。但突然帕勒莫区的大街抓住了他，他开始变成另一个人了。他变得好斗，因为他觉得自己处在一种充满敌意的环境中。他开始学坏、撒谎，因为他觉得自己太软弱。现在，在喷出一道水柱的水池边，他感到伤心、害怕，好象当他成了孤儿初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来住在他姨父家的时候那样。他抬起头，透过公园的树丛看见了高大的终点站站牌。上千辆车子喧闹而缓慢地从火车站前面开过。他说不准他自己是要从这里开始外逃还是逃到这里为止。他继续朝车站走去，身上从来没有带过这么多钱，也从来没有这么好的逃跑机会。然而，心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忧虑使他在覆满尘土的小路上迟缓地拖着脚步。他穿过几排公共汽车和无轨电车，超过加拉伊大街，混入从地下铁道的出入口上来的人群中，并被人们拥挤着向车站大厅走去。在这个教堂式的拱顶下面，他努力克服自己的紧张心理。火车时刻表上标明着开往南方各地的车次。他在人群中可以感觉到各个站台：一、二、三、四……从第一至第十四站台都用大字标明，每一条站台都诱人外出；十四条铁路都可供人逃跑。他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便利的条件，但也从来没有感觉这么困难，这么难于实行一个决定。

在明亮而庄重的拱顶下，响起了火车头的尖厉的汽笛声。两列火车同时从第三和第七站台开了进来。另一个火车头也鸣起汽笛，准备开出，上百个从地下铁道的出入口上来的人象发了疯似的跑过去。托里比奥两腿发软，他让开了道，以免被人撞倒。有一刹那功夫他曾感觉这些迟到的旅客好像是朝他冲来。“我是个叛徒，一个倒霉的叛徒，”他这么想。他感到孤独，完完全全的孤独，便走出边门，来到利马大街。往南伸延着一长排杂乱的小吃店、墙壁上挂着粗糙的装饰品的酒吧间和鳞次栉比的不干净的老旅馆。

托里比奥感觉在车站外面要好一些，似乎他没有企图带着费阿西尼的钱逃跑了。最好暂停外出；为了站得住脚，他想最好先买一只手提箱和几件衣服。一个旅行的人一点行李不带总要引起怀疑的，会给人以逃跑的感觉。最好不要马上外逃。他走进迎面遇见的第一家旅馆：“新巴斯科尼亚”旅馆。

“您有行李吗？”一个卷起衬衣袖子的人向他迎上前来问道。

“我留在站上了。”

“您要不要叫人去把行李取来？”

“不必了，我不急用。”

他停了一停，又说：

“也许我过两天就走，现在我要您给我开一张两天的住房单。这是我的证件。”

他把自己崭新的证件递给了旅馆老板，老板接了过去。

“过一会儿我把住房单给您送来。”

托里比奥想起在塔尔卡瓦诺大街租用旅馆房间时的情景。过了多长时间了？

那时他冒险的结果就是在一个简陋的旅馆里形影相吊，现在他感到苦闷，又在一个同样的旅馆里形单影只。他脱下帽子丢在桌上，感到额上有发粘的东西。他用手帕擦了一擦，一看：脏了。他一定一直在出开而自己却没有察觉，也许是发烧了。他看了看旅馆老板；老板张开嘴巴，打着手势说：

“澡堂在走廊尽头。餐厅在下面，吃的是家常便饭，由我妻子准备。九点吃晚饭。”

是的，过去几年了。这个脸色红润的西班牙人一点不象“新意大利”旅馆的那个意大利人。他自己也不是原来的样儿了。正是这样：他变了，他感到不安和孤独。

他惊慌地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房间里一片黑暗。有人敲门；他下了地，朝门口走去；他摸着墙，找到开关，开了灯。他的上衣落在床脚边读成一团，帽子滚到了地上。他想弄清楚自己睡了多长时间，谁在敲门。敲门声又响了起来，他把门打开。站在门口的是旅馆老板，手中拿着一张单子。

“我以为您出去了，但我也想您可能睡着了，旅途一定劳累了。但您这样不脱衣服、不吃晚饭就睡是不好的。”

“可能有道理，”托里比奥说。“您把住房单带来了吗？”

“带来了。两个晚上，您是这么吩咐的。请原谅，谁要是不带行李住店，应该先付房费。”

“等一会儿。”托里比奥走过去拿起扔在床上的上衣。

他背朝着旅馆老板，把一叠钞票从上衣的内袋里拿出来。他觉得茫然不知所措，但手摸着这些钞票，便又慢慢觉得放心了。他抽出一张一百比索的钞票，转身交给了旅馆老板。

“一会儿我把找头给您。”老板定了，随手把门带上。

房间里只有托里比奥一个人，他又把那一叠钞票从口袋里拿出来。他看着这些钞票，心中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既感到放心又感到害怕。当他想到要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再留两天时也是这种感觉，好象是把他刚才进行的“打击”推延一样。他在这个旅馆住下时，还没有逃跑，还没有背叛费阿西尼。当他逃离这个城市时，便是背叛费阿西尼了。

但是他不得不这样做。他又对这些钞票望了一阵，不可能再交还给费阿西尼了。

旅馆老板又来敲门了，他交给托里比奥五十比索的找头和他的身份证。然后，托里比奥不知道干什么好。他生平头一回感到孤独，被人抛弃，而毫无办法。他在床边坐下，两臂下垂，脑袋里空空如也。

他想起科连特斯人雷翁西奥，想起玛尔戈特，想起费阿西尼，现在在这个空荡荡的房间里他把他们都召集来了。

托里比奥走到街上，走进宪法车站。他已经在旅馆里住了两天，不敢外出旅行，也没有心意继续呆在这个城市里。虽然他担心会碰见什么人把他告发出来，但他还只是在挤在宪法车站上的人群中的时候才感到好一些，这时人们喧闹着往四面八方奔走，火车头喘着气一直开到水力缓冲器前面。在这个教堂式的拱顶下面，沸腾着千万人的紧张而高度压缩的生活。托里比奥想起自己就要离开这个城市，便觉得为难。

他看了看表，是七点钟。两天来他一直想打这个电话。他找到电话机，接通了比卡约住的旅馆。

“喂！你知道我是谁吗？当然是我！为什么？托里比奥·托雷斯没有藏

起来！更不会躲避他的朋友们！你听我说，比卡约，也许你不会相信，可是我找你是为了向你提供一个你一生中了不起的机会。别再在咖啡馆里消磨时光了！阿尔贝托怎么样？你怕他吗？我可不怕他、他在找我？我就在这里，非常满意。他随时都可以来。不，我离你们不远。

我在宪法车站给你打电话。如果你坐上飞机马上就来，你还会遇见我在电话机旁。听我说，比卡约，我找你是为了向你表明我是一个朋友。我就要外出旅行去了。是这样的，老朋友。布宜诺斯艾利斯对于我来说已经结束了。以后我再告诉你我要上哪儿去。也可以说上天涯海角，反正是要远离这个费阿西尼和他那一伙！板起面孔让‘瘦子’把钱都拿走，够了！现在我要以唱歌为业，最好是在外地、在某个省的电台上开始。我有了一点钱，一切会顺利的。我想起了你。你为什么要在那个可恶的‘瘦子’身边消磨一辈子呢？费阿西尼当然过得很舒服！他有生意，不断旅行，而我们这一大帮可怜虫却替他干活。我是说单口相声的，你是‘吹鼓手’。干吗？我们赚的钱几乎只够付旅馆资。你记得我们口袋里曾经有过一百比索的吗？没有过吧？那你就听我的话，我是作为你的朋友才对你这么说的。我突然想起与其一个人走，不如最好和一个朋友一起走，我便想起了你。当然我有了一点钱，可以借一些给你。现在我想我们可以到门多萨夫，你一定会喜欢的。在那里你还可以经常到体育馆去，你还年轻，可以重返拳击场。在内地会好办一些，我会帮助你的。好吧，你同意，我很高兴。对，当然我们可以详细地谈一谈。为什么你不能决定呢？听我说，比卡约，我的老朋友，现在我请你帮个忙。你到我住的旅馆去把我的衣服拿出来。我跟罗萨里奥太太说我在火车站，我要外出旅行，需要一点衣服。

我就缺一只手提箱，而你有两个。所以请你帮个忙：你带一只手提箱到我的旅馆会，把我的衬衣、蓝色外衣和衣橱里别的衣服都拿来。那个老太婆不会反对的，上个月我给她付过钱了。另外，收音机还留给她，虽然旧了，但能用。把这台收音机留给她是有点可惜，不过我也实在不想回旅馆去。我想费阿西尼那个瘦子一定在那一带转游。我想他一定很冒火，但请他忍着。啊，比卡约，我的老朋友，你别忘了在提箱里给我放几张唱片：请你把所有加德尔的唱片都装过去，再放几张科尔西尼①的唱片。请你小心地把唱片放在衣服中间，这样不会弄破。好吧，你接受我的建议，我很高兴。现在我就给那个老太婆打电话，让她把衣服交给你。你愿意先给我把衣服送来，一道谈谈外出旅行的事吗？你要是认为合适，我们可以今天晚上就碰头。我请你吃晚饭，九点钟我在火车站等你，宪法车站，在火车运行表的前面。再见，老朋友。”

①阿根廷著名的探戈曲演唱家。

比卡约挂上电话，耸了耸肩。他穿过门厅，走进自己的房间。阿尔贝托·费阿西尼斜靠在床上等着他，鞋子就放在印着红色和黄色阿拉伯图案的床罩上面。

“是他吗？”

“是他。”

“他告诉你他在什么地方了吗？”

“今天晚上，在宪法车站。”

费阿西尼一下子跳了起来。

“现在是几点钟？”

“七点。”

“我们下去喝点东西，我最好是喝一瓶杜松子酒。”

“你最好请我喝苦艾酒。托里比奥等着我吃晚饭呢。”

比卡纳哈哈大笑起来。费阿西尼仔细照了照镜子，戴上了帽子。

“这个蠢货！他舍不得丢掉衬衣，现在连牙齿也得丢掉了。”

他指了指衣橱顶上用报纸包着的一个包：

“这就是手提箱吗？”

“对。”

“拿下来，对我们很有用处，这样当地看见你赶去赴约时，就不会怀疑你了。你叫他带你到他的房间去，或者别的你们可以安心谈话的地方，我跟着你们。”

比卡纳用毛巾拭去手提箱上的灰尘。

“这手提箱真好看。”

“是猪皮的，”比卡纳说。“我在外商旅行的时候买的。又坐火车又坐汽车，他吸着尘土，从旅馆到客栈，真是倒霉的差事！而那个家伙竟想不出好事来，还叫我陪他旅行去！包涵一点吧！”

“你在外面进行拳击比赛时，吃的拳头比尘土还要多。”费阿西尼取笑他说。“看你有没有力气把手提箱拿起来。把墙角的杂志和报纸装一些进去，让箱子有一点重量，这样就会更自然些了。”

“你来得正好。”

托里比奥的声音里颤动着感谢。看见朋友到来，他自己也觉得安全了，现在他可以上天涯海角去了。

“把手提箱给我。”

“你不用麻烦了。”比卡纳回答。

“你把我的衣服还是你的衣服拿来了？”

“两个人的都拿来了。”

“我们上我房间去把手提箱放下。”

一阵短暂的静默。托里比奥看了看四周的人群，他们正在匆忙地奔向宪法广场上的十四条站台。在这个阴森的世界里，每一张脸都显示出他日常的些微紧张而失望的情绪；这时看到有一个朋友决定陪伴自己出去冒险，是令人宽慰的。由于即将离开这个城市，他感到四肢无力，他对这种感觉有点奇怪。“难道是因为背叛了人而有这种感觉吗？”托里比奥时刻这样想。所以他才需要有个帮手陪着他，这个人可以证明是他们两个人--而不是他一个人--这样干的。

“就在那儿，那一家旅馆。”走出利马大街时托里比奥说。

他们走进一家宽敞而陈设简单的酒吧间，墙壁上画着开了花的藤架的风景。

“你住在这儿吗？”比卡纳问道。

“我在楼上有一个房间。就住两三天，等我把东西准备好就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

比卡纳扫视了一下这个地方，做出一副不理解的鬼脸。

“我躲在这儿是为了让人家不能追踪我，万一费阿西尼去检查旅客名单呢？但是我一旦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之后便再也不住客店了。从现在起我要住高级旅馆了。”

“美钞你都换掉了吗？”

“当然。”托里比奥撒谎。

“真的和假的都换掉了？”

“对。”

“那你该有一大笔钱了。”

“差不多。侍者在等我们呢。喝点啤酒吗？”

“好的。”

“待一会儿我给你要个房间。我们在这里吃晚饭，商量一下到外地去的事。”

“好的，待一会儿我们把一切都安排好。”

侍者送来一瓶啤酒和两只杯子。他走后，有一个人走近他们的桌子，站在托里比奥身后，一只手放在他肩膀上。托里比奥看见比卡约把帽子往脑后推了推，向来人问候，从牙缝里挤出一声：

“你好！”

生人的到来似乎烧灼了托里比奥的后脑勺。他转过身去，看见是阿尔贝托·费阿西尼。这时他什么也没有想，只是转过一系列荒唐的念头。比卡约学着费阿西尼的样子，说话时绷紧着嘴唇。现在他明白了费阿西尼说话的样子，他的眼睛盯着这张冷酷得出奇的嘴巴，象是一把青灰色的刀锋插入肌肉里和关节缝中。这张嘴巴歪斜着说：

“我希望你们让我坐在这里。”

托里比奥没有回答，看着那只瘦小而苍白的手倒了一杯啤酒。

“为我们的全面干杯。”费阿西尼把那杯啤酒慢慢喝完。

托里比奥转过脸去看着比卡约。

“我饶不了你。”他心中想道。

一会儿之后费阿西尼站了起来，一只手放在口袋里握着一支手枪。

“你住在这儿，是不是？现在我们上你房间去。比卡约，你拿着手提箱，抓住他的胳膊。”

“你为什么这样子，比卡约？”托里比奥在上楼梯时低声地说。他扭过脸去，看见比卡约脸色发白。

“我以前总认为你太活跃，你带着我一道去胡闹，”比卡约说。“这是危险的。你干吗叫我来？是要讥笑我是吗？”

“我把你当朋友看。”

他们已经走上楼梯，托里比奥停住脚步，又说：

“我曾相信你是一个真正的朋友。”

他感觉到对方的手紧紧抓着他的胳膊。

“我跟你说的完全是真话。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

“你有哪一次说过真话的，托里比奥？”

“是说过的。”

“几年以前？”比卡约笑道。

“刚才我跟你说的是真话。我感到孤独……便想起了你。”

费阿西尼走上前来。托里比奥感到枪口紧紧贴在自己腰部。从走廊那一头走来一个人，戴着贝雷帽，走进了卫生间。

“哪一个是你的房间？快走，要不我就在这儿打死你！”

托里比奥往前走了几步，在一个房门口站住，喃喃地说：

“你们在外面等着，我进去给你们把钱拿出来。”

“是这儿吗？”

“是这儿。”

他的下巴上挨了一拳，身子摇晃了一下，但比卡约牢牢抓着他的胳膊。他们打开房门。他的腹部又挨了一拳，痛得弯下腰去。他们把他一推，推倒在床上。

他感到自己脑门象是被敲了一棒似的要爆炸开来。他立刻明白，一切都完了，因为当他感到十分孤独要找一个朋友的时候，说了一次真话。

神秘的五元钱

这里叫街口旅馆公寓，虽然事实上它并不在什么街口，而是在一段街区的当中。也不象个旅馆，因为埃斯基纳（这就是老板的名字）并不管吃饭，也不管泡马黛茶的开水，甚至连我们肚子突然痛起来时要喝点茶的热水都没有。这个埃斯基纳把沿冷藏库的大墙用木板搭起来的几间小屋出租给我们，从冷藏库那一边传来相当厉害的冷气和潮湿。他之所以把这叫作旅馆，仅仅是为了把这种房间按日子租给我们，而当我们拖欠房租时或者干脆他就是想要刁难我们时，就把我们赶走。

我们各人租各人的房间，一点一点地把我们的东西搬来或者一次搬来：一张轻便床，一个垫褥，一两把椅子，一张小桌子和炉子。年岁最大也是住得最舒服的房客，是加利西亚人维森特。他在庇隆第一次当政的年代里干的是勤杂工的工作，那时在烹调这一行干差使的人可挣大钱哩。所以这个滑头占用了旅馆里独有的一间砖房，有人说这是最阔气的房子，以前是老板埃斯基纳自己住的，房里一色家具齐全。当这个加利西亚人向老板表示，他愿意付双倍房租时，老板就把这一切东西都让给他用了。正如我们常说的：有钱能使鬼推磨。

我对这位加利西亚人维森特确实不了解，因为我想一挣到几个钱就离开这个旅馆，再也不回来。就象加德尔成名之后所做的那样，当时他离开了阿巴斯托这个地方，甚至连买水果也不回去。所以我要是成了名，也要这么办。我要和人们一样的衣着，同阔人交朋友。正如我在杂志上看到的关于加德尔的生平的记我那样：他同安德雷纳和威尔斯亲王那样的阔人交上了朋友。因为这样才能学会生活中的好事，而把坏事忘掉。难道这位加利西亚人不知道，贫困是一种比感冒更有传染性的疾病吗？我可是知道的，所以我要远走高飞，可不要因为混迹于穷人当中而传染上这种病！

我住进街口旅馆公寓是当我从家里逃出来的时候。我在拳击俱乐部里顺当地过了几天，然后进本区一家印刷厂当徒工，学排字。加里巴尔弟送给我一把椅子和一张小桌（这是他从自己家里拿来的），我从俱乐部里拿来一个褥子。我把报纸当作毯子，头几天就这样打发过去了。墙上钉有钉子，我把拳击时穿的短裤和练习用的手套挂在上面，至于其他衣服就一概穿在身上，不用想什么衣橱之类的东西了。

这家旅馆公寓的真正奇怪的事情（除了它既不是什么旅馆也不是什么公寓之外）是所有的房客都在晚间上班或游逛（反正都一样），而在大好的

白天却都睡觉。埃斯基纳不得不和他的房客们一起作息，晚上他必须看着房间，监督进出的人，并向他们收钱。

原来他住在那间砖房里时，这样做是最方便了，因为砖房就在大门口，而他搬到里面一间屋子以后，要这样监督进出的人就困难得多了。

那天晚上，我从拳击俱乐部训练回来时精疲力尽，一走进我的房间，我竟不能相信我眼前所看到的事：一张五元钱的钞票放在桌子上。现在我好家还看见这张钞票就在奶油饼干桶旁边放着，上面压着水壶，以免一阵风把它吹走。我拿起钞票，翻来复去地观察，寻找里面有没有诡计或者恶作剧。这一点不是什么幻觉；确实是一张钞票，不很新，但也并不太旧，一张普通的五元钱的票子。

我走到房门口，看看空荡而黑暗的走廊里有没有人走过。只有一向可以听见的冷藏库里马达的隆隆声，没有其他声音。我担心有人躲在那里象小偷一样在黑夜里窥视，便又回到我的房里。我关上灯，捉摸起这件神秘的事来。我不能相信这张钞票会径自飞到我的桌子上；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上面就不会有水壶压着，不让它继续飞。

我在黑暗中设想一个精灵的脸，和我的脸很象，咧着嘴在微笑；他个子矮小，戴着和我一样的帽子。可能就是自己在向运气微笑。突然，我什么事也不想了：由于训练的疲劳和那天晚上的激动，我睡着了。

第二天上午，走廊里传来的呼喊声把我吹醒。象往常一样，由于空腹训练，我感到头痛。

埃斯基纳站在外面，穿着龌龊的蓝白条睡衣（既是苦役犯又是爱国者）
①，房客们都围着他。维森特把他逼在墙边，好象是拳击场中把他逼在绳子上一样。

①阿根廷的国旗是蓝白色的。

“我们大家都被偷了，而你是负有责任的旅馆老板！怎么你没有过错？”

他向埃斯基纳挥拳威胁，好象要揍他，但却只用一只粗大而颤科的手指指着，仿佛一支将要射击的手枪：

“而你还拿着我现在住的房间的钥匙！你怎么说，哎？我有没有责任？”

加利西亚人看见了我，又冲着我问：

“你被偷了什么？”

“偷了我？”

“小偷偷了全旅馆，也进了你的屋子，是不是？”

“小偷？”我吃惊地睁大了眼睛。

“偷了你什么？”维森特又问。“好好看看，一定少了什么。”

“我什么也没丢。”

大家都奇怪地看着我。

“那么他们偷了大伙儿，就没偷你？你是有神保佑还是怎么的？”

“好了，”埃斯基纳说。“这小伙子大概在房里，所以小偷设进他的屋。”

“大概是这样。”我突然来劲了，表示赞同。“我从俱乐部回来时累极了，关好房门马上就睡觉。我什么也没有被偷……他们能偷我的什么呢？酒精炉、奶油饼干、马黛茶？”

我想起了水壶，但我没有说，因为正是在水壶下面我发现了五元钱的钞票。

维森特放下他那只好象有半吨重的指着人的手指头，无可奈何地说：

“耐心点儿吧：我们什么也不是。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倒霉。最好是上警察局去。”

“等我穿衣服，然后我去报警，”埃斯基纳讨好地说。“我也被偷了。”

大家面面相觑，好家慢慢从一场恶梦中醒来，由于被偷而伤心的余味未尽，但已经没有开始时的那种失望情结了。

“你们应该有几个人陪我上警察局去，作为受害者、证人什么的。难道我们不是一样地被偷了吗？”旅馆老板又习惯地抬高了嗓门。

“您别算我，”维森特推辞说。“我在咖啡馆里干了一个通宵，现在困死了。”

埃斯基纳的眼睛巡视了一下所有的房客，显然，谁也不对上警察局去感兴趣。突然他指着我说：

“你呢，小伙子？你已经睡过了，跟我来吧！难道你也害怕监狱？”

我批命摇头表示拒绝，好象埃斯基纳要把我带到地狱里去似的。我的手在衣袋里紧紧抓住那张五元钱的钞票，甚至把指甲嵌进了手心。

加利西亚人维森特象狮子般地张开大口打哈欠，并说：

“要是我们就让事情这样算了，怎么样？到头来，无论埃斯基纳还是警察都不会归还我们什么东西，而我们倒失去了一段宝贵的时间，这时间对我来说等于是现金。所以最好我还是去睡觉，晚上可以到咖啡馆去上班。早上好，朋友们！晚上见！那时我们（包括小偷）都要干活去了！”

我们分了手，我朝沙恩斯大街走去。我决心赶快把这张灼手的钞票打发掉，把它换成零钱，使它认不出来。我走进“新蓬贝亚”小吃店，在一张铺着台布的桌子旁坐下。

这是本区最时髦的一家小吃店，我买了牛奶咖啡和两份点心，也就是说，有六块蛋糕。

在等候的时候，我透过窗纱向大街上张望，这种窗纱可使世态炎凉烟消云散。我想，有一个朋友能够偷别人的东西用来帮助另一个人，这倒是好事。我想起多明戈，他是个和蔼而话多的小伙子，几乎每天晚上都在拳击俱乐部卖梳子、肥皂、刀片之类的东西。

有一次，我象平常一样手头拮据，他请我到小酒店去吃了东西。也许现在他就在这里，这时我也可以请他了。当然，我不能跟他谈起这五元钱的事，只是请他就是了。也许将来有一天我会认识把这张钞票扔给我的那个精灵的真面目，可能就是多明戈或者别的人。

我正在这样白日作梦时，突然感到恰如迎头一棒：埃斯基纳进来了。这个无赖在睡衣外面加了一件大衣，穿着草鞋，一直跟着我到了小吃店。

“我可以坐下吧，是不是？”

没等我回答，他就坐下了，也不理会向我这边跑过来的侍者既惊奇又责任的脸色。

“先生要来点什么？”

他说“先生”时声音特别重，带着嘲笑的敬意。

“请给我来一杯咖啡。”

我们都不说话，不知道说什么好。待着托着盘子过来了，给埃斯基纳送了咖啡，又给我的杯子里倒了咖啡加牛奶，并把一碟六块奶油蛋糕放在桌上，还有一盘甜点心。埃斯基纳仔细看着这些东西。

“你每天都是这样用早点吗？”

“不常这样。有时候我就在房间里喝一杯马黛茶。”

我拿起牛奶咖啡来喝，但太烫。我咬了一口蛋糕，但咽不下去。

埃斯基纳叹了一口气，仿佛难过地说：

“警察，你知道吗，小伙子？为了当场抓住小偷，他们总是跟踪他，并且调查他是否花费超过收入。难道是你昨天晚上赌赢了球赛或者你参加了月宫体育馆的比赛？”

“都不是。”

“那是怎么回事呢？因为我昨天向你要房租，你说你两手空空。”

“因为我拣到了五元钱，就在这儿。”

为了结束这场无法忍受的审讯，我把钞票从口袋里拿出来放在桌上。

“如果您需要，”我表示说，“我就给您算作房租。只是付过牛奶咖啡剩下的钱，因为说实话，我再没有别的钱。”

埃斯基纳不动声色，心平气和。他叫我把钞票收起来。他想一口喝光茶杯中的咖啡，但是反了舌头。可见他很激动，不象表面看来那么镇静。

“如果象你所说，这张钞票你是拣来的，那么一定不是在街上。如果是在街上拣的，你昨天晚上就会庆祝了，因为不论白天还是晚上你一直是饿着肚子的。况且，所有被偷的房客都气得脸色铁青，而我看见你却是脸色通红，好象对什么事感到羞愧。我问你愿不愿意跟我一道去控告，你的神色慌张。所以我决定跟踪你。可是你为什么还不喝你的牛奶咖啡呢？要拣了。奶油蛋糕你不吃啦？看样子是很好吃的。你总是吃这么多吗？”

“听我说，埃斯基纳，”我说。“我向您发誓，我只有五元钱，再没有别的。我是在街上、我的房间或随便什么地方拣到的。在哪几栋的这有什么关系呢？反正我只有五元钱。我在这里喝牛奶咖啡的时候，您到我房间去（我从来不锁门的）搜查一遍。要是您愿意，也可以现在就搜查我身上的口袋。五元钱不是一笔大数目：每次我帮师父做手套时他都给我五元，或者我也可以在印刷厂里预支。这钞票是在我房间里拣到的。这确实有点奇怪，但的确是事实。”

“我相信你说的话，”埃斯基纳说。“可是，你是不信上帝的，是不是，小伙子？我说的是把一张五元钱的钞票留在你房里就是为了让让你高兴高兴的那个上帝。你必须承认，把钱放在你房里的人是一个和我们一样有血有肉的人，而且一定就是偷了别人的东西的那个人。听我说，小伙子：你对生活还一点不了解，而我是了解的。我甚至可以告诉你，为什么那个小偷要把钞票留给你。他一定是出于善心，你明白吗？他看你日子过得很可怜，便想：我给这个快饿死的人留几个钱，让他的祝福使我免进监狱。也可能是你的一个崇拜者。有各种抱幻想的人：他可能希望有朝一日你在拳击中取胜，当了冠军。

那么有一天他就会告诉你，是他给你扔下的这张钞票。因为，你知道吗？谁也不会自给你任何东西。那个家伙总会以某种方式来找你索取你认为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笔钱，并且还要利息。”

“我什么也不知道，埃斯基纳。”我谦恭地说。

“你当然一点不知道生活中的事！我虽然不认识那个人，你要我告诉你那个想用偷来的五元钱冒充慷慨大方的家伙是谁吗？那是一个在生活中永远也不得志的倒霉的人！”

你看我，我是在马路上长大的。我从来没有跟拳击或足球打过交道！

在象你这么小的时候，我在弗洛雷斯的潮湿地带拣过破烂，现在我是一家旅馆的老板，所以他才偷我的东西：完全出于对我的财产的厌恶。这个家伙一定得过我的好处。也许你知道他是谁，或者不久以后你会知道，一定会知道的。”

“您要我告诉您什么呢，埃斯基纳？告诉您他是谁，为什么要偷东西？”

“我没有问你这个。我不是侦探，也不强迫你去当侦探。你拿了一部分偷来的东西，这就是同谋。但我不想告诉任何人，这只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我们再出不谈这件事了。可是这个小偷早晚会作为你的守护神前来找你，友好地向你讨还他扔给你的这五元钱，就象讨一块骨头给狗吃一样，让它不要叫。我告诉你，你根本不用向我指出他是谁。只要我看见你们两个在一起，我就会知道他是谁。我马上就会知道，你是一碰到什么事就会脸红的，就象今天早上我看见的那样。”

埃斯基纳走了，我一个人留下用早餐。当我要这顿早餐的时候，我觉得这样丰盛的早餐似乎只有国王才能享用。其实不然，完全不是这样。当这个可怜的老头告诉我不劳而食没有味的时候，他并不象看上去那么蠢。的确，尽管我在这杯牛奶咖啡里放了很多糖，吃起来却总是苦的。

生意旅馆

他带着商人的微笑迈着坚定的步子走了进来。从恰斯科莫斯到白湾，他可以出入任何一家经销行，用同一种自信的声调向人打招呼，并且记得每一个经销人的名字。对南区的所有旅馆老板也同样熟悉。

“早上好，堂拉蒙！有我的房间吗？”

老板拿过柜台上的抹布，抿紧嘴唇，脸有难色。

“大家都看中这一天住进我的旅馆来。我的旅馆已经满了。”

“我从坦第尔来，明天一早就要开始工作，这样明天晚上我就可以赶到三河坝。叫我怎么办，堂拉蒙？是留下，还是走？”

推销员手里提着沉甸甸的样品箱，老板思索了一下说：

“我没有现成的空房间。”

他又抿紧嘴唇，显出为难之色，又用抹布擦了一下柜台，眼睛盯着那只旧皮箱。最后他说：

“我给您安排一张床位吧。”

“一个房间或一张床位都可以，有什么办法呢？”推销员说，一面把提箱轻轻放在衣架旁边的地上。

“那是在走廊尽头的一个双人房间。”

“跟我同房间的人是哪个部门的同行？”

“不是什么同行。”

“那么他是开农场的？”

“也不是。我不知道他是谁。”

老板的表情带有某种神秘的色彩。

“那张神圣的床位怎么样？您给不给我留着？”

“当然啦！您现在想到房间里去吗？”

在推销员还没来得及回答以前，老板又接着说：

“最好是先让我跟房间里的那位先生谈一谈。”

“堂拉蒙，那张神圣的床位到底怎么啦？是金丝床？还是您要把它跟沙巴王后^①一起给我？”

①沙巴，古阿拉伯地名，沙巴王后以其财富著名。

“不是的，朋友。那位先生是中午来的，要求给他一个人住一间。由于多一张床位，他提出愿意多付房钱，让他一个人住。我当然不能让您站在街上：但请您给我时间，让我向他说明一下您要住进他的房间。”

推销员没有十分注意他说的话。

“我要去工作一会儿。”

“商行已经关门了。”老板提醒说。“您不吃晚饭了吗？”

“我在路上吃了一点了。请您替我把箱子放好。我要去看阿斯圭达。”

“他不在城里。”老板告诉他。

推销员把手指捏得咯咯作响，脸有不快的神色。

“我是专门来看他的。这一趟算白跑了”

“他是昨天上布宜诺斯艾利斯去的。”

“给我来一杯咖啡好吗？堂拉蒙。”

当老板在柜台的一头准备咖啡时，推销员扫视了一下四周的墙壁：一张关于集市的广告和一张拍卖牛犊的广告，还有一张火车时刻表。他先看了看两张广告，然后走近前去看时刻表。这是他推销生意最倒霉的时刻，生意惨淡，而疲乏和厌烦又象可恶的敌人一样包围着他。

这次他没有能遇见阿斯圭达，实在是遗憾。他本来对阿斯圭达上一次向他许下的诺言抱着希望。现在可以请他喝几杯酒，并顺便做成一笔重要的交易。他痛快地打了个哈欠，看了看手表，已是晚上九点。在旁边的餐厅里，招待员正在给客人送点心。他没有看见一个认识的同行。

堂拉蒙把咖啡放在柜台上，便走到院子里去。回来时，推销员已把咖啡喝完，正在看时刻表，好象是在看神谕。

“我跟那个人谈了。您现在就进房间去吗？”

“干吗那么急？还早呐。”

但是他不知道干什么好。要想和堂拉蒙聊天是不可能的：招待员刚才管所有的客人都要了咖啡，老板正在鼓风机局面忙着呢。

“我出去遛遛。”

“我给您把箱子送到房间里去，是走廊的最后一间。”

推销员走上阴暗的大街，走过酒吧暗淡的橱窗前面，那里停着开往白湾会的公共汽车。那里他也没有看到一张熟识的脸。他又看了看表，九点十分。当他这样找不到一个同行，找不到一个朋友时，便觉得长夜漫漫，表也不走了。

他走到圣马丁大街，那里有一家电影院，他在开映前便买票进去了。他避免和穿着深色衣服、脖子上围着白手巾的小伙子们坐在一起；他向商店老板埃西尔和他的女人打过招呼，便在两个土里土气的农民身旁坐下，连大衣也没有脱。天气比较冷，地上铺的是细砖。他轻轻跺了一阵，使脚暖和暖和。但电影一开始，他就停止了这种活动，以致感到寒意从脚下传到了上身。他看了一会儿，觉得银幕上活动着的人物没有什么意思。

他想的是这一回坦第尔的订货比上一回低百分之四十，但在科罗内尔·费尔南德斯的销售量却有上升。现在他寄希望于三河坝，那里农业获得了丰收，新建的工业设施把那里变成了一个漂亮绝顶的广场。而那位阿斯圭达却撇下了自己的生意，使他的计划落了空。

当然，他还要到当地其他几家经销行去走一遭，但阿斯圭达的离去使他感到失望和晦气。

突然，他想起阿斯圭达可能上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家里去了。于是他在银幕上看到的尽是这位经销主任油光发亮的脸的形象。每当内地的主顾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去--不消说，这位主顾是被推销员赚了钱的--经销主任总要请他吃饭，然后把他作为顾客和私人朋友介绍给经理。

推销员感到寒冷刺骨，便又在细砖地上除起脚来。电影虽然是音乐喜剧片，但也引不起他的兴趣，在演到一半时他便站起来走了。

生意旅馆已经打烊了，他使劲敲门。这时他想起他的经销主任，他恨那张脸，好象他在黑夜中紧盯着他，在那消失在平原上的小城里监视着他。

有人拉了一下绳子，把门打开了。守夜人躺在过道里的行军床上。

“您把门关好了吗？”守夜人问他。

“关好啦。您放心睡吧。伙计。”

他走进黑暗的走廊尽头最后的一个房间，打开了灯。一张床上放着他的提箱，另一张床上躺着一个人，用床单盖着脑袋。

“晚上好！”推销员问候道。那个人没有答理，虽然看上去他并没有睡着，因为他的姿势很勉强，床单在他的头和脚之间紧紧绷着。

推销员看了看房间。角落里有一个水槽，旁边墙头透出潮气。两张铁床，墙上有衣钩和钉子。还有一张椅子，没有衣柜，衣服就得放在椅子上。

两张铁床中间有一张破旧的床头桌，上面放着一盏灯，没有灯罩，还有一见玻璃杯和一个纸包着的瓶子。

“他不是同行，也不是农民，”推销员想道，“他就是个病人。”他开始脱衣服，把大衣挂在衣构上，把裤子沿褶缝叠好，和上衣一起搭在椅子背上。他只穿着内衣了，这时，躺着的那个人把头露了出来。

“对不起，把您吵醒了。”推销员说。

“我没有睡着，只是躺着休息休息。”那个人回答说，声音沙哑而颤抖，好象孩子快要哭出来似的。猜不透地有多大岁数，胡子三天没利，眼睛忧郁无神。他伸出一只青紫色的细小的手去开床头灯，大概是因为天花板上的那盏微弱的黄色灯光使他不安。推销员看他的样子象是个失业的银行职员或破产的商店老板，也就是说，是个正经然而倒运的人。当他伸出手去摸床头灯的开关的时候，顺手把瓶子移近他的床边。

“这位先生是出来做生意的还是旅游的？”推销员问道。

“都有一点儿。”那个人回答说，嘴边露出无可奈何的微笑。

“能愉快的旅行倒是好运。”推销员说，一面钻进又潮又冷的被窝，震得铁床松散的支架嘎吱作响。

“关灯吗？”推销员问道，在那个人说话之前，他已经按了床头灯的开关，房里一片漆黑。

水槽里在滴滴答答地漏水。推销员闭上眼睛，想要入睡。他把被子蒙住头，但没有用，水槽的滴水声在他脑子里引起反响。他在黑暗中抬起头，最后下定决心：他打开床头灯，跳下床来，走到水槽边，使劲拧水龙头，但

总不能完全拧紧，水还照样滴。房间里好象充满一种奇怪的颤动，两人面面相觑，同病相怜，都穿着内衣，带着失眠的脸色。

“这讨厌的滴水总是弄得我不能睡觉。”推销员说。

“那是神经的毛病。我也失眠，有时候整整一个星期睡不着觉。”那个人小声小气地说。

“那瓶子里是药水吗？”

“是药水，我想是最好的药水。”

“安眠用的？”

“当然。但作用太强，我劝你别喝。”

推销员心里明白，同房间的人不想请他喝瓶子里的东西。他感到不自在，虽然即使一个陌生人请他喝他也未必会接受。但是他认为作为礼貌，还是应该请他一下的。

他关上灯，在黑暗中睁着两眼。他想，他要是象平时那样吃了晚饭，喝半瓶酒，而不是在路上吃几片夹火腿面包，也许现在能睡着了。另外，在电影院里又受了点凉，恐怕感冒了……这个阿斯圭达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离开了。

他感到，同房间的人用手在床头桌上摸，拿到了瓶子，接着喝了杯水，又躺下了。

“他服了药，一定能睡得踏实了，”推销员想，“而我还是睡不着。”可是那个人在床上翻腾起来。推销员等他安静了下来，便在脑子里计算他自布宜诺斯艾利斯起程后共卖出了多少售货券，在蒙特是多少，在拉斯弗洛雷斯是多少，在阿苏尔是多少……在算到坦策尔之前，他就睡着了。

推销员自少年时代起没有见过鬼，这一回在恶梦中他又见到鬼了。象他小时候在狂欢节上看到的那样，鬼穿着一身红衣服，手里拿着一把三叉戟。他梦见自己睡在一间很大的房间里，一定是一家古老的旅馆，有无数张床，全都是一个样子。这是旅馆还是医院？所有睡在那里的人好象都是同行：床边都有一张椅子，上面放着样品箱。突然，鬼进来了，一张床一张床地巡查。推销员暗自祷告，祈求鬼不要走到他的床前。看来他成功了，因为鬼在另一张床前停住，举起三叉戟，猛地扎了下去。他在梦中感觉到金属撕裂的声音，象是炸弹爆炸似的震得耳朵发病。他明白了，当他陷入真空的时候，躺在那些一个式样的床上的身体都只是一个人，那就是他自己。

他一声尖叫，从恶梦中醒来。他在床上坐起身，气喘得象刚跑完了一公里路似的。

积满尘土的玻璃窗外染上玫瑰色，新的一天开始了。他看了看同房间的伙伴，在朦胧的光线里只见他象要爬起来，脸色有些奇怪。

“我的叫声把您吵醒了？我做了一个恶梦。”

但那个人一声也不回答。

推销员担亮床头灯，只见那人面部痉挛，两眼僵硬地直盯着天花板。

推销员跳下床，跑到走廊里。

他想呼唤堂拉蒙的名字，但没有呼唤出来，只发出了一声尖叫。走廊里一个躬着身的人影往前走来。

“房间里有死人！”

守夜人是个跛脚老头，正抱着柴火往厨房去，听见喊声便把柴火摆在地上，望着推销员，只见他穿着短裤，内衣胸前印着商标。

“您的房里有死人？”

“对，刚死。”

老头去敲老板的房门，堂拉蒙一边出来一边扣着裤子的纽扣。他带着和解的神情走到推销员面前，好象是这位客人由于毛巾不干净或是菜场里有由于在向他提出抗议。

“这是怎么回事呢？他只是向我要一个房间给他一个人住啊。您放心，马上解决。

可是您这样要着凉的，先生！”他见客人光着脚，便提醒他说。

推销员的脚上没有感到地面的冰凉，倒是发现自己穿着内衣站在服饰整齐的人们面前而感到羞愧。他走回房间，在门口停了一下，堂拉蒙跟在他后面。

“快进去穿衣服，先生。”

他走进房间，不敢前尸体那边看，匆忙穿起衣服来；他穿好了鞋，觉得安全了；当他穿好了裤子，便已恢复常态。当他系好领带，脑子也清醒了，这才转过身去，看了看尸体。

尸体象石头一般僵硬，他觉得惊奇。原来他总以为人死了就一切都完了，可是这个人死了却是一副向生命挑战的姿态。这个尸体里好象有一种强大的力量，也许可以说，这种力量正寄托在那张大理石般的脸上和那双活象惊马的可怕的眼睛里。推销员想起他做过的梦，踌躇了一会儿。梦里的那些人不都是一个人，而这个人不就是他自己吗？他又看了看死者的脸，这一下他差点要哭出来了。他感到极大的痛苦，既为那个人，也为他自己。也许他们象是兄弟俩，简单说了几句话，便都穿着内衣，带着失眠的心情躺下了。

这时，进来了一名警官和一名医生，他们径直向床头桌走去，医生拿起瓶子一看，说；

“氰化钾。”

警官的眼睛逼视着推销员问道：

“您原来知道什么情况吗？”

“一点不知道，他对我说这是安眠药。”

“这倒没错。”

警官又微笑着问：

“他没有请您喝一点？”

警官和医生得意地向这个曾经睡在死亡身边的人望了望。

“您现在可以上班去，”警官说。“然后请您上警察局去报案。”

一名警察看守着生意旅馆的大门。一群好奇的人拥挤着要进去，向推销员提出一大堆问题。他看见一张熟识的脸：那是埃费拉因·古铁雷斯，“巴斯克人”商店的老板。

两人一起往前走，交换着对这起自杀事件的看法。两人都怕死，一致认为自杀是胆小的行为。接着他们又谈起生意来。一群孩子跟在他们后面，帽沿一直差到眼睛。四十来米开外，药剂师马比叶达满脸堆笑向推销员问候。于是推销员觉察到自己在这个小城中的重要性，他有了一个和商人们交谈的题目。他想，那位死者是一个义务帮手，一个奇怪的同行，他无法酬谢他的帮助。“我在这个讨厌的小城里还是可以起点作用的，”想到这里，乐观的推销员又加快了他的步伐。

午饭时，他在脑子里计算，这次销货量有三千比索，而在生意旅馆的

餐厅里人们却只谈论那次自杀事件。在死者的衣服里发现了联邦警察局颁发的身份证，一只怀表和一点儿钱：两张十比索的钞票。可以推断，这位旅客是打定自杀的主意到这个小城来的，因为那点钱根本不够支付住宿费和继续旅行的费用。

推销员在一张桌旁坐下，桌上坐着三位熟识的同行。他们好奇地朝他望了望，推销员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凄凉。他要了一盘汤，倒了两匙奶酪。有人说道。

“请您跟我们讲讲您的同伴的事。”

推销员把正要送进嘴里的汤匙停在手中。

“什么同伴？”

“就是那个死者，”另一人说。“还会是谁呢？”

“他跟我有什么关系？”

“得了，别这样！谁也没有控告您什么！我只是问您，您以为怎么样，他是否跟您谈起过他的生活。难道那个可怜的人不是跟您一起度过他最后一个晚上的吗？”

推销员终于喝了一口汤，觉得又谈又凉。他没有胃口。

另一个人又开口了：

“他死之前什么话也没有说吗？”

推销员努力回忆道：

“我们没有说很多话。”

“真可惜！”另一人嚷道。

“您什么也没有问他？”

“我干吗一定要问他？时间已经很晚了，天气又很冷。我从电影院回来……”

“我并不想怪罪您。要是我，我一定要和同房间的人说说话的。”第三个人又一本正经地插话说。“这样我对萍水相逢的邻居总能知道一点情况，有很多次我听到的情况很有意思。有一次在龚萨莱斯·恰维斯……”

“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否可以起些作用。”另一个推销员打断他说。

招待员过来撤盘子。

“可以拿走吗？”他指着盘子问。

推销员点了点头，然后他问道：

“起什么作用？”

“我们不知道他是个同行还是个毫不相干的疯子。”另一人答道。他穿着一身笔挺的灰色眼装，说话时晃动着手上戴的戒指。通常，这样的同行使推销员感到惶恐：他有非凡的口才，政治上前途无量。

“他不知道死者是谁，也不知道为什么自杀。”另一人嚼着东西插话道。

“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都可能出这种事。”穿灰衣服的人强调说。“如果他也是推销员，我们就应该管他守灵。我们应该集合起来去见市长（我正好认识他），要求他准许我们向一位同行的遗体告别。您（上帝保佑），或者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位，都可能明天死在生意旅馆的床上或者意大利的公寓里。”

推销员把一盘小肉包子推到一边，调味汁又浓又辣，刺激他的喉咙。他说了声抱歉，便从桌边站了起来，一直走到柜台前，询问火车时刻表。堂拉蒙正在煮咖啡，他告诉他：

“火车要到明天才有。”

他在柜台上喝了杯咖啡，看着他的同行们在谈话，他们不时朝他瞥上一眼。

他穿过走廊，走进自己的房间。于是他看见两张一模一样的铁床，铺着印有红条纹的黄色床单，他有个一瞬间的模糊的印象，分不清哪一张床是谁的。别的推销员--首先是他自己--也许就会睡在死者的床上，而且要问堂拉蒙是否换了床单，也无济干事了。

他摺下样品箱，上大街去遛达。

有一阵子他脑中闪现的全是死者的形象。那双凸出的眼睛，倒不象那张他没有看清楚的脸那样使他不安。那个和他同房间的人，本来他也许多说几句话就可以挽救他的生命。那个人躺在床上，用床单蒙着脸，看来不象第二天早上那个面容凶暴而可怕的人。

那张被死亡变了形的脸不是那个服氰化钾的人。推销员努力要想象出那个人的脸是什么样子，但他只能想象出他自己的脸。那就是他自己，在潘帕斯平原寒冷的夜晚冷得缩作一团，象一条受惊的昆虫那样孤寂地蜷缩着。

他想说服自己，没有别的办法，半夜三更，怎么和一个素不相识的同房间的人谈话呢？他们是谈了几句，但不够。于是他产生了怀疑，感到自己对这起死亡事件是有责任的。他在拐角处站住脚步，心咚咚直跳。

“哎呀，我看您成了重要人物啦！”有人在他身旁喊道。

推销员吃了一惊，他转过脸去，原来是药剂师马比叶达，嘻皮笑脸地露出一口白牙齿。

“我没看见您，大夫。”推销员解释说。

“当然您现在看不见我啦。从前您总要进药房来和我聊几句的，可现在我看您太忙了，三次从我药房门前走过，竟连一个招呼都不打。”

“请原谅，马比叶达。”

“我不能原谅您！我不得不到街上来拦住您，求您打个招呼。开个玩笑！您怎么啦？我想不会是因为今天早上的事吧，我是说那个自杀了的流浪汉。”

“流浪汉？”推销员问道。

“当然是个流浪汉：他的口袋里只有几个比索，连付毒药的药都没有。您知道服氰化钾自杀的情景吗？死得象一条狗。可是我们站在街上干什么？为什么不进药房去？”

药房里一股薄荷和消毒药的气味。这里的一切与众不同：玻璃窗和细砖地透明发亮，推销广告画上面画着胖娃娃和穿游泳衣的美丽女郎。在这种光洁而寒冷的环境中，忧郁似乎压抑着心脏……药剂师的嘴唇微合，由于笑得自然而歪斜着，露出马一般的口牙。

“我看您为这次死亡事件很不安吧。”

推销员犹豫了一下，然后喃喃地说：

“当然这事触动了我。”

“什么鬼触动了您？在您身旁死了人？得了吧，伙计。我们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死亡离我们最近。有时候我们想都没想，而死亡却坐在我们肩上。当然，老伙计：死亡不是象乞丐那样走近，也不象拦路贼那样袭来。死亡不带着我们走，它不是出租汽车，也不是拉车的驴子。是我们把死亡装在心灵里，装在骨头里。要是有人死在我们身旁，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这跟死在一千公里以外完全一样。”

他停了一下，过去照料一位买香皂和一袋香料的女顾客。他小心翼翼地裁开包装纸，把东西包好，使“马比叶达药房”这个字号完好无损。他按动记帐机，接着又说：

“使您不安的那个流浪汉到这儿来过。”

“您接待了他？”

“当然，我没有店员。他进来就讲起花园里到处是蚂蚁的事。我明白他要买什么，就说：‘用氰化钾，这最灵。’那个人的一双长满眼深的眼睛直盯着我看。‘没错，’我说，‘这个最灵。我给您拿一包浓缩的。’那个可怜的人是带着死亡进来的……”

药剂师用手指关节敲敲自己的额头，又说：

“他走的时候很平静，口袋里装着死亡……可是现在我看您心神不宁。您在想什么？”

“大概是我觉睡得太少。我正要跟您谈这个。我能吃些什么药？”

药剂师打开柜台上的抽屉，拿出一瓶药，微笑着交给他说：

“服这个鲁米那药片。取一、两片您就能睡得很好。”

他微笑着，带着无所不知的神情指着他说：

“可要当心！有人吃了七、八片……”

他摇了摇头，又微笑着说：

“他们多吃了一点，就永远醒不过来了。”

一阵静默。两个人都带着商人的冷淡的亲切表情微笑着。推销员想打破这个僵局。

往常他们总要开几句玩笑，议论国内的财政情况，可现在他觉得家做了错事的孩子似的不知所措。然而，他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

药剂师把药瓶递给了他。

“七个比索。”

记帐机的昨唤声把他从沉思中惊醒。

“这是找头，朋友。”

推销员拿起找给他的三个比索，和鲁米那药瓶一起塞进了衣袋，然后匆匆道了别，便回旅馆去。

他在酒吧的煮咖啡器前面站住，看着那个紧锁双眉的年轻招待员在摆设晚餐的桌子。

只见他先把面包筐和酒瓶放在桌上，又从柜子里拿出刀叉匙碟，在餐厅昏暗的灯光下慢慢地把每样东西放到应有的位置上。一切都很平常，但推销员觉得凄凉而又荒唐，甚至想要喊叫。招待员独自在餐桌中间来往穿行，表情厌倦冷漠，象是和尚在履行其基本的例行佛事。这种气氛中潜伏着恐怖，不久即会爆发出一阵狂风，把那些肮脏的金属刀叉吹走，把那些旅行饼子吹得魔术般地飞舞。

推销员确信到了关键时刻，生意旅馆、这个小城以及整个世界，都在打算吞噬他同房间人的尸体。每个盘子里都有一块因死后而变硬、又经当地厨师浸软了的肉。这是给凄惨的人类预备的凄惨的筵席。现在他明白了为什么在内地饭店里人们就餐时都一声不响，表情严肃而惭愧。

“堂拉蒙！”

老板胳膊上挽着一条餐巾走到他面前。

“您想喝点开胃酒吗？”

“我什么也不想喝，只想早点睡，我不太舒服。”

“我想您还是先用一点晚饭，马上给您端来。”

一阵奇怪的恶心差点把他的胃翻了过来。在这个人们准备分食死者的肉的阴森的餐厅里，他怎么坐得下来呢？死者也许是一个推销员，一个汽车司机，小贩或者乡村艺术家。道路吞食了它的一个儿子，而他的弟兄们却要来分享他的遗体。

“不，我不想吃晚饭，堂拉蒙。我要睡觉去。”

“您是不是病了？”老板一本正经地问。

“不，我没病。不过，我累了，太累了。”

“那好吧，您的房间预备好了。”

“哪一个房间？”

老板迟疑了一会儿，解释道：

“旅客一个也没有退房，所以您还得住在原来的房间里。”

侍者送他到房间去。推销员打开房门，在黑洞洞的房间门前站住了。他打开灯，两张床一楼一样，照样的简陋而冰凉，四周的墙壁剥蚀了，长着潮湿的霉点。水槽里，水管还在滴水：一、二、三……一、二、三……

他倒了一杯水放在床头桌上，旁边放着鲁米那药瓶。然后他慢慢地脱下衣服，钻进冷森森的被窝里，身体俄曲得膝盖几乎贴近肚皮。他伸出手摸到了开关，关了灯，但是睡不着。他反复计算着白天的订货，一笔一笔地都记得，连几分钱的零头也没有忘记，接着又把这一天的总数加到这趟出差的整个销售额上去，算到最后，好象是数学的还原似的。他脑中又出现了同房间的死者的形象。可是他记不清自己现在是睡在死者的床上还是在另一张床上。怎么竟忘了这件事呢？他坐了起来，摸开关开灯。这时有人打开房门。推销员赶忙又钻进被窝，在进来的人开灯以前把头蒙了起来。

“晚上好。”新来的人招呼道。

推销员把脸露了出来，在淡黄的灯光下，他看清是一位中年的同行，只见他把提箱放在地上，使劲搓着手。

“好冷啊，朋友！我只能这个时候赶到。”

“我是昨天晚上乘同一班车到的。”

“这位先生什么职业？”

“经销行。”

新来的人把衣服放在椅子背上，就上了床。他咳了一声，清了清嗓子，又说：

“经销行是个好职业，订货很多吧？”

“马马虎虎。”

“我总说，不论发生什么危机，人总不能不吃饭。是不是这样？”

“当然，”推销员赞同说。“我的订货总是不少。”

接着他又想起这趟出差的订货数额，同时又联想起在他身旁死去的那个人的可怕又可怜的清晰形象。

新来的人关上了灯，而他又想起昨天晚上做过的梦。他不怀疑，所有的床都是一样的，而那些睡在床上的人也是同一个人。他自己昨天晚上已经死了，可刚才又进来睡在另一张床上。

他伸出手，摸到了水杯和鲁米那药瓶。

新来的人又解释道：

“老板告诉我，您好象病了，可是又没有别的空房间……”

“其实我没病，我只是觉得不太舒服。”

“请原谅，我把您吵醒了。”

“我还没睡着，现在我吃药。”

“是安眠药吗？”那个人在黑暗中问道，表现出充满亲热和礼貌的好奇心。

这时推销员发现，他们的谈话和昨天晚上的一样。他打开药瓶，倒出七片药和着一口水吞了下去。

“晚安，朋友，”那个人说。“祝您明早康复”

两个人都翻过身去朝着各自的墙。新来的人刚才的话在空气中回荡，形成了一种同情和判决的奇怪混合物。

他叹了口气，闭上眼睛。第二天，生意旅馆祭祀式的凄凉筵席又将继续进行。

他感觉到水管令人失望的滴滴嗒嗒的滴水声，可是他知道，一会儿之后他就再也听不见这个声音了。

锯木厂

锯木厂的大门口围着一圈人，有小伙子，也有老太婆和孩子。阿德里亚诺走了过来，对人们带着遗憾的神情在进行的议论不予理会。他迷信地认为，他应该想点愉快的事，才不会出倒霉的事。他必须交上好运，因为已经是中午了，他还一无所得，既没找到工作，又没人答应要他。他不能就这样两手空空地回家，也不能老是在这漫漫长街上转悠。

进了大门是一个院子，院里放着粗大的树干。院子的一头有个房间，那是厂长办公室，另一边是间棚屋，里面电锯发出悲哀的叹息。

他没有看见人，犹豫了一会儿，但他又不能在那里停留，因为他怕狗跑出来（锯木厂总有一条凶猛的狗）。但他无论如何必须往里走，找到厂长，向他要求工作。有一刹那，新鲜树脂的气味曾把他带到家乡奥朗，但他不宜想这些，他必须找到工作。

在厂长办公室里他没有找到人，电话铃响了，也没有人去接。在锯木厂里惯有的气味中飘散着某种异样的东西。但他不能象根树干那样留在那里。已经是十二点钟了，阿德里亚诺必须解决自己的问题。他好象被电锯的歌声所吸引，便向棚屋走去。

他看见一群人围着刨床。他不费劲就认出了厂长，一个德国人，又高又肿，皮色白皙。厂长有些激动，水汪汪的蓝眼睛睁得溜圆，带着惊恐的神色，不时摇晃脑袋，苍白的下巴肉也颤动着。

阿德里亚诺慢慢走近人群。在刨床近旁，有一个人蹲在火边用铁丝弯成的篦子在烤肉。他转过脸来，很快瞥了一眼新来的人。阿德里亚诺也注视了一下那张棕色的精明的脸，两眼明如星火，胡子七歪八斜象用旧的牙刷。这个人正背朝着阿德里亚诺，但是也只有这个人看见了他的到来。

“一件不幸的事，霍夫曼先生。这不是谁的过错。”有人说。

“这是天命，先生。”

“这样唉声叹气有什么用？”

可是没有什么安慰的话可以使霍夫曼先生安下心来。

“那么下午刨床能开动起来吗？”他问。

“当然能。只是轧掉了他几个指头，受伤的是尼加诺尔，机器没事。”工头说。

“我说的不是刨床，而是指警察。检察官或者别的什么人不会来吗？”

“这不是犯罪行为，是一次工伤。”工头带着宽慰的微笑说。

霍夫曼先生的眼睛睁得更圆，他问道：

“轧下来的手指在哪里？在机器里面吗？”

“在那儿，霍夫曼先生。”

“哪儿？”

“就在刨床附近。他们用锯末盖上了，大概就在那儿。”

这个德国人又神经质地摇晃起脑袋，苍白的下巴肉也象钟摆似地颤动起来。

“真粗野！”

“那怎么办呢，先生？我们准备给这些手指守灵。”

阿德里亚诺闻见肉在火上烤得隆隆作响时散发的香味，觉得肚子饿了。但他心里不踏实，不能没有找到工作就回去。于是他走到厂长跟前说：

“先生……”

“什么事？”

他刚刚看见阿德里亚诺，便正色向这个新来的人问道。

阿德里亚诺向蹲在那里烤肉的人望去，只见他眯了眯眼睛，又微微摇了摇头。阿德里亚诺明日应该再等一等，现在不是要求工作的适当时机。

“电话铃在响呢，先生。”阿德里亚诺告诉厂长。

“我马上去。”

霍夫曼先生巴不得有这个会赶紧离开那个满地锯末的场所；他一定是从那个工人掉下来的手指上面踩了过去。

阿德里亚诺又看了看烤肉的人，似乎是问他该怎么办。他用下巴一指，叫阿德里亚诺跟厂长走去。

他在厂长办公室门口站住，听见霍夫曼先生在电话里抱怨，一个工人的手被电刨轧了。您知道：今天的工人是一群废物。那个笨蛋在吸烟，手指就给轧掉了。而那些粗野的人--您看看吧！--也不等救护车来，就把轧下来的手指埋在锯木里，现在他们在烤肉呢。当然他们把机器都停了！电锯声倒还听得见，因为那是自动的。他们一定整个下午都会议论这次事故。这是一次不幸的事故，先生。工作已经耽误了，而且还会更糟。

霍夫曼先生表现出一种高尚的感情和高度的责任心。和他通话的人一定安慰了他，只见他听话时表情严肃，不时点头，带着不显露的微笑和满意的心情向对方表示感谢。

他挂上电话，这时看见阿德里亚诺站在门口。

“您有什么事吗？”

阿德里亚诺听见电锯的尖叫声象是很丧的汽笛，也听见自己说话的声音不缓不急；

“我是来找工作的，先生。”

“您是干这一行的吗？”

“是的，先生。”

“过去在哪儿子过？”

“在萨尔塔省的奥朗。我是从那儿来的。”

“现在住哪儿？”

“离这儿不远，在一区的一座公寓里。”

“我需要一名开创床的正式工人。”

“我就是，先生。”

“上班时候不休息，中午有一小时吃午饭的时间。”

“好的，先生。”

“吃过中饭了吗？”

“还没吃呢，先生。”

“您找他们去吧。”

这时他觉得白色的锯末也显得可爱了，电锯象一只巨大的蟋蟀在歌唱。

那个烤肉的人微笑着接待了他：

“怎么样，伙计？”

“很好。”

“给您工作了？”

“对，开创床。”

那个人用叉子递给他一块烤好的肉。

“吃块尝尝。”

这是一小块肉，还带着一根骨头。

他忽然想起，这可能就是那位受伤工友的一个手指，但他还照样嚼着，血水从唇边流下来。

“怎么样？”

“味道很好。”

“火候还差一些。”

阿德里亚诺惬意地嚼着。

“您的运气好，朋友。”那个人说。

“是啊，这是交运的一天。”阿德里亚诺同意地说，一面仿佛看见自己变成了一块焦黄的烤肉。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居民

“您喜欢书吗？”

阿勒抗德罗·米斯特毫不犹豫地回答说；

“我酷爱书。”

阿古斯托·西尔弗面露不快，但他努力控制自己。他是卡萨诺瓦大书店的经理，是一位讲原则的人。他明白，用装模作样的语气讲话并没有错，有时是必需的。但只有老板才能这样做，最多可以容许一个主任售书员这样说话，而一个普通售书员只有在完全是为了书店谋利益的情况下才能这样说。

话。

“您说什么？”他干巴巴地问道，同时又是一种谨慎的警告。

“我说我酷爱书。”年轻人又说了一遍。

经理仔细端详着他，见他确实还年轻，但没有丝毫狡诈的神情。于是他确信，这个年轻人并不是想和地开玩笑。也许这小伙子是个知识分子一类的人，思想简单。他看准了这一点，便争辩道：

“不是要酷爱书，而是要了解书，善于根据读者的需要指点他们，明白吗？”

“当然我了解我的职业，我认为我能胜任。可是您问我是否喜欢书，我确实是酷爱书的。”

求职者这样坚持己见，一时竟使经理感到不快。每当招聘一名售书员时，老板总要问他是否喜欢书，以及其他一些例行的问题。而求职者只要说声喜欢就完了。这时西尔弗就说明，书不是一般商品，而是“精神食粮”。他给书下了这样的定义，那么，卖书在精神方面的性质也就不言而喻了。这也是对一切文化工作所作的一种形象的说明。当发生关于额外工时、夜班、增加工资、集体合同以及其他一些与书店的文化工作毫不相干的事情的可恨冲突时，文化工作就起着盾牌的作用。无论如何，爱好书籍是老板特有的品格，而一个普通售书员则怎么说也不能超过这种爱好的程度，而他还甚至变成了酷爱。因此，这位年轻求职者强调他的酷爱，在老板看来未免有些粗暴。他漫不经心地朝年轻人打量了一下：中等身材，衣着有乡土气息，神态和蔼。

（可是他说他“酷爱书”，而且还坚持这样说。当心！他是个无赖或者是个傻瓜。可要当心他！可是他口齿伶俐，相貌堂堂，我录用他了！）

“如果您愿意，现在就开始干吧。”

“遵命，先生。”

阿勒杭德罗觉得有点茫然。事情到了顶--他本来就是渴望找到这样一个工作才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来的--现实显得模糊起来，好象梦境中的幻影。他真喜欢品尝一下这个时刻，可是在实际生活中很难做到这一点。

“科拉尔多！”西尔弗叫唤了一声。书店的代理人从明亮的后屋走了过来，他象是从贴在墙上的宣传画中走下来一样，画面上是一个肌肉发达的男人和一个胸脯丰满的女人（看来似乎是由书籍和火炬所代表的文化，妨碍了这一对裸体人准备干的事情）。

“这个年轻人接替乌尔巴诺的工作。”

“他是内行吗？”科拉尔多问道。

阿勒杭德罗的心紧张地收缩了。他 M 才对老板撒了谎，说他熟悉这一行，可是实际上他从来没有在书店里干过。他熟悉书本的内部，可是一点也不熟悉卖书的技术。

有一天，西尔弗来了；他烦躁不安，脸色阴沉，朝阿勒杭德罗狠狠地瞧了好大一会儿。

“您来，同我喝杯咖啡去。”

他们在拐角的一家酒吧站着喝咖啡。西尔弗想早一点把咖啡喝完，可是咖啡太烫。

他没有时间耽搁，便直截了当地说：

“人家告诉我，那个常来的退休老头，对，就是和您相好的那个人，就是他，”老板缓慢而断然地点着头，“您知道他是什么人吗？好吧，那个退休

老头是有名的偷书贼。

您说他不是？我告诉您，他是贼。并不是我看他象贼，也不是我猜他是贼。我有证据，就会让您看到的。我要当场抓住他，而您要协助我。”

阿勒杭德罗觉得不舒服。他机械地唱着咖啡；咖啡既不甜也不热，只有苦味刺激他的舌头。这时西尔弗给他讲述自己的计划：

“您还照样接待这个老头。不要对他翻脸，也不要用的方式提醒他。您和平常一样和他说话。或者说，让那个爱唠叨的人随意去唠叨。而在我们之间，告诉我，那个老扒手和您谈了些什么？好吧，现在我也不想知道。您还象平时一样热情地接待他：还要装得若无其事。让他偷去！我只是要您把他留住。当他离开店铺的时候，我在门口把他截住。”

“这种诡计，我觉得跟您和我都不相称。”

西尔弗又如他狠狠地瞪了一眼：

“我想您大概不会是这个老扒手的帮凶吧。”

“您怎么想得出来？”

“那您就应该协助我在现场抓住他。”

“您明明知道，这个人多少是我的朋友。”

“这就是您的不是了，”西尔弗说。“我已经告诉过您，您的工作就是接待顾客，对他们要十分尊重，但不必和他们交朋友，也不必和他们长时间地交谈。”

“您明明知道，谈话是卖书人的本行。顾客会问，总是问个不停，要做生意就得谈话。”

“还有，这个老头不是您的朋友，谁的朋友也不是。他偷我的书，嘲弄您。您说什么？等一等。我想出好办法了。您把这一家酒吧的电话号码记下。我在这儿等着。老头来了，您就打电话通知我。”

“我怀疑他会是小偷。”

“您的怀疑，我不感兴趣。您太天真，且不说别的。照我说的去做，一切由我负责。

同意不同意？”

“行，先生。”阿勒杭德罗勉强表示同意，但这象咖啡一样又苦又烫嘴，使他吞不下去。

退休老头叫堂阿马德奥，他常常十二点钟到书店来。这时，西尔弗坐在那家酒吧等阿勒杭德罗的电话。他喝了一杯苦艾酒，接着又是一杯。他觉得热，头痛，便在酒吧的镜子里照了一照。斑白的两鬓，有一根隆起的血管在跳动。这不会是动脉硬化症吧？他一点也不喜欢自己那张紧绷着的脸。一定是苦艾酒喝坏了。他把那个老扒手咒骂了千百遍，是那个老头使他果在酒吧不得离开。他担心小偷看见他来会空手逃跑。也许今天他不来了。小偷都有第六个感官，一个神秘的雷达，给他们预报危险。他回到自己的书店，阿勒杭德罗一个人正在整理书架上的书。

“那老头没来，是吗？他的嗅觉真灵啊！”

“他来了，先生。两分钟以前刚走。”

西尔弗抓住自己快要爆炸的脑袋。

“那你干什么了？”

“我一分钟也没有离开他，一直在监视着他。先生，我这样做是觉得惭愧的。而且我确信，这个可怜的老头偷不了书。”

西尔弗用手揉了揉眼睛，又按了一鼻子，接着深深地掐住两颊，最后抓住下巴，好象下巴快要掉下来似的。

“我们不是讲好，老头来的时候您就给酒吧打电话找我吗？而且还讲好，您要把他留住的吗？”

“我不能这么做，先生。”

“谁不让您这么做的？”

“我的良心，先生。我看见老态龙钟的阿马德奥，就相信他不会是小偷。”

“蠢货！”老板叫了起来。“滚！我的店里不要蠢货！”

突然他安静了下来。他的头痛得厉害。那个老扒手、苦艾酒、卖书的人，大家都和他作对。他真要象疯子那样大喊大叫，可是他想，在书店里喊叫会做不成生意。一件丑闻比输掉两本书更糟糕。

“您没有任何权利这样对待我。”阿勒杭德罗抗议说。

老板用温和的语气、带着苦笑邀请他：

“来，请跟我一起来，我求您陪我去。”

他停了一会儿，又说：

“我只想向您证明，那老头是小偷，而您是蠢货。”

他叫了一辆出租汽车，把阿勒杭德罗带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市政厅。在经过修缮的古老建筑后面，有一个小广场通向好几条大街，街上布满卖旧书和旧杂志的书亭。西尔弗迈着急促的大步走过一家家书亭，随便地同卖书人打招呼，一边低声对阿勒杭德罗说：

“您看，这些都是卖旧书的人。幸好他们中间有我的好朋友。虽然我不知道他们是否真正是朋友，但至少他们总跟我讲一些有趣的事。”

“他们在这儿告诉您堂阿马德奥是小偷吗？”阿勒杭德罗问道。

“我不想叫您相信，告诉我这件事的是个消息灵通的人，也不是我从警察厅调查来的。自然是这些人中的一个朋友告诉我的。”

阿勒杭德罗观赏着一座殖民时期的高塔。布宜诺斯艾利斯过去的市政厅！当他在巴沙维尔巴索上小学时，这些拱门和这座塔总是可以在他们的教室里看到的。当他父亲在恩特勒里奥斯垦殖的时候，这座象铅铸似的融为一体的小巧而坚固的建筑，总是出现在他的练习本上和课本里，伴随着他的整个童年。他的书包装着这些书，在他跑到学校去的路上挂在腰间有节奏地撞击着。而现在他正在童年时崇敬过的市政厅周围遛达。老板拉着他从一个书亭走到另一个书亭，跟踪着那个退休老头的足迹。阿勒杭德罗的心里慢慢地产生了厌恶感。

“并不是因为这个老头拿走了一本书，就象您为了替他辩护而这么说的。”老板说道，“有很多顾客有时乘卖书的人稍不留意就拿走一本书而不付钱。所以，正因为这个，我才不厌其烦地提醒您要和气而留神。但现在这是另一种情况：这个老头是小偷！他不是偶尔偷，而是个惯偷。当然，您不愿意相信这一点。可是现在正是他到这里来把上午或昨天晚上偷来的东西卖掉的时候。您愿意跟我打赌吗？我提醒您，您一定会输的。您还不相信吗？听我告诉您：这个老头每天都到这里来把他偷的东西卖给一家书店老板，他是我的朋友，就是刚才我向他打招呼的那个家伙！而这个家伙知道他买进的许多书是从我的店里偷走的。现在您明白了吧？”

“要是这样，那个人是不会控告小偷的，因为他自己是小偷的包庇者。”阿勒杭德罗说。

“当然不会的！我看您有点开窍了。只可惜晚了一点，他们已经在您鼻子下面偷书偷够了。”

他踌躇了一会儿，终于他的激动胜过了谨慎；

“这是另外一个人告诉我的，或者说是个竞争对手。总之，是个和他吵翻了的人。”

您别看后面！不是刚才我打过招呼的那个人，也不是刚才和我说话的那个人。您别白操心了！有一件事您知道吗？”

西尔弗象年轻人似地爽朗大笑，接着说：

“我要让您知道一件实际而有趣的事。我向所有我认识的人打招呼，所有的人，只有一人除外：他恰恰是我的朋友，那个和小偷串通的人，或者说是告密者，或者诬陷者，也许您愿意这样称呼他。这个人，我不向他打招呼，我装着不认识他。要是我现在把老头当场抓住，就会使小偷和买他书的人一起出丑。但是没有人知道是谁告诉我的。”

“如果这都是那个家伙造的谣呢？”年轻人固执地说。

西尔弗突然停住脚步，两眼直盯着他看。

“您是不是要向我挑衅？”

“根本不是。”

“您不觉得怎固执地管那个老头辩护有点过分了吗？”

“直到现在为止，您还没有能向我证明什么。”

“对不起，期跟我来。我要跟您谈一谈，但是要在一个安静的地方。”

老板把他带到秘鲁大街和五月大街的拐角处，他们走进伦敦咖啡馆。西尔弗摸了摸一张圈身椅扶手上的旧皮革，在已经用软的弹簧垫子上坐下，用手指着坐在他对面椅子上的年轻人说：

“您的工作的结局不好，您被解雇了。但这不是小偷的过错，更不是我的过错，而只是您自己的过错。您明白吗？”

“不完全明白。”

“听我说：您的表现让人以为，我是书店经理（或者您愿意说是书店老板）而您是卖书的这个事实是无关紧要的，或者可能是偶然的事实，而且对于您来说，除了是偶然的之外，一定还是极端不公平的。是这样吧？”

这时侍者弯下身来给他们送咖啡。他把两只杯子放在桌上，用银制的咖啡壶斟满，以同样的礼节端到他们面前。

“很显然，对他来说，”阿勒杭德罗想道。“这两位主顾是完全平等的。但我们真是平等的吗？”

“您这样替那个老扒手辩护是由来已久的。老早以前，您来的第一天，我问您是否喜欢书籍，您对我说：‘我酷爱书。’您记得吗？您打那时候起就觉得自己比别人高明。

您别打断我，让我说完！当然您有您的道理！您了解书的内容，对哲学高谈阔论，向公众推荐读物，对读者给予指导。难道我否认过您的这些品德？从来没有。您工作的第一个月我就给您增加了工资，而现在我本来可以再给您加一次。这是实话，先生。可是您违背我的指示。您别抗议，听着！您知道您为什么会违背我的指示吗？因为您自以为高明。所以当我告诉您：‘那个退休老头是小偷’的时候，您不听我的话，因为您自认为更了解人，更了解人的灵魂，特别是认为您具有一切美好的感情！而您能要我告诉您一个简单的事实：汽车有多大吗？您对生活一点也不了解：您是一个可怜的无

知的人！您看看这个！知道这是什么吗？这就是生活！”

西尔弗固执地用手指着熙来攘往的热闹的大街；从花市大街出来的人群，你推我挤地拥向地下铁路，在站牌下耐心地排着队。

“这就是生活，而这是书本上学不到的！”

他自信地用手指着大街，好象是用食指敲击着真理。

“这是一座很难应付的城市，而我开始时一无所有。您以为我的店铺是有人送给我的，或者是我中彩票得来的吗？我是在不得不和婊子养的搏斗中得来的！当然我很了解这些人！而我同意您的想法：也许我也是一个这样的人。可是正因为如此，我才能够教您一些非常有趣而非常基本的东西。我告诉您：‘那个退休老头是小偷。请您协助我当场抓住他。’难道我没有权利要求您这样合作？要知道，我并没有因为您受了这个小偷的骗、让他偷走了书而责备您。您明白吗？我只要求您帮助我抓住这个小偷。我对我说的话负完全的责任！而您作了些什么？您向我表示了一颗纯洁的心而让小偷溜跑了。后来您又向我表示了您的不知好歹的心，并袒护盗窃我书店的可怜老头。”

“也许我可以向您解释……”阿勒杭德罗打断他的话说道。

“对，您说说看，也许我会明白。”

“我肯定，这个老头不是小偷。”

“为什么您能肯定？”

“如果他是小偷……那我就没有什么道德可以相信了，也不能相信人的尊严了。”

“到现在为止，您什么也没有向我说明。”

“我不得不告诉您，我曾帮助过这个老头，就象他是我父亲一样。”

“什么？您帮助过他？我越来越不明白了。那就是说，您给他钱了？”

“他什么也没有向我要，但是他把自己的身世告诉了我。他讲的一切使我想起我的父亲，如果他还活着，也将不得不靠可怜的退休金独自生活。他从来没有向我要什么，相反，有时候他给我带来一本杂志或者借给我一本书。”

“而您呢？”

“我请他吃饭。另外，因为我知道他月底没钱花，就借给他几块钱，直到他拿到自己的退休金。”

“就因为您说的这些，这个老头不可能是小偷？”

“因为这些，他不是小偷。而且我还把他看作是一个朋友，一个使我想起我父亲的老头。”

“所以您才袒护他？当然！您不是袒护老头，现在我看得更清楚了：您是袒护您自己，袒护自己发现善良灵魂的慧眼。可是您知道那个老头对您是怎么想的吗？”

“我不知道。”

“我告诉您，可是您听了别生气：他说您是白痴！一定是个白痴！而我不白痴在我的店里。祝您走运，但是请到别的书店去吧！”

西尔弗猛地站了起来，叫来侍者，付了钱，头也不回地走了。阿勒杭德罗仍坐在那里，担心有人听见了那场痛骂。干吗站起来？解雇了。他也许不一定要费太大的劲就能在另一家书店找到工作，可是不管怎样他总觉得有点茫然。老板给他留下的最后的印象是他发红的后脑勺，在衬衣领子上端有三道皱纹。这个肥壮的臃肿的结构，比老板的话更能促使他思考。他透过咖

咖啡馆的玻璃窗，观望着五月大街拐角处中午时分沸腾的高潮。

那个肥壮的后脑勺和这个地狱般的城市有着压倒一切的力量。他想着消失在地下火车人口处的人群，由于生活的压力，他们每天要匆匆忙忙地从这些台阶上走上走下。一天里，他们当中有多少人打开一本书看看？一定很少，可能一个人也没有。他试图设想这些人中可能有的人对文学有兴趣，但结果是徒劳：人们好象在飞奔，在为了争取生存而奔跑。

于是他又视察人们的脖子：有长的，短的，结实的，柔软的。他看见一个抱在怀里的孩子没有脖子。他从来没有观察过人们的脖子，而这是西尔弗的过错，他辞退了他。后来，作为告别，他又向他展示了自己肥壮的后脑勺上的三道皱纹。现在他证实了，孩子们生来并没有脖子。那就应该说是生活形成了人们的脖子。幸运的生活造就了细长的脖子；粗野的生活造就了胜利者粗壮的脖子，带有家用蛋糕的皱纹的脖子。想到这里，他真想放声大笑，几乎家西尔弗那样笑出声来。这时他发现，老板--他以前的老板--的谈话并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印象。要是那个退休老头真是小偷呢？他摇了摇头，想要驱散这种可能性。他逐字逐句地回忆那个退休老头友好而文雅的谈话，并又一次看见他微笑着告别，慢慢走出书店。现在他看见，或者说是想象着那个老头的有皱纹的脖子，一个松弛而善良的脖子，上面覆盖着几级白发。这个人不是小偷！一个小偷不会知道作者的名字，不会谈诗论赋，不会议论文学，也不会替他喜爱的作者辩护。阿勒杭德罗怎么能允许西尔弗根据自己的猜疑而污辱他的朋友呢？

侍者打断了他的自言自语，撤走了杯子，擦了擦桌子，这就是告诉他该走了。他站了起来，走到街上。上哪儿去呢？他平常总是在科连特斯大街的一家奶品店里吃午饭的，可现在他不饿，也不着急吃午饭：他用不着赶回去上班。他随着人流往前走，在阅报栏的橱窗前站住，漫不经心地浏览了一下新闻版。当他继续往前走时，又回到了市政厅的前面。啊！在这座城市的许多带皱纹的后脑勺当中，这真象是少女的细长的脖子！优美的拱门，白色的廊柱，保护着这座建筑阴暗的深处。他又想起在遥远的巴沙维尔巴索，那些照亮了他还远的童年的画面：雨中的市政厅，一群打着伞、穿着长礼服、戴着高顶帽的奇怪的人。从他稚嫩的童年起，他就认识了犹太垦殖者，其中有他的父母和叔伯，以及与世隔绝的加马乔人。这些加马乔人和垦殖的人一定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人，因为他们从来不出现在挂图上和学校的图画上。然而那些戴高帽的老爷倒是国家之父。他学会了崇敬他们，并渴望能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居住。现在他就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古老的市政厅周围遛达，亲切地观赏建筑上的铁叶图案，新刷上石灰的墙壁，高耸的塔，以及盘旋和停歇在这座巴罗克式建筑上的鸽子。

这些鸽子在市中心也是不沾世尘的，它们对车水马龙的喧闹声，对在它们安宁的飞翔下面奔跑的人们的喊叫声以及他们的凶猛和冷漠，都不觉得吃惊。它们发出咕咕叫声，在地上啄食五米，或者在草坪上和广场的卵石中间寻找面包屑，对为生存而奔走或者向北方转移的人们无动于衷，这些人组成一支食肉蚂蚁的没有尽头的队伍，向人口稠密的班卡和博尔萨地区行进。

为什么不和这些布宜诺斯艾利斯甜蜜的鸽子一样呢？它们是上天的阔太太，从天上可以看到无尽的长河。阿勒杭德罗抬起头，看鸽子在塔顶飞翔。当他低下头来时，突然遇见了退休老头。

“喂！您在这儿干什么少老人劈面问道。阿勒杭德罗看见他象是个被人

揭去了甲壳的老乌龟似的失去了保护。他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察看这个退休老头的脖子：恰巧是一个乌龟的衰弱的脖子。可是这个老头所没有的是什甲壳呢？他正想着这一点，却没有注意到老板的打赌赢了：这个老头到书市来了，大概他是每天都来的。

“这个时候您还不上班去，我亲爱的朋友？”阿马德奥亲切地问道。

怎么对他说呢？他已经没有工作了，正是由于他不同意这个老头是偷书贼而被解雇了。

“我请了两三个下午的假，”阿勒机德罗说。“我想熟悉一下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几个地方。”

他再也说不出什么来了，他不会撒谎。

“这个地方非常漂亮，浪漫而发人回忆。这里是昨天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和今天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握手的地方。”

老头微笑起来，这个微笑露出了他和蔼的马一般的口牙。老乌龟又钻进了它的甲壳，这个甲壳是什么呢？是和蔼的态度，友好的口气？

“五月大街修成的时候我还是个孩子，而斜角的沙恩斯·佩尼亚大街修通的时候我已经是大人了。将来哪一天我跟您讲讲科连特斯大街修成时的情况。我记得庆祝一百周年时的情景。我的父母亲挽着我的手。孩子和大人都很激动，因为我们看见了西班牙公主，她从自己的车子上向我们招手。您愿意我讲给您听这最后一条街，科连特斯大街，扩建完成举行揭幕仪式的情景吗？我正在皇家咖啡馆里同几位剧院的朋友喝咖啡和白兰地。店里不得不把门窗等一切都关上，只让熟悉的主顾过来。新的大街上闹得不亦乐乎。

各个街区的人都拥到了市中心，我们都提心吊胆。一百万男男女女拥挤在高塔周围！突然，咖啡馆安着金属帘子的大门打开了，希门尼斯和奥特罗定了进来。他们是我的朋友，我们常在一起喝咖啡。他们喝得有些醉了，刚才在外面同姑娘们取闹了一阵。‘我们带战利品来了！’他们一进门就嚷，同时手中举着两条撕破了的丝织短裤。真是一件丑事！

这里可以看见布宜诺斯艾利斯隐藏着的另一面。没有一条灯笼裤躲得过亡命徒们的手，但同样确实的是：没有一个姑娘--单身或结伴的--不投入这场疯狂的举动。而这一切都发生在高塔周围。您有什么要说的？”

是的，这就是那位退休老头，诙谐、高雅而友好。而这正是乌龟的甲壳！他在进行这样的谈话时，常常会谈到自己的隐私，嘲笑自己的困难处境，并巧妙地显示自己的不幸。“这是一副裂了口的旧甲壳！”年轻人这样想。他指着老头挟在腋下的一本厚厚的书，问道：

“那是什么？”

“这个吗？”

“对。”

“一本书。”

“我知道。”

老头的一双多疑而哀怨的乌龟眼睛紧盯着他。

“这是一本阿根廷鸟类的图片册。”

“我知道。”

“真是一本漂亮的图片册！”

“当然是，而且很贵！”

“我想也是。”

“大概不是您买来的吧？”

“人家借给我的。”

“书是可以借来读的。可是难道一本宝贵的图片册也会出借吗？这是偷的，”阿勒杭德罗想道。他想向他借图片册要来看看，那上面一定还有他的书店的标签，或者是别的书店的标签，这都一样。可是他没有敢这样做。他自己也觉得象个乌龟一样，没有甲壳，一个可怜的，没有自卫能力的小动物，一个在生活中餐风宿露的无能之辈。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老头在思考着，并不时地看看年轻人，又看看书市。

“我要走了，”最后阿勒杭德罗说道。“您呢？”

“我去看一个书店老板，我的朋友。就在那个书亭里。”老头指着说。“就是他借给我这本书的，我去还给他。”

老头停了一会儿，这时他已经完全摆脱了初时的惊恐，特别客气地邀请道：

“要是您等我两分钟，我马上就回来。我很高兴请您去喝两杯，怎么样？”

老乌龟炫耀起它破旧的甲壳来了。他腋下紧挟着那本书。“偷来的，偷来的，偷来的！”年轻人心里反复地说，无法再想别的事情。

“谢谢，改日奉陪，我要上班去。”这时他发现，他的说法是和他原先说的请了假是自相矛盾的。但老头对快些结束这个会晤是高兴的。

“要是您不快一点，会迟到的。”

“可不是吗！明天见。”

“明天见，朋友！”老头笑容可掬地向他告别。

阿勒杭德罗真想快些溜走。他穿过大街，突然又转过身来，老头已经在书市的人群中消失了。毫无疑问，他一定是去把那一本偷来的图片册贱卖了。年轻人朝他童年时的市政厅的建筑扫视了一下，他这样做似乎是为了抵消冒到喉咙口的恶心，好象醉酒后打嗝儿发出的胃酸那样。

“呆子！”一个司机几乎在他耳边叫了起来。汽车猛地煞住，才避免了把他撞倒。

阿勒杭德罗赶紧跳到人行道上，两腿还在发抖。他随着冷漠无情的人群往前走，他们象是往四面八方走去，但又哪儿也不去。

他象个扒手似地在科连特斯大街的书店中转来转去。他从大街对面的人行道上观察西尔弗的书店，等着老板到来，以便把他遇见老扒手的事告诉他。

他觉得肚子饿了，便在一家奶品店里吃了一张甜饼。吃完了又往前走，走进了中央书店。他站在一张堆满廉价处理书籍的桌子旁机械地翻阅，看见老板拉戈里奥一动不动地坐在店铺深处的柜台里，旁边的收款处冷冷清清，店铺里一片凄凉景象。一家书店里摆满减价拍卖的书而仍没有读者光顾，还有比这更伤心的事吗？一架大功率的记帐机放在那里一动不动，一声不响，还有比这更凄凉的景象吗？

售书人胡安·马努埃尔梳着光光的头发，穿着一身漂亮笔挺的灰色衣服，脸带微笑，平静地朝阿勒杭德罗走了过来。“他象个电影演员，或者歌唱家什么的，”阿勒杭德罗钦佩而羡慕地想道。

“您好！”胡安·马努埃尔招呼道，在他旁边站住，小心地整理摆在桌上的书。阿勒杭德罗用严格的职业家的语气谈起来。

“能卖出一些吗？”

胡安·马努埃尔紧锁双眉，抿了抿嘴。

“就是这么回事。”并把手一摆，表示无可奈何。

接着他又明确地说：

“不瞒您说，一本也卖不出去。”

“我看堂拉戈里奥很发愁。”

“买卖是这个样子，他怎么高兴得了。另外……”

胡安·马努埃尔迟疑起来。

“什么事？”阿勒杭德罗问道。

“您一定知道了。”

“到底什么事？”

“他正在发火呢，因为一个店员被人挖走了，就是小圣地亚哥，他是晚上上班的。”

“谁把他弄走了？”

胡安·马努埃尔用责备的眼光把他很快地审视了一下，说：

“怎么您还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真奇怪，就是你们！”

“我们？我们是谁？”

“就是您的老板把我们的小圣地亚哥挖走了。”

“西尔弗？”

“还会有谁？”

“弄走一个店员，事情就这么严重吗了？”

“当然算不上是犯罪，可是这是做生意中严重的不讲信义。另外，由于拉戈里奥的情况不妙，走了一个店员，他感到绝望。他说，沉船以前，老鼠都先跑掉。”

阿勒杭德罗突然回想起西尔弗在离开咖啡馆里的桌子时被他看见的肥壮的后脑勺。

这个人回去之后不是考虑什么忘恩负义或是别的类似的题目，一点不是！而是实实在在地处理辞退一个不称心的店员之后的善后事宜。他雇用了小圣地亚哥，赢得了一个好名声的店员，同时又给竞争对手在精神和实际上进行了有效的打击（说实话，这个竞争对手已经半破产了，可以说快要彻底完蛋了）。他的前老板继续在对他的进行有效的教训。

而他--阿勒杭德罗--还在等着他，想把遇见老扒手的事告诉他呢！为什么要这样向他讨好？在这个城市里，没有一样东西是自给的，哪怕是时间，问早安，都不是。

“要真是这样，”阿勒杭德罗想了起来，“拉戈里奥现在也有机会弄走西尔弗的一个店员。”

“您说什么？”

“我就是为此而来的。”

“那最好您跟拉戈里奥谈去，”胡安·马努埃尔提议。

“好吧。”

他看着胡安·马努埃尔朝柜台走去，接着拉戈里奥走了过来：

“我们喝杯咖啡吧？”

“好的。”阿勒杭德罗同意了。

他们来到塔尔卡华诺拐角处。

“最好在对面的酒吧喝点东西。”拉戈里奥指着对面说道。“铺面是不漂亮，但我喜欢在锌皮柜台上喝杜松子酒。”

后来阿勒杭德罗发现，他真正喜欢的是观察他的中央书店，特别是着迷地观察西尔弗的书店。这样，展示在拉戈里奥面前的是整个的演习场；这是规划未来战役行动的理想时机。拉戈里奥在思索着，并不时地摸摸鼻子，好象这样能帮助他清理在脑子里互相追逐的念头。

“科连特斯大街‘凉’了，但这没关系，我有办法。”

他摸了摸鼻子尖，接着说：

“惊人之举，您等着瞧吧！”

他朝整条大街望了望，又说：

“这将使科连特斯大街震动起来。”

阿勒杭德罗装出一则随机应变的脸相，谨慎地点点头，心里却说谁也不能使那条大街震动起来。他想起，西尔弗从来没有想叫谁震动，而只想捞到好处，尽管只是一点小小的好处也罢。屹立在沙漠中的金字塔是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堆积成的，而那个可怜的拉戈里奥却在梦想着靠某个天才的主意使全城震动！阿勒杭德罗无法使自己脑中摆脱西尔弗的后脑勺的形象，并为其前老板所做的事情感到惊奇。

“那您打算怎么办呢，堂拉戈里奥？”他一边问，一边严肃地微微点头，象是等着听取深刻的说明。

“我正在仔细考虑，”这位书店老板又卖起关子来。“这将会引起轰动的。”

“大拍卖，是不是？”阿勒杭德罗猜到了。

“您怎么知道的？”

“我想的。一家书店还能干出什么别的轰动的事来？”

“您什么也不知道。这不是一般的拍卖，而是要引起轰动的拍卖。我不是说过，要震动整条科连特斯大街吗？就是这样。十五天当中，别的书店准也做不了生意。”他抱着这样的希望，朝对手的书店几乎是亲切地看了一眼。“您等着瞧吧。”

他停顿了一会儿，拿出进口的香烟来请年轻人抽。点了烟之后，他直截了当地问道：

“您失业了，是不是？”

“是的。”

“您可以到我的书店来工作。需要考虑吗？”

“不需要。”

“那怎么样？”

“我接受您的好意。”

阿勒杭德罗默不作声，好象在考虑着还应该说些什么。

“谢谢，堂拉戈里奥。”这是他唯一想出来的话。

“您在西尔弗那里挣多少钱？”老板问。

“三千五百。”

“眼下我先付您三千。我的情况不好，您大抵已经看到了。”

“至少我想挣得和我原来的书店一样的工资。”

“我的对手给您多少钱与我无关。您进我的店里来补缺，而这个人原来的工资是有定数的，小圣地亚哥挣三千。当然，西尔弗给他四千，就把他弄走了。”他说完这话，眼睛深处闪示着严酷的火花。（可是这严酷是针对谁的呢？”年轻人想道。）

“至少请您付给我三千五百。”年轻人坚持说，“换个店总是为了更好一些，而决不是为了挣得更少。”

“小圣地亚哥的情况和您不同，他是个老练的售书员，有十多年的实践经验，而您……”

说到这里他停了下来，两眼瞅了年轻人一会儿。仅仅是一会儿，随即朝摆满各色酒瓶的货架上望去，又接着说：

“您是被解雇的。”

他们怎么这么快就知道了呢？阿勒杭德罗朝街上望着，感到新老板的眼睛又在瞅着自己的后脑勺。他明白了，拉戈里奥眼睛深处闪示的严酷的火花正是针对着他的。

“我说的不对吗？”拉戈里奥装着将信将疑的样子问道。他把手放到胸前，好象是由于自己说错了话而感到难过。

“有人告诉您了，但大概没有把真相告诉您。”

“为什么没有呢？”

“因为谁也不讲真话，特别是当事情传得这么快的时候。”

“那么您和西尔弗到底出了什么事？”

如果说拉戈里奥假装多愁善感，那么阿勒杭德罗就是装着若无其事。

“那是个人的事，我们吵架了，我就到这里来了。”

“至少您得承认，他不是个好东西。”

“谁？”

“我不是说您，是说西尔弗。所以我才要您来协助我，因为您同那个无赖吵架了。”

“谢谢您对我的信任。”

“但是我每月只能付给您三千！”拉戈里奥喘着粗气说，并马上把侍者叫来付了咖啡和杜松子酒的钱，又向坐在柜台里掌管着顾客盈门的酒吧的加利西亚人问候，同他议论店里的生意，特别向他表示羡慕，他当了酒吧老板而不是书店老板。当然，这一切是为了让合同得以达成，阿勒杭德罗连插一句话的机会都没有。

“您跟我来。”拉戈里奥对他说。

老板把他带到店铺后面，那里既有聚而不散的陈旧纸张的气味，又有隔壁斯帕益带兰地亚餐厅透过来的春茄酱的气味。他们走进书店的地下室，拉戈里奥两手摊开，把直抵天花板的高大的书堆指给他看。

“您觉得怎么样？”拉戈里奥的语气是要他无条件地钦佩。

“货品真多啊！”阿勒杭德罗说。

“货品？”拉戈里奥不喜欢这个词儿“您说的是什么货品？是一堆堆书山！您见过这样的情景吗？这些都打算在大拍卖中抛售出去，都放在廉价桌上卖！现在您相信我要震动科连特斯大街了吧？”

“但愿如此！”

“您不相信这会成功？”拉戈里奥烦躁不安地看了他一眼。“这些不是坏书，有好书。我准备两块钱一本抛出去。”

“我觉得要震动科连特斯大街是不容易的，除非……”

“除非什么？”

“除非是一场地震，堂拉戈里奥。”

“真是个乐观的小伙子！”老板笑道。

“您别怀疑，一场地震是唯一的解决办法。”阿勒杭德罗十分肯定地说。

他感到失望，在积满灰尘的高大书堆中间觉得透不过气来。这些都是现已不存在的出版社的处理品，或者是已经去世的学者的藏书，被他们的厌烦的家属廉价卖出来的。

这些是绝版的书，是不成功的冒险，是没有收件人的信件，是死去父母的精神流产地。

封面已呈黄色。一个店员正在小心翼翼地把用国内货币的价值荒唐地标出的过时的价格擦去。

“地震，只有地震。”他心里强烈地相信这一点。突然一阵痛苦的揪心的激情向他袭来。他想起当地开始进“新屋”书店工作时曾象个傻瓜发誓似地说过的话：“残酷爱书。”这同说“酷爱”一车砖头或一串香肠是一样的。这里有书堆成的小山，是一大宗货物，而且发出的气味象是一堆发酵的土豆那样难闻。

他坚持他的处方：

“一场地震，堂拉戈里奥。一场地震才能一切从头开始。”

但是拉戈里奥没有答理他。他正在聚精会神地看着小伙子用刮脸刀片在把二十年以前的非常低的价格刻去。

“好好刮。”

“难道我刮得不好吗？”小伙子不满地问。

“照这个样子您一辈子也刮不完。刮快一点，而且刮得轻一点，不要让人看出来。”

拉戈里奥把小伙子介绍给他：

“这是奥拉西欧。”

两个年轻人很快地互相看了一眼。

“你们两个负责供应廉价书桌。”

然后拉戈里奥巡视杂乱的书堆。

“您觉得怎么样？”他又想唤起阿勒杭德罗的敬意。“我们减价，一次真正的拍卖！”

“这很有趣。”阿勒杭德罗表示同意。

“真的吗？”拉戈里奥兴高采烈起来。“我想把书抛售出去，但是要区分某些种类。

廉价的书要按一定比例。甚至我们可以在廉价书桌上也放几本名出版社出的书。让公众以为我们是发昏了！让他们象猛兽似地扑上来吧！有些书放上去作诱饵。您负责供应书本，要使大家保持对廉价书的兴趣。”

“这确是一份好差事。”阿勒杭德罗叹口气说，两眼注视着积满灰尘的书堆。

“您别这么想。”

他停顿了一下，用手摸了摸鼻子，又说：

“您要怎么样？在一个没有顾客上门的书店里穷极无聊呢，还是在顾客盈门的书店里接待热情的读者？最坏的事是无聊，您说是不是？”

他又微笑着鼓励年轻人说：

“您会喜欢的。”

阿勒杭德罗在这些书堆中间感到窒息难忍。在这个腐烂纸张的阴暗的墓地里，难道有人会高兴吗？

“该死的老鼠！”拉戈里奥忽然嚷了起来。“那儿跑掉了一个！”

“算了吧！”奥拉西欧耸了耸肩说。“这些老鼠整个下午都大摇大摆地走。”

“那您干什么来着？”拉戈里奥问道。

“我们已经非常熟悉，用不着彼此打招呼了。”

“应该放几个老鼠夹。”拉戈里奥说。

“干吗？”奥拉西欧又耸了耸肩。“您可别以为老鼠对书本感兴趣。它们是借路，从小吃店到斯帕盖蒂兰地亚餐厅去，或者是从餐厅到小吃店去。它们根本不关心书本。

在这方面老鼠和人想的可能差不多。”

“什么时候开始拍卖？”阿勒杭德罗问道。

“尽可能早一些。”拉戈里奥一边沉思一边回答。“这取决于广告什么时候交货。

啊，对了！我要张挂几幅大标语，用红字和绿字宣告我店难以置信的彻底的大拍卖。”

阿勒杭德罗的书本知识起初曾引起其他同行们的猜疑。这个中了知识的毒的内地人以为自己是个什么人？幸好，这个外乡人一点没有敌意，克服了误会的屏障。

在下午短暂的空闲时间，奥拉西欧和胡安·马努埃尔总是津津有味地谈论着足球、女人、赌博，说着关于出版社和书店老板的闲话。

随着对首都行话娴熟的掌握，这些谈话的内容也越来越广泛、复杂。他们同阿勒杭德罗谈话总是带着和善的保护者的口气。最后，他成了他们的一个好伙伴，于是他们邀他参加他们用首都行话进行的谈话，使他“开窍”，并且使他似乎成了首都世家的子弟。

那一天下午，他们忙着准备了即将引起轰动的大拍卖的书摊，把一吨的书从地下室搬出来，陈列在书摊上。傍晚时，上晚班的售书人来了，他们便在地下室的书堆上躺下休息。

奥拉西欧用手指着阿勒杭德罗说；

“你是个内地人，什么也不懂。”他带着他惯有的同情的苦笑说。“我们首都人在某些事情上是擅长的。论摸屁股，谁也不如我们！无论是古罗马人还是法国人。总之，你在书本上所认识的那些人都不行。这是一种科学，我们从小就开始学了：刚学会走路不久就开始学。由于我的记忆力良好，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干的情形。那时我在帕特里西欧斯公园混合小学读二年级。有一天老师叫我同一个小胖姑娘坐在一起。我记得很清楚，她脑后扎着一个大大的发髻。一个留级的挑唆犯低声对我说；‘你别傻头傻脑的，去碰碰那个胖家伙。’我不敢这样做。但我更害怕这个小流氓，他总是叫我傻瓜、笨蛋、白痴、胆小鬼。终于，我把手伸进她的傲气的发髻里。那女孩叫了起来。老师小题大作，把我罚了一顿。糟糕的是那个挑唆我的小流氓对我的壮举一点也不满意。他说：‘你真是个白痴。这必须偷偷地干。比如说，我可以去碰老师。但我不干，因为要是让她发觉了，她会再让我留级的。这个坏女人。’

于是那个傻大个给我传授他的经验，这比学校的功课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心思。我终于达到了这种水平，你瞧！”

奥拉西欧的手向上慢慢划了一个圆圈，同时手指象热带鱼那样灵活地颤动着。

“有时候我不愿这么干。可是已经成了习惯了，我管不住我自己。”

“你结婚的时候可要当心！”马努埃尔笑着说。

“我记得我第一次把一个女人扶起来的情景。我看见她躺在阿尔西纳大街上，便把她扶送旅馆。在上楼梯的时候，我碰了一下她的屁股（当然她穿着衣服），就好象我们在电车上或者舞台上一样。这就是我关于那第一次所记得的唯一的東西。其他几次都是令人失望的，我不记得了。”

“你的这一着总是顺利的吗？”阿勒杭德罗问道。

“得了吧！有时成功，有时失败，丢丑。有一次我同小个帕特里西欧斯和科罗尼亚一道出去。我第一次穿上长裤子，很是得意。我们在市中心遛达。忽然我们看见一个姑娘在朝一家商店的橱窗张望，手里提着一个帽盒。我们不声不响地走过去，好象是被玻璃橱窗所吸引。‘这次轮到你了。’贝贝对我说。于是我用手在她身上一蹭，继续往前走。不一会儿，我觉得脑袋上挨了一下。那姑娘追了上来，当着众人的面，用帽盒在我脑袋上敲了一下。真丢丑！”

“你只想到你丢了丑，就没待那个可怜的姑娘想想？”阿勒杭德罗反驳道。

“我干得倒利落，谁也没瞧见。倒是那个爱闹事的姑娘当众打了我。多么脸红，我的上帝！当然我没有吭声，仍然一本正经地往前走，好象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而那个爱闹事的姑娘还冲着我们喊：流氓！但我得意地继续往前走，脑袋上带着一个包。她怎么知道是我呢？我们是三个人一道走过去的。难道是她猜出来的，或者是偶然打着我的？我思索着，终于想起：我们离开那儿的时候我回头瞧了一眼。自然，她看见了我回头张望，便明白是我了。”

“她不喜欢你的脸，”胡安·马努埃尔说。“所以你才挨了打。”

“眼睛能叫最机灵的人也完蛋，我说。不张嘴说话是容易做到的，而要眼睛不背叛你可就难了。”奥拉西欧说。

“你认为怎么样？”胡安·马努埃尔向阿勒杭德罗问道。

“我觉得象是薄伽丘的一个故事。”阿勒杭德罗回答说。

“这个薄伽丘算老几？”奥拉西欧耸了耸肩说。“眼睛能使最机灵的人也倒霉，这使我想起小时候的一件事情。那时我们每天上电影院去，在迪亚斯上校大街，我们叫它‘臭虫’电影院。我从来没有这么快活过。我们有二十分钱，用十分钱买了面包，用十分钱买了凉菜，吃得象国工那样舒服。那天下午，波却罗在街上拣了几块松胶，我们放在嘴里惬意地嚼着，象乡下人似地乱吐。忽然我想起往前面吐。您们知道嚼松胶是什么滋味吗？嘴里积满口水。我朝前面一口吐出半斤口水，吐在前三排的一个人身上。他站了起来，个子又高又壮，衬衣的袖子往上卷着。他径直朝我们走了过来。大家都在聚精会神地看电影，只有我因为心虚，看见他在前走来。当他在我们面前站住时，我又低下头去。这就叫我完蛋了。‘是你干的，是不是？’他温和地对我说。我还没来得及否认，他便在我脸上狠狠揍了两拳，然后到外面去擦身上的口水。他的一拳打在我耳朵上，震得我耳朵里又痛又嗡嗡直响。‘他打得又快又准，’坐在我旁边的崔可说；他是内行，自认为是拳击手，所以他

又说，‘我要是知道他是来打你，就一定会保护你的。’但是大家都一致认为，那还是便宜了我。因为挨了我吐的那个人原来竟是个卖肉的，外号‘刀手’。他身上总是带着一把刀，喜欢和人打架。我想起‘刀手’可能在外面等着我，身上便出冷汗。一口口水虽然是无目标地随便吐的，却会招来一场灾难。可是‘刀手’没有回来找我打架，感谢上帝，因为那个电影他看得不喜欢，便离开了电影院，回肉铺去帮助他父亲掌刀去了。”

听到这儿，胡安·马努埃尔对阿勒杭德罗说：

“你呢？有什么可对我们讲讲的吗？”

阿勒杭德罗神秘地微微一笑。

“讲讲吧！”奥拉西欧要求道。

阿勒杭德罗轻轻摇了摇头。他想起自己的孩提时代，在巴沙维尔巴索上学时腰间扶着书包奔跑。想起清晨神奇的露水，他的两手冻得发紫，那是冬日美好而寒冷的晨光。

“我没有什么可讲的。”他温和地回答。

“我看你也讲不出什么来。”奥拉西欧说。“然而你倒是有许多事情要学的。”

拉戈里奥的到来打断了他们的谈话。他装着非常激动，这就使他要求他们一点也不休息，立刻上去接待顾客有了充分的理由。

“店里挤满了顾客。快上去吧，小伙子们！”

大家都离开了地下室。有些好奇的顾客在他们方才布置好的廉价书桌上翻阅。

“当心有人顺手牵羊！”老板轻声对他们说。胡安·马努埃尔讥讽地哼了一声说：

“偷拍卖的书？小偷知道自己要拿什么。他们从来不偷垃圾的。”

“说得对。”拉戈里奥说。“你们要注意这些在拍卖桌上翻阅的人走到贵重书籍那边去。”

行人在横跨店门上方的红色大标语前面停下步来。标语上写：“书籍大贱卖”。他们看见有人在桌上翻阅，便也进店来翻阅。这又引起其他过路人的好奇心，也想进来翻阅。不一会儿功夫，每张桌旁都围了一堆人。记帐机也忙碌地不断咔嚓响着。

“您跟我来，阿勒杭德罗，”拉戈里奥吩咐道。在他们下楼梯的当地，老板对他说：

“您看，我没说错吧？整条科连特斯大街都震动了！”

阿勒杭德罗暗自想，记帐机在劈啪地跳，拉戈里奥的心也在劈啪地跳。

他们又挑了几堆书搬上来，从围着桌子在翻书的人们的脑袋上方倒到桌子上。这种做法引起了顾客们的激情，他们象母鸡似地在书堆中扒着。他们的这种兴奋情绪又感染着科连特斯大街上的过路人。

这时堂阿马德奥进来了。这个退休老头走路的神情显得稳重而不失身份。和往常一样，他那崇高的在城市里不为人注意的哲学家的高洁风度，重又唤起阿勒杭德罗的同情。

当老头从他身旁走过时，他机械地向老头问候：

“下午好，堂阿马德奥。”

可是退休老头嘴巴一动不动地从他身旁走了过去。“他甚至眼睛一眨都没眨，”阿勒杭德罗想道。“好象我这个人根本不存在似的。”他既对这个小

偷感到恼怒，又对这般老练的演员感到钦佩。这些交织的感情融汇成巨大的好奇心。

突然，他意识到，老头所以没有同他打招呼，是照顾其潜在的同谋。西尔弗也没有向市政厅那里的卖书人打招呼，虽然这个人向他告发了阿马德奥的偷窃行为。

他让退休老头独自走向陈放着技术书籍的书架。所有店员和拉戈里奥本人都在注意着聚集在拍卖书摊周围的人群。阿勒杭德罗不知该采取何种态度：跟着这个老头，监视他？他不愿这么做。他到底是谁的朋友呢？是拉戈里奥的朋友，还是阿马德奥的朋友？这两个人都见鬼去吧！他想离开那里，便朝大门走去。拉戈里奥盯了他一眼。他对老板说：

“我头痛，想去喝杯咖啡，吃一片阿司匹林。”

“快点回来。”老板吩咐道。

他到塔尔卡瓦诺拐角处去喝咖啡，忽然他看见退休老头从橱窗前面走来，手臂上换着大衣：这是偷书贼常用的办法。

堂阿马德奥从柜台上拿了一张票，在桌旁靠阿勒杭德罗坐下。他面不改色地向四周扫视了一眼，然后才向这个卖书人招呼道：

“您怎么样？”

“没什么。您呢？”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小口地喝着咖啡。阿勒杭德罗斜眼看着他，不觉感到同情。这是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第一个朋友，现在不知应该如何看待这个朋友：是可怜的退休老头呢？还是一个现行的偷书贼？可是，他到底是什么，这有什么关系呢？归根结蒂，他跟自己一样，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可怜的居民。是这座城市把地塑造成这个样子，教他们按照它的方式去生活的。既不是朋友，也不是小偷，什么也不是。他们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两个居民，坐在咖啡桌旁，就象一条船上的两个旅客，在凭栏眺望科连特斯大街上的过往行人。

“我该走了。”老头说。“非常感谢您，阿勒杭德罗。”

“什么事？”年轻人觉得愕然。

“感谢您把我一个人留在书店里。”

阿勒杭德罗想，他一定拿走了一本名贵的书。

“我并不是要帮助您才这么做的。”

老头却不这么想：他向年轻人伸出手去告辞，并在他手里塞了一张钞票。

阿勒杭德罗偷偷看了一眼：那是一张五十比索的票子。他紧紧捏在手心，塞进了口袋里。他终于忍住了哈哈大笑，差点儿把喝下去的最后一口咖啡吐了出来。

我们上都市去

一切都是在我姐姐回家之后发生的。父亲看见她回来，立刻从草凳上跳起来，抓起拐杖，绷着脸出去了。他没有走远，就在那树荫下站住了。而

我母亲却叫唤着我姐姐弟格林达的名字，并和她拥抱在一起。

姐姐穿着一身鹦鹉色的绿衣服，脚上穿着一双新皮鞋。她看上去很漂亮，粉白的脸，红润的嘴，象一片西瓜。她象是学校中的小姐，或者是药剂师的女儿；总之，象是个名门闺秀或是良家淑女。其实我姐姐不是那种人。她说她有事要和母亲谈，便把我赶出了茅屋。

她总是那样。当以前我们一起上火车站去卖奶酪的时候，她叫我一个人拿着东西，自己空手在前面走，扭动着屁股，拖拽着脚步，享受着夜晚清凉的空气。到了站上，我们等候火车到来，有时候一连等上几个小时。但她从来不和别的做买卖的女人说话，而只和小伙子们打得火热，特别是和却罗最合得来，让我一个人看着奶酪，不能离开篮子，因为人家会把我的东西偷走，那我就要倒霉了。

我总想知道我姐姐在干些什么，特别是想看看她的脸上怎样。可是在回家的路上，她却不走在我的前头了，而且走在我的后面，那样我就看不到她和却罗在干些什么，他总是一直送她到我家附近。只要我一停步或转过脸去，他们便对我嚷起来，叫我往前走，象是赶狗一样，还向我扔石子赶着我跑。更使我恼火的是却罗把碎砖头扔在我的背上或腿上。但是，我却更为我姐姐的笑声感到伤心，她笑个不停，在回到家门口之前她的笑声一直在我耳际响着。

我的姐姐就是这个样子，一直到有一天有人把她带走了。这个人不是却罗，他还在村里推车送面包，而是罗萨里奥^①的一个汽车司机，还是结过婚的。这个人中途就把她丢在科尔多瓦^②了；她在那里便一个人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去。为了有个安身之处，她给人家当佣人，这样一切都解决了。放假的时候她就回家探亲，因为她很想看看我们大家。

这是她对母亲讲的，我是躲在窗下偷听到的。母亲告诉她，家里一切都和往常一样，要说不如以前，那就是只有我一个人上火车站卖奶酪了。还说老头子不肯原谅弗洛林达。

现在买卖不如以前好做了，因为一个年轻姑娘晚间上火车站给过往旅客卖奶酪，生意好做些，总会给家里帮点忙。所以老头子对她这种忘恩负义很生气，现在只有我能给家里挣几个比索回来，而这几个钱也越来越不够用了。我姐姐回答说，老头子是个自私鬼，他从来不关心自己的女儿没有鞋子穿，脚上长了沈他也不管，所以几个女儿都走了。还说，也许我会留下，那也只是在我长大成人之前，因为我很笨拙，村里别的象我这样年龄的孩子都会很好地照料自己了，无须别人的帮助，而我甚至连卖点东西都不会，还让人家把带去卖的村里最新鲜的奶酪给偷了。我母亲竟不说一句替我辩护的话，这使我很不高兴。于是我仰起脖子从窗口向里张望，看见我母亲点了点头，似乎在说：是这样的，他是个笨蛋。这话有点道理。因为我没有及时把脑袋缩回来，以致让姐姐看见了我，便不顾体面地吼叫起来，并且在地上寻找个东西向我脑袋扔过来。我只好跑开。又是一下子打在背上！这回扔过来的是一只旧鞋。我转过身去，看见姐姐站在那里，咬紧嘴唇，紧皱双眉。这回她不象从前当却罗用碎砖头打中我时那样笑了，但我觉得她那张脸比她的笑还要难看。

①阿根廷第二大城市。

②阿根廷第三大城市。

我不敢再回到窗口去窥视，不知道她们后来又谈了些什么。我走到院子里，父亲正在那里翻晒奶酪。地面晒得发烫，烤的我的脚，然而老头子却

好象悠然自得。他仅有一只脚晒得黝黑，布满皱纹和裂口，象干涸的河底一样。但是那一条腿却象两条腿那样粗壮而有耐力，好象在我出生以前他那条被火车碾去的腿的力量都集中到了这条腿上似的。老头子的两只眼睛虽然完好无缺，但视力却不行了。他的眼睛动不动就掉眼泪，不论是被太阳晒了，还是因为女儿的离家出走。

他要我帮他一下忙，说话的神气与往常不同，好象和大人说话一样。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要做，所以我不明白该如何帮助他。

“弗洛林达回来了。”他说，“你那几个姐姐都一去就再也不回来，她回来干什么？”

我耸了耸肩。我听见的谈话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内容，但姐姐的那张怒气冲冲的脸却不是什么好兆头。因此我宁愿什么也不对老头子说，两个人一声不响地把新鲜的奶酪放进篮子里。

天黑了，母亲叫我们去吃饭。我们慢慢地走去，好象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老头子在前头倚着那根他自己用木头做的拐杖一跳一跳地走着。

饭桌上好象开宴会似的丰盛，摆着两瓶酒和姐姐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带回来的许多好吃的东西。但谁也没有显得很快活，大家只是闷声不响地吃着。最后母亲开口了：

“弗洛林达给我们带来了厄明达的问候。”

“她在干什么？”老头子眼睛看着菜盘子，嘟吹着问道。

“她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住，有两个孩子了。”

“两个孩子是谁的？”

我母亲不知如何回答，或者是她不想回答。她用胳膊肘推了一下我姐姐，叫她接着说。

“她日子过得不错，叫我向你们问好。”弗洛林达说，“她说，要是我们全家能团聚在一起，那该多好！”

老头子装着什么也没有听见，转过脸去问我母亲：

“厄明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干什么？”

“据说她有一座房子。你为什么不问弗洛林达呢？她看见厄明达了。”

老头子对母亲的提示不予理会，他倒了一杯酒，一口气灌了下去。大家都低着头，默不作声。最后我说道，

“我上火车站卖奶酪去了。”

于是老头子看了看我，我想他是向我表示感谢，这使我感到骄傲。我对姐姐说：

“你陪我一道去吗？”

“上哪儿？”她那涂了口红的嘴撅了起来。

“火车站。”

“你疯了！”

我父亲在椅子上转过身去，好象脸上被人吐了一口。

“从前你在火车站上玩得很快活。”我提醒姐姐说。

“从前我很蠢。”

“你要是陪我去，会见到却罗的，他常常向我问起你。”

“去他的！”她冷笑着说，“这个可怜的脏鬼！”

这时我明白弗洛林达变了。她变得象老头子的拐杖一样硬，冷若冰霜，而不是满腔热情。从前，当她和却罗手拉着手走在我后面的时候，我倒喜欢

看看她在干些什么，看看她脸上是什么样子，他们会突然躲进树林里，消失在知了的鸣叫声中。现在，当我臂上挎着盛奶酪的篮子往火车站走去的时候，常常想起这些事。地上的知了，天上的星星，一切还是老样子，只有我姐姐变得从来没有的古怪，想要把一切都搅翻。

在火车站上，却罗向我走来，说：

“听说你姐姐坐公共汽车回来了。为什么她不来看我？”

“她不愿意到站上来，”我告诉他，“她说她回村不是来看什么脏鬼的。”

却罗忍住了性子，没有抽我的耳光，说：

“我也听说了。她回来时打扮得象个妖怪，还戴着帽子。你等着瞧吧，我们要教训教训她。”

我真想对他说我愿助一臂之力，但他转过身，找他的朋友去了。不一会儿功夫，大伙儿就在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开来的火车出现的地方，站口最暗的那一头，议论开了。我只看见他们抽烟的火星。我绕过厕所，小心翼翼地靠近他们。

却罗似有怒气，其他人却在笑。

“这好办，”我听出是胖子罗益的声音。“我们大伙儿在路边上等她，看准时机，一拥而上。看她以后还敢不敢再装做首都的人！”

本来我可以再听下去，但干这一类事对我总是不顺利。我自己倒是藏得好好的，倒霉的是我没有把篮子藏好，让人看见了。

“你在那儿干什么？”却罗气势汹汹地走来问我。“你在偷听吗？”

“我肚子痛，”我忽然想起了一个借口。

“那你进厕所拉去，别拉在外面。”

幸好，从土库曼开来的火车进站了，我跑过去叫卖奶酪。有些奶酪已经被偷了，这一定是那个胖子罗盖干的。但我没有骂他，因为我觉得他出的主意不错。

我回到家里，他们的谈话还在继续。我姐姐说话的口气很得意，而老头子的眼睛却在掉眼泪。这倒没什么，他老是这样。真正要紧的事还是姐姐对我说的话：

“我们全家都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去。”

“你们觉得怎么样？”母亲问道。

我父亲摇摇头，还想再听下去，但我姐姐用她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带来的高傲的声调抢先开了口：

“厄明达让我们先住在她家里。你们还要怎么样？换了别人早就高兴得跳起来了。”

到了那里大家都会有事做，有钱挣。”

父亲没有吭声，他抓起拐杖出去了。谁也没有理他。母亲要我拍卖奶酪的钱交给她。

她数了数，觉得太少了。

“没有做什么生意吗？”

我只好告诉她说，有几块奶酪被人偷走了。火车进站的时候，我正好在车站的那一头，因为我肚子痛，所以别的小贩就抢到我前面去了。

“我不是跟你说过嘛，妈妈，”我姐姐忍不住说道。“他是个傻瓜！”

我一声不吭，在墙角的一条长凳上坐下，眼睛看着地上，心里祈求罗盖他们的计划不要落空。

第二天，却罗推着他那辆新自行车来了。自行车很漂亮，全身镀铬，缠满彩带。而我姐姐却看不上眼。她拉长着脸迎接了却罗和他的自行车。

“你来干什么？”

“来向你问好。你忘了我们是朋友了吗？”

这家伙打扮得象过节一样，脖子上围着纱巾，头上的发蜡在太阳的照射下晶莹透亮，他象一个电影演员似的微笑着说：

“你真漂亮啊！”

“真的吗？”我姐姐嘲笑地说。

“我是来请你的。”

“去看火车吗？”

“看来现在你是个外乡人了，今天晚上没有火车。我是想请你上咖啡馆去。”

“你什么时候开始上咖啡馆啦？”

“我不送面包了。现在我是个职员，明白了吗？”

“这我可不知道。”

“好吧，我就是来请你上咖啡馆去的。”

“我们可以今天下午去。”

“最好晚上去，”却罗建议说。“晚上可以跳舞，更热闹些。”

“那你就来找我吧。”

到了晚上，我姐姐梳妆打扮起来，穿上了绿衣服和新皮鞋。她看见我在屋子里转来转去，便警告我说：

“你已经长大了，不要再跟在我后面转了，不要再淘气了，明白吗？”

我走过后院，去帮老头子干活。当我们回到屋里的时候，姐姐已经出去了。母亲端来菜汤，我拿起就喝，以致烫了舌头。我溜了出去，向村子的路上跑去。

我跑过十字路口，看见路边有一团黑乎乎的东西。我象使性子不走的驴子那样钉在那里，那是却罗的自行车。他们在什么鬼地方呢？我从来没有过如此强烈的愿望想看看出了什么事，但又十分害怕。我走进树林，在一块空地上看见几个人影一声不响，耷拉着脑袋，他们大概是围着我姐姐，象是给死人守灵的样子。

他们家是一群晚上出来吃草的马，一声不响，慢慢腾腾，时而发出几声哀怨。

我退后了几步，不让他们看见我，虽然有某种东西越来越用力把我向前推去。我的心象吊桶似地七上八下，两腿直打哆嗦。我抱住一棵树，但觉得那棵树干也在颤抖，并把我使劲摇晃起来。我几乎喊出声来，于是咬住树干。突然，树和我都安静了下来，我倒在地上，深舒了一口气，但感到如此疲乏，以致以为自己死了。这时我感觉到了那帮小子走上大路的脚步声，我姐姐走在他们后面。她象小孩一般哭哭啼啼，忽然对他们使劲痛骂。却罗骑上他的自行车在前面走了，其他人低垂着头跟在他后面，再没有火车站上的那种快乐劲头了。我依然躺在地上，待他们走远了，才起来跟在姐姐后面回家。

天气很热，老头子就睡在屋檐下，我的床就在他旁边。我靠近窗前，听见有人说话：

“看他们把我的衣服弄成这个样子！”姐姐失声尖气地说。“但愿全村的

人这会儿都死光死净！”

我抬起头向窗户里张望。姐姐正背朝着我，穿着内衣在察看她的被撕破的新衣服。

煤油灯照亮着她沾满蒺藜草的头发和满是尘土和干树叶的屁股。

突然她转过身来，凶狠地看着我吼道。

“你在那儿干什么？”

我很平静地答道：

“我没什么。你呢？”

她疯了似的两眼直盯着我。她可真丑啊！还是她转过了脸去。

“我饶不了他们，”姐姐威胁着说。

我在屋檐下我父亲的旁边躺了下来；父亲装作已经睡着了。

突然，我姐姐好象又来了劲儿，走到窗口对我们喊道：

“我们永远离开这个鬼村子！”

事情就是这样。两天当中，我们把锅碗瓢盆装进包里，把床折叠起来。老头子每当弗洛林达跟他说话时总是装着睡觉。

要把只有一条腿、眼睛总爱流泪的父亲一个人扔下，我觉得于心不忍。要离开车站和村子，再也不到从土库曼开来的火车上去向困乏而爱开玩笑的旅客兜卖奶酪，我也舍不得。但另一方面，在我心里，那种想要见识见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好奇心也的确越来越强，甚至有点难以忍耐了，就象从前我很想回头看看姐姐和却罗在我背后干什么一样。

然而老头子却什么也不想知道。他甚至不上火车站去送我们，躺在床上装着睡觉。

我对他说：

“我现在跟弗洛林达和妈妈走了，明天奥滕西娜和庞却来我们家。我告诉他们你一个人在家，他们答应我每天陪你上火车站去。这样他们就能帮助你，因为你总得活下去呀！我就是这么对他们说的，他们答应我每天来。”

于是他不再装睡觉了，对我说我是好孩子。我们正要互相拥抱的当儿，我姐姐对我喊了起来，说时间不早了，我们要把包裹运到火车站去。到了站上，看见大家都在等我们：从却罗和胖子罗盖到卖包子的老婆子们。离开这个大家都如此喜爱我们的村子，我们觉得依依难舍。甚至我姐姐在火车开动的时候也激动了。我想起了老父亲，也许他不愿离开自己的茅草屋是有充分理由的。

火车开出了站，情况十分糟糕，车里非常拥挤，但没有一张熟悉的脸。我感到自己什么也不是，几乎也只是车厢里的一个包裹。

天亮时已经看不见山岗了，只见一片绿色的平原，长着小麦，玉米，还有许多在放牧的牛。我们的国家真大啊！想要赶快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欲望也随着炎热和疲乏而消融了。

旅行实在一点也不好玩。坐了一个漫漫长夜和整整一天的火车，科尔多巴和罗萨里奥都过去了。现在又出现了很多人和连绵不断的高楼大厦，这就是布宜诺斯艾利斯了。

但现在天又黑了。在雷铁洛车站，我的二姐和一个开汽车的小伙子在等候我们。我们又坐上汽车在城里旅行。一直到厄明达的家。

所谓家，只是这么说而已，其实只是一个木板棚子。这里没有高楼大厦，也没有那么多灯光。四周是别人家的茅草屋，象胆怯的绵羊似的相互紧

挨着。我有很多次想发问，但马上被他们叫去把车上的包裹搬下来，然后就叫我上床睡觉。

只有歪脚第托向我作了几次说明。他住在旁边一所茅屋里。起初我不知道人家为什么叫他歪脚。我曾想问问他，但却忍住了。

第托有个毛病，他的嘴巴老是在动，好象整天在嚼什么东西似的。他说话很快，而且从鼻子里也冒出声音来。我认识第托的第一天，一点也听不懂他说的话，但我们照样还是交了朋友。他想知道我们是从哪里来，干什么的。这些首都的人总爱问长问短，目的是好取笑人家，而我什么也没有告诉他。过了几天，他问我想不想到市中心看看，我说想去，可我没钱。于是他就给了我五十比索，说：

“拿去用吧，以后还我。”

我们乘上 150 路公共汽车，在国会大厦下车，沿着里瓦达维亚大街走去。突然第托象抽筋似的两腿弯曲，身子一歪倒向一边，并且伸出手来。在这个熙来攘往的地方，倒还有人给他投下几枚钱币。

起初，我看见这个场面非常吃惊，但我想起人家叫他歪脚，便又忍俊不禁。这里的人真少见，他们既不惊奇又不发笑，若无其事地看看我们，有时候带点儿怜悯，仅此而且。

“你也把手伸出来，”第托低声对我说。我不愿意，但他比我大，朝我瞪了一眼，说：

“你别装蒜了，讨钱吧，别不好意思！”

我把我的脸相尽可能地装得象个乞丐，并且伸出了手。大家走过去看都不看我，但突然有人给我扔下了一个、两个、三个钱币。他们几乎把我撞倒，好象根本没有看见我。

但有时候他们停下脚步，回过头来施给我一点什么。于是我明白了：这些人本来并不愿意给人施舍，但想了一下又觉得施舍是件高尚的事，因为他们后来继续赶路时脸上的神色表明，他们好象仅用一个钱币就做了一件好事。这给了我鼓励，因为我也在给他们某种东西，而且这对我来说，好处比卖奶酪要多。

一会儿之后第托回到了我身旁，对我说可以了。于是我们走进一家奶品店，要了牛奶咖啡和两份奶油点心。吃完后，我们数了数钱。第托和平时一样，嘴巴不断地动着，但现在他脸上的表情表明，他在嚼一样很苦的东西。

“你看见没有？你要的钱比我多。”

他用冷漠而恶意的目光盯着我：

“当然，你比我小，而你那张脸好象刚从床上掉下来似的！”

我想把他借给我的五十个比索还给他，但他说不用啦，因为我们是朋友。然而他要我把我的钱给他一半，我说这钱是我的，只能是我的。我们没有为此争吵，因为我替他付了两杯牛奶咖啡和别的东西的钱。我们走到十一号广场，进了一家冷饮店。我们一区又一区地吃着冰淇淋，吃了六个不同的品种，直至感到肚子发胀，象鼓一样硬。当我们在广场上坐下来时，天已经黑了。虽然吃冰淇淋的钱也是我付的，第托还是有点不大高兴。他指给我着巨大的广场和四周如同高大的灯山一般的城市。他说：

“你姐姐常常到这儿来。”

“是弗洛林达？”我问道。

“也许她也来，但我经常看见的是厄明达。难道你不知道她每天都出来

逛马路？”

我知道他说的是什麼，但我装着不明白。第托还不甘休，跟我唠唠叨叨地讲起来。

当然，他这样做是故意要羞辱我。他跟我讲，我姐姐在里瓦达维亚大街上从国会大厦走到十一号广场，又穿过布埃雷东大街走到萨明托大街。我想问他别的事情，可是大街上的情况给了我启示：最好是不作声，装出一副天真可爱的样子。

那天晚上，我母亲担惊受怕地等候着我。

“你上哪儿去啦？”

我什麼也没说，让老太婆自己唠叨。她一点也不高兴。她不得不照料厄明达的两个既邋遢又好哭的孩子，洗、熨大家的衣服，整个白天和大半个晚上还要照看着家，因为我姐姐总是很晚才回来。

“但是我们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是吗，孩子？”

我学老头子的样，装着睡觉，什麼也不回答。

过了几天，厄明达说那个开汽车的家伙能给我安排工作，当然，挣钱不多。我说我不去。她们问我为什么不去，我没吱声，只是四处张望。厄明达威胁我说：

“你想晃荡一辈子是不是？在这儿我们大家都得挑起担子！”

那天下午，我和往常一样同第托偷偷地跑了出来，到国会大街上乞讨。我们穿过卡雅欧大街，来到圣塔菲大街，又往前走到雷铁洛大街。然后，我们乘 150 路公共汽车回家，虽然很累，但口袋里装满了钱。

第二天傍晚，意外的事发生了。厄明达来到荒地上找我，看见我正在看踢足球。她几乎是把我拖到家里，一家人都在等着我。厄明达先抽了我两个耳光，打得我鼻涕都流了出来。我咬紧牙，竭力不象墙角里我姐姐的两个孩子那样哭出来。

“丢脸！”她尖声叫着。“卡却都说了！他看见你和第托一道在大街上讨钱，他开着车跟了你们几条街。”

我一声不吭，这使他们感到失望。

“你这些天一共讨了多少钱？”弗洛林达问道，她抓住我一只耳朵拧起来。

“你把钱藏在哪里？”厄明达抓住我的胳膊摇晃着，好象要把它拉脱臼似的。

母亲央求我：

“孩子，你为什么把钱交出来呢？”

姐姐打我，我没说话；母亲求我，更不伤我皮肉。厄明达又抽了我两记耳光，并且走开几步，想把我的脸看得更清楚些。她说：

“我知道了，你被第托带坏了。你怎么这样不害臊？哼，第托他跑不了！我现在就找他去！”

这时我开口了：

“我什麼也没有给第托。我一个人把钱都花了，我买了冰淇淋、点心、汽水和别的很多东西。”

“你把钱都花光了？”她们唉声叹气，好象换了打的是她们而不是我。我又闭住嘴不吱声了，任凭她们骂个够，打个够。最后，她们走开了，让我和母亲单独在一起，好象要让她的啼哭来打动我的心，使我开口说话。但我

使出了从老头子那儿学来的办法：我装着睡觉，张着嘴，一副傻小子的样子，这正是我在讨钱时所用的表情。

这当儿，我想时候已经到了，今天的事第托并不知道，别人也不知道。我几乎不能想象今后会出什么事，一切都象是在茫茫黑夜中摸索前进一样。

必须趁现在姐姐不在家，母亲困不可支的时候行动起来。我等母亲同厄明达的两个小孩在大床上睡着了，就爬了起来。我已经习惯于黑夜中在屋里稳稳当当地行走，就象猫或小偷那样。在黑暗中，我无论是闭着或睁着眼睛都能走到屋角的空鸡窝边，掀起一块、两块、三块砖头，下面就藏着我的上百个比索，装在一个小尼龙口袋里。

我一点也没有拿姐姐的东西，以此向她们表明我的高尚和对她们的蔑视。我只带走我身上穿的衣服和这一笔地地道道属于我的钱。幸好我认识路，知道该怎么办：乘 150 路公共汽车到雷铁洛大街，然后沿着卡雅欧大街往前走。在这里，我向布宜诺斯艾利斯告别，既不难过也不高兴。我再也不回来了，这里是别人的世界。我要回到我的原处去，我在车站候车室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乘火车回乡下去。

这一切都过得很快，但我回到乡下还是太晚了。甚至我都没有必要回到我的茅屋去，我一下火车就遇见庞却和奥滕西娅，她张开那掉光了牙齿、象个洞穴的嘴巴说：

“你没听说吗？你那可怜的老头子正在岔道上卖奶酪，突然过来一辆快车，由于他只有一条腿，自然不能跳出多远，连人带筐全都给碾碎了。难道你们不知道？”

“不知道，”我回答。“我还想出其不意地回来照顾他呢！”

“那倒是再好不过了，”庞却说。“他早就盼着你回来了，你们竟把他一个人撂下了。”

我也象父亲一样眼睛里流出了泪水。

赛丽娜的眼睛

在炎热的白昼，赛丽娜的眼睛象两股清泉。我从不离开她身边，她好象是在被太阳灼灼的棉田里所找到的柳树荫。可是我母亲的看法和我相反：“她这个不要脸的找你来了。”这是我母亲说的话。我和往常一样，从不敢违拗母亲，可是我清楚记得，是我要留在赛丽娜身边，每时每刻看着她的。从那一天起我帮她一起收割，可是我母亲也看不惯这个。她只习惯于她在家教我们的那一套，也就是说，狠命地不断地干活，什么别的事都不想。我们挣来的钱都归母亲，我们一个子儿也不留。家里和我们的一切开销都由老太婆一个人经手。

我的弟兄比我结婚得早，因为他是老大，也因为罗贝培象骡子一样能干而不说话。

她从不参予家里的事，一切照旧，不久我们谁也不记得家里还有一个外乡人了。然而赛丽娜的情况不同，她体态娇嫩，不适合干活。所以我母亲叫她干地里最重的活，看看她能不能一次学会。

更糟糕的是赛丽娜竟想因为我们已经结婚了。可以另起一间屋，把我的钱留下不交给母亲。我告诉她，无论如何我不能对母亲干这样的事。不幸的是赛丽娜的这个念头被老太婆知道了，认为她是疯了，永远不能原谅她。我也觉得害臊，因为我的女人想的和我们大家不一样。……看见我母亲生气，我觉得心痛。母亲责备我干活不象以前那样勤快了。这倒是真的，因为我的确有不少时间在赛丽娜身边度过。可怜的她一天一天消瘦了，可是眼睛却越来越大。这正是我所喜欢的，我喜欢她的大眼睛，从来看不厌。

又一年过去了，情况越来越糟。罗贝塔在地里干活真象一头驴，又生了第二个儿子。

母亲很高兴，因为罗贝塔和她一样，生了男孩将来可以干活。可是我和赛丽娜却没有儿子，连女孩也没有，我倒不一定要孩子，可是我母亲责备我们。我从来不敢违拗她，特别是她在生气的时候。这一次，她把我们兄弟俩叫到一起，对我们说，赛丽娜不用在家里干活了，家务活由她自己来担当。然后她又跟我哥哥说话，这使我很难过，因为不象过去那样我们大家一起商量着办事了，现在只是我母亲和我哥哥两个人商量了。傍晚，我看见他们俩带着一个瓦罐和一块麻布套上马车出去。我以为他们上山去找草药来给赛丽娜治病。我什么也不敢问，看见母亲生气我就害怕。

第二天，母亲告诉我们，星期天我们到河边去散散心。她从来不喜欢星期天或别的日子外出散心的，因为无论家里或地里总有干不完的活。但更使我奇怪的是她叫赛丽娜跟我们一起去，而叫罗贝塔留下看家，照料孩子。

这个星期天我想起了幼年的时光。我母亲看上去很快活，也更年轻了。她准备了带到野外去吃的午饭，套上了马车，接着，把我们带到了河湾。

已是晌午时分，天气十分闷热。母亲吩咐赛丽娜把酒坛拿到河边去埋在湿沙里，同时又把麻布包着的瓦罐给她，对她说：

“这个你到河里打开，把西红柿洗干净了好做凉拌菜。”

就剩下我们三个人了，和往常一样，我们不知说什么好。突然，我听见赛丽娜一声叫喊，毛发直竖。接着她又叫我的名字，声音拖得老长，象是遇险的动物。我想跑到她那儿去，但又想起她中邪了，觉得非常害怕。同时，母亲又叫我呆着别动。

赛丽娜摇摇晃晃地走来了，好象她独自将带到河边去汨凉的酒全喝光了似的。她那两只眼睛一个劲地盯着我，随即倒在地上。我母亲弯下身去，仔细察看赛丽娜的全身，指着她的手臂说：

“在肘弯下边。”

“蛇就咬在那里。”我哥哥说。

他们会意地看着。赛丽娜睁开眼睛，又朝我望着。

“一条蛇，”她吃力地说道。“瓦罐里有一条蛇。”

我看了看母亲，只见她把一只手指按在额上，表示赛丽娜是疯了。她看来的确神志不清，声音发颤，话也说不齐全，好象一个醉鬼。

我想扎紧她的上臂，不让毒素流到全身，但我母亲说已经来不及了，而我又不敢违拗她。于是我说我们应该用车把她带到镇上去。我母亲没有吱声，只是咬紧嘴唇，我明白她在生气。赛丽娜又睁开眼睛寻找我的目光，她想坐起来。我们大家都想到，毒性还不十分厉害。这时我母亲一把抓住我的胳膊。

“这只有一个办法，”她对我说。“我们叫她跑。”

我哥哥帮我把她扶起来。我们对她说，她应该跑，才能好起来。事实是，很难有人用这种办法治愈的，因为跑的时候毒性作用得更快。但我不敢和母亲顶嘴，而赛丽娜看来也不大懂事。她只有两只眼睛--那是怎样的眼睛呵！--来看着我，点头表示赞同，因为她已经不能说话了。

于是我们登上马车，上路回家。赛丽娜几乎迈不动腿，不知是由于毒素的作用还是因为怕死。她的眼睛越睁越大，一直紧盯着我，好象世界上除了我之外，什么别的也没有了。我坐在马车上，张开两臂扶着她，好象教小孩子学走路似的，而她也张开两臂扶着我，象醉鬼似的摇摇晃晃。突然，毒素走到了她的肝脏，她象一只小鸟似地倒在地上。

我们在家里替她守夜，第二天把她抬到野外埋了。我母亲到镇上去报告发生了的事情。日子照常过去。但一天下午，来了一位警官，带着两名士兵，把我们带到镇上，接着把我们投进了监狱。

据说是罗贝塔在镇上把瓦罐里藏着蛇的事说了出去。而我们还一直以为她象骡子一样不说话的呢！她总是装着象死蚊子似的，而最后房子、马车和其他东西都归了她。

我和我哥哥真正感到伤心的是我们和老太婆永别了。她被投入女牢，终身监禁。但是说实话，我也并不觉得怎么坏，因为在监狱里比在地里活得少而饭吃得好。我只是希望某个晚上我能忘却赛丽娜的眼睛，当她跟在马车后面跑的时候的那两只眼睛。

家里来了个男人

我父亲在一次斗殴中被打死了，从那时起人家就叫我母亲是赶车人的寡妇。此后就没有人赶大车往锯木厂送木头了。我的弟弟还太小，学不了这一行。此外，卡车已经承担了一切。没有人对我母亲有兴趣。大车遭受日晒雨淋，烂掉了；拉车的牛也老死了。

母亲料理着小农场和几条奶牛，把牛奶拿到镇上去卖。

对于我父亲，我什么也不记得了。但我的继父第一次到家里来，却好象是昨天的事。

“这位是埃希迪奥。”妈妈告诉我们。

这个人个子挺高，进门时不得不低下头来，但进门以后也不再抬起头，好象在我们当中觉得害羞似的。他的眼睛明亮，脸色泛红。我们认识他，他在锯木厂工作，镇上没有人喜欢他，只有我母亲疯狂地追着他。所以傍晚她就给我们安排活去干。我到农场里去拔草，弟弟上山去找牛，我妹妹做饭。于是我母亲便梳妆打扮起来，到镇上去会埃希迪奥。

现在她对他微笑着，如此温情脉脉，好象这个大孩子是她刚刚生下来似的。

“你坐下。”她对他说。

这个家伙靠桌子坐下。妈妈忙着给他送来一只杯子和一瓶酒。现在她行动起来非常灵活，好象岁数不大，身体也不胖。她什么时候都在吃，跟我妹妹一样。而我却总是嘴刁，从我小时候起他们总得想办法做成各种小花样

哄我吃，所以他们叫我瘦骨头。有一回我在小河里看见一条鼓胀着的死鱼，上面叮满了苍蝇。打那以后，我最讨厌的就是鱼。

我母亲的眼睛里闪耀着光芒，充满幻想，但那个人却一直低着头。

“你把昨天跟我说的话告诉孩子们。”

埃希迪奥的两只水汪汪的眼睛把屋子扫视了一遍，又把我们一个一个地看了遍，但仍不作声。于是我母亲替他说：

“他想同我结婚，所以到这儿来了。我们准备结婚。”

埃希迪奥又倒了一杯酒，他喝下去时我们都感到咕嘟咕嘟的声音，因为谁也没有说话。

星期天上午他们结婚了。我们姐弟三人哭丧着脸呆在家里，想到镇上该是多么热闹，但其实镇上什么事也没有，他们去过教堂就回家来了。埃希迪奥把他的衣箱和一个包带了来。他兴致勃勃地把包打开，原来里面是两条鱼，眼睛还闪闪发亮呢！

“我不喜欢。”我对他说。

“你怎么啦？”妈妈责问我。

“我见了就恶心。”

“为什么？”我继父发火了。“鱼挺新鲜，最冰冻的，你摸摸看。”

一想到要我去摸那个鱼，我就想溜。

“埃希迪奥非常喜欢吃鱼，”妈妈笑着说。“我说，这是外国佬的喜好。”

说完她就到外面去铺桌子。埃希迪奥笑着对我妹妹说：

“你也对它恶心吗？”

我妹妹歪着嘴，顶撞地说：

“我？我对什么都不恶心，也不害怕。”

“好，你摸摸着。”埃希迪奥挑逗她。

我妹妹把手伸进鱼肚里，然后闻了闻手，又把手指伸进自己嘴里。

“我喜欢这样的女人。”埃希迪奥说。似乎是作为对她的奖励，他在她屁股上拍了一下。

继父不再上镇水厂干活了，慢慢地连小农场也弃之不顾了。每天他都到镇上去，在小酒馆里聊天、抽烟。有一天，他身上没有钱，但还是照样到镇上去。他牵了一条牛去，把牛卖了，继续请他在锯木厂的朋友们吃喝。那天晚上他带了一条鱼回家来。我碰都不想碰，所以由妈妈替他烧鱼。

有一次我同妈妈一起跟踪这只狐狸，在鸡窝背后我们看见继父压在我妹妹身上。妈妈站在那里羞得用手捂着脸，我这样想。后来她拉着妹妹到镇上，把她放在药剂师家当佣人。

于是埃希迪奥恼火极了，他用皮条和我父亲大车上的一段链子做了一根奇特的鞭子。

他威胁我们说，谁要不听他的话，就打断我们的骨头。

我继父吩咐我去把玉米地后面的田地收拾一下。这个人不安好心，我在玉米籽中间偷偷监视着他。当他过来找我不干好事时，我就躲了起来，直到他走过去。于是他就找我的岔，动辄用鞭子威胁我。

有一天他对我说：

“人家叫你瘦骨头，这是你自己的过错。”

他用手摸我，我呆着不敢动，非常害怕妈妈看见我们。

“你应该多吃点东西，让人有东西可摸。”

他想强迫我吃鱼，并举起鞭子。我逃了出去，直到晚上才回来。

第二天，他慢慢地跟在我后面，在我屁股上抽了一鞭子。我痛得全身发麻，想逃也逃不了。他使劲摸我，我感到非常害怕，吓得魂飞天外。正在这时，妈妈来了，那家伙便哈哈大笑，挥着鞭子走开，并在狗身上抽了一鞭，狗尖叫着跑开了。

我对妈妈说：

“我再也受不了啦，我上土耳其人那里去吧。”

“对，”她回答说。“这是我们能想的最好的办法。宁可让别人占有你，也不要让我自己的丈夫来。”

我妈妈立刻拉着我的手把我带到镇上。她走在前面，每当我的脚步放慢时她就摇晃我的手，好象是我的过错。一路上她一句话也不说，直到我们走到“白与黑”商店。

“您终于把她带来了。”土耳其人说道。

他的女人拖着两条肥胖的腿走了出来，腿上暴起一道道青筋。

“这女孩你喜欢吗？”土耳其人问她。

那女人仔细地端详我，似乎剥光我的衣服和皮肉，直看到我的心灵深处。这个土耳其女人是个嫉妒狂。我们知道，她只任用老的或丑的女佣人，所以她曾拒绝了妹妹。

她的话我听来一点也不高兴：

“这孩子看样子不错。让她留下吧。”

于是那土耳其人一本正经地对我妈妈说：

“上一次我已经跟您说了价钱，不能再多了。”

“好吧。”我母亲表示同意。“我把她交给您了。明天我拿衣服来。”

“以前您不愿意您的女儿在外面干活。”土耳其人说。“您记得吗？您说您需要她们在农场干活。”

“对，”妈妈说。“可现在情况不同了。”

那个土耳其女人似乎对我的到来感到高兴，这倒使我担心。那么我真的是又瘦又丑的啦？

“啊！”老板娘叹气道。“看来现在她们有人干重活了。家里有个男人就好啊！”

妈妈说是这样，斜着嘴角微微一笑，她是对着地上笑的。我想，她一定感到非常害臊。

老板娘叫我干的活并不多，但她却叫我监视她的丈夫。最大的危险是在下午，当姑娘们来买东西的时候。

“这些贱货为了一尺布什么都做得出来，而这个白痴为了摸一摸随便哪个女人，也能把半片店都给出去。”老板娘对我说。“你给我一直看着他，特别是当他走到角落里去的时候。”

有几天平安无事地过去了，直到一个星期天我弟弟来找我：

“妈妈说要是您允许，她让我姐姐回家吃饭去。”

“就去吧。”老板娘同意了。事实上没有什么需要看的了：店铺关了门，土耳其人在睡觉。

到了街上，我问弟弟是否真的是妈妈叫我。他告诉我这是埃希迪奥的主意。他先叫弟弟去找我妹妹，可是药剂师不让她离开。于是继父便叫他来找我。

“他怎么啦？”

“还是老样子。”弟弟回答说。他低头看着地上，好象担心踩着什么。他也感到害臊，我想。

“他也打你吗？”我问他。

他停下来把右腿给我看，上面有一道鞭痕，象一条红色的蛇。

我们一路上不再说话，好象我们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

一股热气在我母亲身边向上升起，散发出烧鱼的气味。继父已经坐在桌旁。他很快吞下嘴里的东西，对我说：

“你回来啦？让我们为瘦子干一杯。”

他对妈妈喊道：

“喂，老太婆！给瘦骨头来一盘！”

我根本不走桌边去。

“不，”我说。“我不想吃鱼。”

“我叫你吃！”那家伙又冒火了。他叫我弟弟：“快把鞭子给我拿来。”

我弟弟眼睛睁得老大看着我。他慢慢地朝墙角走去，好象不愿意去拿。

“我也要抽你！”那家伙对他喊道。我弟弟拿了鞭子慢慢地走回来，好象是要再拖延些时间。

继父非常激动地往嘴里塞了一口鱼，一会儿又塞了一口。东西差不多噎在喉咙口，地嚷道：

“谁先来？要么你吃，要么我把你打死！”

我想逃跑，但两条腿竟动弹不得，好象他已经鞭打了我。我象是瘫痪了似的，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看着继父怎样伸过手去抓鞭子。突然我看见他的眼睛里显出极大的恐惧，好象有一个更厉害的人抽了他一鞭似的。

他的头倒在桌上。现在他的脸色既不苍白也不红，而是同我们一样的黝黑，并且越来越黑，跟他嘴里流出的酒一样的颜色。他象鸡脖子被扭曲时那样挣扎着跳了起来，随即躺在地上不动了。

我简直不能相信，家里又没有男人了，然而家里也又有了安宁了。我想大声呼喊，感谢上帝创造的这个鱼刺的奇迹，但我害怕继父并没有真正死去。我象个木桩那样仁立在那里，用怀疑的目光望着那个家伙和鞭子。我母亲却跪了下来，象刚分娩的猫那样呻吟，为他的男人哭泣，但是慢慢地在哭；她很觉得害臊，我想。

先生，我是罗莎·罗纳拉

星期六我早早地吃完午饭便带着小鲁本上市中心去。这个小家伙我总是让他梳洗整齐，打扮得象王子一样。他有一双同他父亲一样的蓝眼睛。很多人大概会以为我是女仆，带着主人家的孩子上街来了。实际情况也和这差不多，因为我的孩子是莱特利尔的后代。

我逢人便这么说，他们就应该相信我，因为小家伙的卷发和迷人的微笑确是莱特利尔一家人的特征。

我们在毕尔巴欧大街上了汽车，在阿拉美达大街下了车，拐进桑迭哥

大街。我在冷饮店里喝了一杯啤酒，并给孩子买了一块蛋糕，便继续往前走，一直走到阿尔玛格罗广场。这是我在圣地亚哥第一次到过的广场，一有机会我就要上这里来。从南方来的公共汽车都停在这里。我永远忘不了当初我手提藤篮、怀抱小鲁本在这里下车的情景。我这样怀抱手提，走路很吃力，手中还捏着一张写有杜兰家地址的小纸条。他们收留了我，但给我的工钱却比他们原先答应我的数目要少，因为我的孩子也在他们家吃饭。这一家人已经不像我在他们避暑期间认识他们的时候那样和气而快活了。我发现那家先生忧心忡忡，他们的女孩烦躁不安，而太太则举止怪癖。他们对小鲁本一点也不显得亲热。而当他们和我讲定要把我带到圣地亚哥来的时候，他们对他多么好呀！可现在他们看着他讨厌，也许他们以为我会把他留在乡下的。他们怎么想呢？我不需要他们优待我的孩子，大家都知道，一个莱特利尔家的人胜过一个杜兰家的人。此外，只要我能留在首都，让我的孩子受到应有的教育，我什么待遇都接受。当女主人登记我孩子的名字时，见我是单身而他却用罗约拉这个姓，她笑了。我可一点也没有笑。那天晚上，我严肃而镇静地告诉女主人，我孩子的名字叫鲁本·莱特利尔·罗约拉，并说如果她不喜欢这个名字，我就到另一个人家去。孩子就这样登记入册了。他是莱特利尔，在我的身份证上，他是我的亲生儿子和我这个家庭女佣人的财产的继承人。我对这个由政府当局用打字机打下来的名字百看不厌。我丢下扎斯提杜西翁的旅馆里的工作，放弃那么多小费而到首都来，当然没有做错。我只是觉得离家乡的土地更远了，与上帝的缘分更少了。所以我领得工资的第一天就去给小鲁本买了衣服，并且又到阿尔玛格罗广场去看了看从南方开来和开往南方去的公共汽车。上帝保佑，我并不是要到那儿去遇见什么熟人，我只是想去看看那儿的车水马龙。我特别喜欢看那些提着鸡笼鸭筐来的人，这种情景对我十分亲切。没有比罗莎·罗约拉饲养的鸡鸭更肥嫩的了，在孔斯提杜西翁的旅馆和公寓里大家都这么说。除了家禽以外，我还养了一口猪。这一切都是我的，因为我父亲已经老了，干不了活；我的二弟马赛洛在北方谋生；我的弟弟小彼得罗几乎只会喝酒和弹吉他。这样就只有我一个人种地，我还没法饲养了家禽和猪。父亲虽然摘前咕咕，但他病魔缠身，只得由我做去。就是在那时，我认识了鲁本·莱特利尔，一个庄园主的儿子，其实他所有的财产也不过是铁路沿线的几个牧马场而已。

因为鲁本不好好念书，他家里就把他送到乡下来作为惩罚。可是他却并不因为这么远离圣地亚哥而难受，反倒过得挺快活，整天穿着农夫服装骑在马上游来晃去。他和小彼得罗交上了好朋友，喝酒和吉他把他们两个人连结在一起。有一天风和日丽，我弟弟把他带到家里来。仅一会儿功夫，我便真想搂抱他那紧束农夫腰带的身躯，并狂吻他那迷人的微笑。小彼得罗告诉他，我很会干活，我有许多东西，但收藏严密，因为我很吝啬。当然，这两个人身无分文，他们的钱刚才都在游乐场里花完了。他们到我家来就是想喝我剩下的那一点地酒。那个酒酿成之后，我几乎没有喝过几回，因为我喝了酒便烧得透不过气来，而我那可怜的老父亲则是如此虚弱，连好好喝一口酒的气力也没有。

第二天鲁本又到我家来了，当然他不为别的，就是来看我的，因为酒已经喝光了，小彼得罗也不在家里，正是鲁本这个鬼东西约他这个时候到镇上去和他会面，这是他自己告诉我的。于是我明白了他的愿望和我一样强烈。我不同意骑他的马，我有自己的马，干吗要骑他的呢？我们乘马疾驰，奔向

海边，在一个洞穴里找了个隐蔽的地方，这个洞穴离那块奇形怪状的、象是通到天上去的岩石不远，人们称它是“教堂”。我们约定每天下午在这里相会。从那以后，原来每天都是一样的时光，现在开始跑得象火车一样快了，或者停下来一步不走。有时我感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恐惧，一种晚上猫头鹰盯着我看、十字路口的鬼魂对着我哭我也没有感到过的恐惧。这种恐惧就是怕鲁本对我厌倦，哪天下午不来看我，并且以后再也不来。这时，时光便停止不前了，我再也不能期望他到松软得象最舒适的床铺那样的沙滩上来了。我双膝跪地，象一个忏悔者似地爬到潮湿而坚实的沙滩上，浪花扑到我身上，冻僵了我的肌肉和理智。我想我应该同鲁本一起私奔，这样才能永远把他留住在我身边，而且这要在他返回圣地亚哥、把我遗忘之前赶快行动。在一个时光飞逝的下午--因为鲁本在我身边，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他。我对他说我害怕，因为小彼得罗在监视着我，他天天都喝得醉醺醺，用凶狠的目光看着我，象是受骗的丈夫似的。鲁本听了微微一笑，好象只有他知道怎么办，并对我说“好罢”。我催他把日子定下来。他又微微一笑，并叫我把钱带来，因为他一个子儿也没有，无法支付两个人的旅费。只要到了圣地亚哥，一切都会变得好起来：他的父母会原谅他，并一定会象以前一样慷慨解囊。我由于我明白的理由，要求他快些行动，我相信他也明白，因为他亲了我的嘴，对我说：

“既然你愿意这样，我们立刻就走。你把你所有的东西收拾好，明天晚上我们在大路上相见。”

这样，我们便在镇口碰头。鲁本不再是乡下人打扮，而是穿着城里人的便装，提着一只精致的提箱。我看见他打扮得如此漂亮，便觉得他不会在大车上把我带在他身边。

我真后悔；还是在海边沙滩上的好。可是鲁本不让我有时间再想什么。“你的东西带来了么？”他问道。我说：“带来了。”我们象两个小偷寻找暗处那样进了小镇。我们走进火车站对面的智利公寓。老板龚沙洛先生看见我来感到惊奇，因为那天下午我曾来过，并把我的鸡卖给了他。他让我们住进二层一个窗户临街的最好的房间，床上铺着花布床单。但这跟在海边沙滩上不一样，鲁本好象烦闷不安，有什么心事。他不停地抽烟，有时吹口哨，话也不跟我说，不时地朝窗外看，似乎只有他一个人在房间里。我困得倒在床上，因为那天上午我把猪赶到屠宰场，下午我又把我的鸡鸭都送去卖给孔斯蒂杜西翁的公寓和旅馆。卖得的全部钞票我都卷在手帕里。我也有点无精打采，因为我困得直打呵欠。突然，我听见马蹄声在窗下停住了，骑马的人没有下马便嚷了起来：

“坏蛋，快滚出来！我要叫你这忘恩负义的人尝尝我的厉害！”

我听出那是小彼得罗的声音，便朝窗外探望。龚沙洛先生在劝说他，指点他到别处去找我们。老板不愿意吵架，更不愿意有人把一个莱特利尔家的人弄死在他的公寓里。

他终于使小彼得罗相信我们不在这里。于是小彼得罗不再用粗野难听的话骂鲁本而呼唤起我的名字来。罗莎！罗莎快出来！他用沙哑的声音喊着，使我又喜又怕得发抖。当他的呼唤声渐渐远去，直到消失在黑夜的狗叫声和火车的卡达卡达声中时，我感到心中一阵强烈的震动。小彼得罗自出生以来，我一直非常喜欢他，一看不见他，我就丢下地里的活，丢下老父亲去找他。可是鲁本一把把我推离窗口，他生气了，我想是由于挨了小彼得罗的骂，因

为罗约拉家的人肯定比莱特利尔家的人要更厉害。

“我的好姑娘，你快躺下吧。”他吩咐我说。而我一钻进被窝，就昏沉沉地睡去了。

我醒来时天已大亮，房里只有我一个人，连鲁本的箱子也不见了。我到厨房去找龚沙洛先生，他告诉我说，鲁本一清早就走了，连招呼也没有跟他打一个，也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回信。

“姑娘，这个花花公子把你玩够了！”龚沙洛先生挖苦地说。他以为他什么都知道，其实不然。我没有告诉他我肚子里已经怀着一个鲁本了，也没有告诉他鲁本把我包着钞票的手帕抢走了。我只对他说，我要是回家，小彼得罗会把我打死的，因此我求他让我在公寓里干活。第一个星期干活是为了偿付我和鲁本度过的那个晚上的开销。后来我就开始为了临产而积蓄一点钱。当然，我还是没有回家。在我家里也好，在镇上也好，大家一定都会把小鲁本看作是个可怜的孤儿，尽管实际上，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莱特利尔家的人，长着一对明亮的眼睛，脸上露着迷人的微笑。后来我父亲死了，他走得那么无声无息，下葬以后我几乎还不知道。我还听说，家里的地已象一片荒废的牧场，因为我不在家里种地了。小彼得罗整天只知喝酒，把家里所剩的一点东西都变卖光了，房子也倒塌了，终于有一天，他背起吉他。一句话也没有对我说，便上圣地亚哥去了。

我现在搀着小鲁本在阿尔玛格罗广场上走来走去。我喜欢看从南方开来的公共汽车，但不只是这一点。主要的是我在观看广场中央唱福音的教士们。有时候我很难继续讲下去，因为担心会忍不住而泄露了全部真情。比如那一次，我要求龚沙洛先生让我在他的公寓里干活，我真想哭，并告诉他鲁本偷走了我的钱，我身上又怀了孕，但是为了我的自尊和今后好做人，我什么也没有对他说。我每逢空闲的日子都要到阿尔玛格罗广场来，现在又来了，这不只是为了看开来的汽车和坐车来的人，也不是为了让小鲁本和别的小孩在一起玩，弄得满身泥污，真正的原因是现在在广场上唱福音的教士们的那种音乐打动了我的心。他们一共是十名男女，带着大鼓、小鼓、小号和三个吉他。当那演奏颂歌的鼓号声加快时，我心里感觉受到了某种冲击，好象我又在那叫作“教堂”的岩洞里，当鲁本把我的身作翻过来脸朝上的时候，我所感到的阵风一样。太阳普照我家乡的土地、大海和阿尔玛格罗广场。只是有一件事更为强烈，那就是鲁本·莱特利尔的黑驹在我体内奔驰得越来越剧烈。现在广场上都能听到乐队的演奏声，我又感到这种奔驰，但这回却是小彼得罗的吉他。我十分不好意思让他看见我，便躲在汽车后面或者粗壮的棕榈树后面，看着我的弟弟。他在弹奏用象征祖国的红、蓝色带装饰起来的吉他时是多么帅啊！

有时候他好象感觉到我在看着他，好象我的目光要把他吞噬似的，因为他的眼睛老是看着地面，对我的爱他感到既高兴又害羞。他唱得既动听又伤感，好象他也在思念家乡的太阳和海边的和风。他唱道：

我快乐而幸福

因为上帝拯救了我。

歌声方止，一位老太太走上前去，张开双臂宣称，在这样一个熙来攘往的广场上感到幸福。突然，她喊了起来：

“我不为当了罪人而感到羞耻！无须感到羞耻，只要走出黑暗、寻找光明就是了！”

既然我在听着，她干吗那么大喊大叫呢？大概是因为我在目不转睛地看着小彼得罗，回忆着我小时候和他一起玩耍的情景，他笑着，我把他抱在怀里，亲吻他晒黑了的小脚和苍白的小脸蛋，他笑个不停。他是我童年时代所仅有的玩偶。现在，看见他这样忧伤，眼睛不是看着地面就是望着远处，我又想狂热地亲吻他。他大概也曾思念过我吧？

“过来，到上帝的怀抱里来享乐吧！”那位上了年纪的女教士对我喊道。可是我抓着棕搁树，怎么也不愿意站到小彼得罗的面前去。我的脚边，一个醉汉睡在树荫下，他的脸色黑里透红。即使是上帝亲自来讲道，他也是不闻不问的。这倒比醒着的人要好。

“这些教士来扰乱我们的宁静了。”有一个人对他的妻子说。他们从广场的长椅上站了起来，向酒吧间走去。我为他们感到羞耻，更为我自己感到羞耻，因为我也没有想到上帝，而是想着小彼得罗。我远远地望着他，他是那样漂亮而伤心。但我十分担心我走到他面前而他认识我，或者根本不想看见我，更不想看见小鲁本，更糟糕的是我走到他面前而他翻起脸来，不再是我的弟弟小彼得罗，而变成另外一个什么人。所以我忍耐着，只在远处看着他，直至教士中的头领前来邀请我们大家跟着他一起上教堂去。他们从马塔大街一边走了。我真想跟着我弟弟到教堂去，然后跟着他上他家去，以便跪下来亲他的脚，就象我小时候曾做过的那样。但是我没有跟他走去，就象那一破，他那样地叫唤我的名字而我理也没有理他，让他一个人消失在黑夜中。我寻找小鲁本，看见他正和别的小孩一起在地上玩，弄得眼睛里都进了土。我替他拍打了衣服，用手帕擦了擦他的鞋，告诉他一个莱特利尔家的人应该永远清洁整齐。我们又搭上汽车，回到我的主人居住的上等区。

十字架

“她一定要把我一个人撇下了，”姑娘这么想，便狠劲往沙发上一坐，表示生气。

她母亲在她身旁坐下，四下观察这候诊室。“看这环境倒象是个正经的职业医生，”她想道，但又不敢完全放心。诊所所在的这一地区太肮脏了，来看病的人也很少，这使她感到惊奇。候诊室里只有一个病人在等着，一个衣衫槛褛的年轻人；他的手指颤抖着在翻阅一本旧杂志，以掩饰他的不安，并窥视刚进来的两位妇女。

母亲心神不安，她很难相信这位医生有多高的声望；他还给她提出了先决条件，要单独和她女儿谈谈。现在她怎么能把女儿撇下，让她跟这个年轻人呆在一起，而且又是在精神病医生的候诊室里呢？这年轻人一定是个疯子，也许是个性狂症患者。她想到自己的女儿，便想丢掉把精神病医生的病人看作是疯子的念头。但空气里飘浮着一股浓烈的气味，既有甜味，又有发酵味，好象有人把一块烂瓜遗忘在那里了。

门打开了，进来一位妇女，胸前束一条白围裙，一直拖到脚背。这件衣服一定不是专为这个矮个子的人做的。她除了当护士之外，还必须为医生打扫屋子，做饭，以及其他许多事情。但收入微薄，以致她还不得不到附近

中央车站一带凶险的地方去拉人。这个破鞋还自以为了不起，漫不经心地把门诊卡送到我鼻子跟前。哪怕她稍微带点微笑也可以呀！象我这个贵妇人所做的那样。我微笑着打开皮包，把钱交给她，好象门诊费并不算贵。我手里拿着门诊卡，在那个矮女人离开之前，转身对我女儿说，我要出去买点东西，马上就回来。我让她等我，轮到她时就自己进诊室去，我想她在一个陌生男人面前，不致于会象一个娇宠的女孩那样不肯进去。我这样做也是为了把我女儿交给那个护士来照管。

母亲和护士从不同的门刚一出去，年轻人便站起来，走到姑娘身边坐下。他肤色棕黑，象个吉卜赛人，两只深黑的眼睛又明又亮。

“你也是来看医生的？”

她微微点了点头。

“你会想自杀过，是不是？”

她没有回答。她本来想说，她来看医生是因为记忆力差，学习不好，但她又止住了。

“当然你会想过，”年轻人想套她的话。“难道你从来没想过自杀？我可想过。”他骄傲地微笑着。“我想过好几次，所以才到这里来了。我不是圣地亚哥人，我是特姆科人。你愿意听听吗？我甚至不必闭上眼睛就能想起我在南方，在我母亲身边。我们俩总是在一起，晚上一起在外面奔跑。我们不声不响地偷偷溜到铁路弯道处，那里是一片十字架。我们好象长着翅膀，脚上长着眼睛，跑的时候从来本碰到石头或路轨。我父亲跟在后面追我们，他却常跌倒，我们听见他在地上的挣扎。我集中全副注意力跟着气喘吁吁的母亲，她在前面引路。我们一直跑到铁路的弯道处，我立刻靠在我的一根十字架上，背朝着铁路，就象母亲教我的那样。近旁是一根大十字架。我扭过头去看我母亲怎样张开两臂贴在十字架上，听见她低声说：‘老天保佑我们脱离苦难。’我们屏住呼吸，周围是一片南方的沉闷的寂静，远处传来小河的潺潺流水声，还有愤怒的叫喊声，象是雷声的回响。听不见这些叫喊声的时候，那就糟了，周围一片死寂，连父亲走在铁路的石子上的脚步声也较得几乎听不见。因为父亲一向害怕那些在弯道处被火车压死的铁路工人的冤魂，其中有一个是工头一类的人，人家给他竖了一个很大的十字架。我母亲就靠在那个十字架，这个时候我从来不敢扭过头去看她，因为我怕父亲发现我的身影。

当我们都保持死一般的沉寂的时候，那就糟了，我听不见母亲的气喘声，父亲的脚步在十字架前面停住了，因为他一向尊敬那些十字架，他也是这样教导我的：走到十字架前面要停下来，祈求上帝超度那些被火车压死的铁路工人和醉鬼的亡魂。这是不久以前的事，大概只是两年以前，有一天晚上父亲一言不发地踉跄走在铁路的石子上，但他没有喝醉，我象一条狗似地跟在他后面。他停下时我也停下来，只有他叫我时我才走到他身边去，但他没有跟我说什么。我也不敢问他镇上的人谈论的那件事。我满十岁后不久，我父亲失去了会计的工作，因为钱柜里有一笔钱不见了。消息很快在全镇传开，好象在树上安了扩音喇叭似的。第二天我去上学时，连一个小孩也不愿跟我玩。从那一天起我就一个人独来独往，跟我父亲一样。我们总是在晚上一起出去散步，那时大家都睡了。

“我一直没有机会对他说，人家对他的议论与我无关，因为他总是走在前头，而我跟在后头。只有当我们沿铁路走时，到了弯道处他就停下来，把

十字架指给我看，叫我为那些亡魂祈祷。然后他转身回家去，我跟在他后面。他也不同镇上的人说话。母亲想要劝说他，我们应该离开那里，但我父亲顽固地一声不吭。有一天晚上我等父亲回来一同出去散步，但我白等了。那天他很晚才回来，喝得酩酊大醉。他把我从床上抱起来，扶住我的膝盖大哭。他边哭边打酒嗝儿，用手捂着眼睛说：‘我的孩子，我的好孩子，原谅我，我是个不幸的人。’母亲在一个角落里哭，一句话也不敢说。我父亲走过去抚摸着她的头，说：‘胡安娜，你也原谅我。我很我自己。’他马上又回到我身边来对我说：‘你原谅我了，是吗？’我以为我们又要晚上一起出去散步了，可是第二天我放学回家时，父亲不在家。这一天晚上他回家时比上一次喝得更醉。他硬要我母亲和我跪在他面前求他原谅。他为前一天晚上在我们面前表现出的软弱而感到恼怒。从此，他每天晚上回来总是喝得酩酊大醉。我一看见他回来，就必须跳下床来，跪倒在地，求他原谅。

有一天晚上，他对此还不满意，竟要用皮带抽我。我母亲抱住我，用她的身体保护我。

我父亲勃然大怒，威胁要打死我们。

“为了帮助我们，百货公司的老板决定给我父亲安排工作。当然不是让他当会计，而是当伙计。我们搬到郊外，住在一所木房子里。可是我父亲整天除了喝酒之外，什么事也不干，母亲每天给人家洗衣服口子一天天过去，我们的境遇变得危险起来。有一天晚上，父亲把剪刀朝我母亲投掷过去，扎伤了她的面颊，我们不得不躲到屋顶上去。后来有一天晚上，父亲发现了我们躲在上面，我们又不得不逃到荒野里去。有几个晚上我们是在火车站度过的。但是冬天晚上很冷，我们不愿离开家。此外，我们在车站上过夜的事镇上的人知道了，都用同情的眼光看我们，并向我们问这问那，这比父亲的殴打更使我们痛苦。

“有时候我真弄不懂为什么我们要继续捱这苦日子，我们可以远远地离开他跑到别处去呀。当我把这念头告诉母亲时，她咬紧嘴唇看了看我说：‘你不象个好孩子。我们应该照顾你可怜的父亲。’母亲当然爱我父亲，我也爱他。当我们因为等候父亲回来而睡不着觉时，母亲把她的想法告诉我。我父亲将会变好，那时我们都到圣地亚哥去，或者再北边一些，那里气候不寒冷，没有人认识我们。父亲又将当上会计，给我买一辆自行车。我们睡不着，睁着眼睛做梦。我父亲还是老样子，或者说更不如以前。他在家找不到我们，就去打扰邻居，敲他们的门，咒骂所有的人。有一天晚上下着雨，父亲回家来就嚷着这一次非把我们打死不可。母亲大吃一惊。我们在泥塘里跑，不是向着车站的灯光而是朝铁路的黑暗处跑去。我父亲眼在后面，边追边喊，这样我们到了有十字架的铁路弯道处。绝望的母亲跑得精疲力尽，站在第一个、最大的十字架后面，张开两臂成十字状，并且叫我也这么做。我站在第二个十字架后面。这时父亲咆哮着赶到了。我从头到脚直打颤，紧紧贴住十字架，因为我的身子不由自主地想离开十字架继续往前跑。

我发疯似地想喊，但幸好恐惧堵塞了我的喉咙。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父亲不声不响地回家去了，我们回家时发现他已经睡着。从那一天晚上起，我们常常跑到十字架那里去。

“一天下午，母亲正在桶里洗衣服，我想起晚上，就怕得发抖。这一次我再也忍不住了，嚷着要求母亲带我逃走。我看见母亲的身体收缩起来，好象老了一百岁，嘴唇紧闭得成了一条线。她停下手中的活，两手在围裙上擦

干。突然她的脸色变得铁青，象一块石头。我跪在她的脚下，抱住她的双腿，恳求道：‘妈妈，我们走吧！现在就走！求求你！’我母亲把我从地上扶起来，抚摸着我的头发，眼睛凝视着远方。她非常痛苦地向我微笑，但最后她说：‘明天一早我们就走。’我不相信，但母亲向我保证说这是真的，并动手准备旅行用的衣物。我高兴得疯了，跑去把这事告诉了车站的站长。他起初不相信我的话，我告诉他是真的，明天一大早我们就坐火车永远离开那里。

“天黑时，一个女人来告诉我们说，我父亲早就喝醉了，嚷着要打死我们。母亲伤心地微微一笑，我也是这样。这是我们的最后一个晚上了。我父亲回来得比平时要早，但和平时一样的醉酸期。我们跑到房子后面去，从那里可以窥见他，又可以及时逃跑。

他发疯似的把杯子、盘子全都打碎，一个不剩。必须赶紧逃走。当我们逃跑时他看见了我们。我们舍命地跑，可是他象着了魔似的追赶我们。这一次他不叫不减，而是象我们一样，把所有力气都集中在腿上。我们沿铁路跑，来到了弯道处。母亲象往常一样躲在第一个十字架后面，我躲在第二个十字架后面。父亲赶到了弯道的起点处。天气很冷，而他只穿了衬衣，头发被风吹得飘了起来。他活象个魔鬼，但此时此刻我却不象平时那样怕他了。我想：‘明天就结束了，我们走了。我再也不回镇上来，我再也不想见到爸爸。’我放心大胆地扭过头去，想把他看得更清楚点。只见他在铁路的另一边走着，很难会发现我们。突然我父亲穿过铁路，一直朝那根大十字架跑去，好象他知道了母亲躲在什么地方以及我们打算逃之夭夭。我紧紧靠在十字架上，脑袋僵直地向着天。此时我真想钻到地下去。但我母亲的一声叫喊使我回到了现实中来。我看见母亲的裙子和头发被风吹得飘了起来，好象有人从上面把头发提了起来似的，我父亲的两只手扼着母亲的脖子。我看见母亲死在那个十字架旁，然后我父亲双手插在裤袋里，和平常一样沿着铁路一额一破地走开了。”

突然年轻人停止了说话。

“那后来您父亲怎么样呢？”姑娘问道。“把他关起来了么？”

“天亮时有人发现他被火车压死了，就是那一趟我们打算乘了逃跑的火车。”

“您呢？”

“几个大叔把我带到圣地亚哥来了。”

“我明白了。您吃了许多苦，所以想自杀。”

“您什么也不明白，”小伙子反驳说。“我难过的是我父亲由于我的过错而掐死了母亲。我说服了她和我一起逃走，可我后来又把这事告诉了车站站长，于是便发生了后来的那些事。所以我想到我母亲那儿去。大叔怕我自杀，才送我上这儿来。我来是为了不使大叔生气，但我什么也不告诉医生。我的事就是我的事，我不喜欢别人来打扰。”

姑娘发现小伙子的眼睛象他穿旧了的蓝衣袋一样闪闪发光，饱含着热泪，象是恳求某种东西，而这个东西她已下定决心现在就永远赐给他。他们将象那些情人那样长时间地手拉着手亲吻着。她期待小伙子把手伸过来紧紧握住她的手，向她表示爱慕。但这时门开了，医生走了进来，他的表情象他的眼镜架一样死板而乏味。他送走了一位老太太，又回到候诊室。护士进来了，指着小伙子说：

“请您进来。”

姑娘拿起那本被千百只烦躁的手翻旧了的杂志，用力地一页一页翻过去，刚才她看见小伙子也是这么翻阅的。这样她证实了，时间过得快慢是由她的意志决定的。不久门又开了，医生把小伙子送出来，拍着他的肩膀说：

“好吧，朋友。下次您再到这儿来，请把您的问题告诉我。”

她抬起头，向他深情地微笑，可是小伙子径直穿过候诊室。连看都不看她一眼。他走得很轻快，好象他母亲还在拉着他的手，晚上在外面奔跑似的。

“您怎么啦，小姐？”医生对她嚷道。护士走上前来，用命令的口气对她说：

“您没听见吗？该您了！”

“啊，对！”姑娘明白过来，但她还犹疑不决，努力控制着自己想要奔去追赶小伙子的念头。

她走进诊察室，决心一点不谈自己生活中的事，而只是撒谎，直到她想象中的光辉灿烂的那一天到来，她才会吐出全部真情，并且一下子了结了自己。

金银二重唱

从马塔德罗开往帕尔马的公共汽车满载着乘客到站了，我是最后一个上车的。潘却、鲁却和贝拉奥是行驶在这一条线上的司机，他们都让我上车，即使有时他们对我板起脸孔，我也不理他们，我很快跑到车后去，然后“光腚”和“大头”上车来了，于是我使用我从北方带来的声调开始讲演。人家几乎听不懂我说些什么，因为我虽然张开嘴巴，舌头却不动。我说我父亲死在矿上了，我便流落到了南方。为了不致沦为盗贼，我操起现在正在干着的这一行。直到口水从我嘴边流出来，我才停止说话。有些人听懂一点，有些人什么也没听懂，但大家都想知道我还有什么鬼事要干，是讨钱呢还是卖些小杂货。

但什么也不是，我放声唱起来：

在梅希略内斯，我有一位情人……

我大声地唱，设想我正在一个剧院里演唱。但马上我又口吃起来，口水从嘴边流出。

于是我停止歌唱、好象有人卡住我喉咙似的，我拉拉扯扯地哼起另一支歌：

在我出生的土地上，

我生活无忧无虑，

因为我是个粗人。

我又突然停住，乘客们不安起来。有些人转过脸来看我，不知道这一套如何收场，是我继续唱完呢，还是我喊叫起来，或是由于某种病发作而在地面上打滚，这一套我是会做的。我觉得一切都演得很好，因为有些坐着的人也为了能把我看清楚而站立起来。这时我张开嘴巴，口水流到下巴，眼睛因为忘了词而睁得老大。我接着唱起另一首歌，转眼又忘了词，便又呀呀哟哟

地哼起来，又马上停住。大家都不愉快地听我唱，同情地看着我。这时“大头”表示抗议：

“真粗鲁！为什么不让我们安静？”

这时总有人叫“大头”住嘴，因为他们同情我这个可怜虫。于是“光腚”插嘴进来，他责怪有钱人和政府，是他们杀害了父亲，使孩子成为流浪儿。“大头”说他是赤色分子，于是全车乘客都争论起来。这时我停止歌唱，从车后往车前走，向善良的人们要求帮助。与此同时，“光腚”和“大头”在骂娘，在混乱中彼此挥拳相向。

最后，理智占了上风。干吗要打架呢？主要的是我们都是智利人。“大头”和“光腚”的火气稍稍消了点，很快下了车地就是说他们在第一个站牌下相互威胁并发起攻击。

这时车上的乘客都扭过脸去，看他们在街上打架。当然，不会出什么事的。我们到圣地亚哥大街的随便哪一家酒吧去喝上两口，在那里我们把要来的钱和“光腚”或我在混乱中摸来的钱包都交给“大头”，混乱是在公共汽车上当他们挥拳相向，似打非打时引起的。我们把一切都交给“大头”，再由他分配。晚上他请我们吃一顿简单的牛肉，或者一只炖鸡，要么几个包子，这要视当天的生产情况而定。因为分配总是由“大头”负责的，而大家知道，谁管分配谁就给自己多留一点。我们对他的分配方式从来没有怨言，而且我们想最好我们一辈子都不要散伙。可是有一天晚上，“大头”丢下我们，带着两个塞得满满的钱包跑得无影无踪了。据霍滕西娜讲，他到瓦尔帕来索去了；而据梅恰讲，他上布宜诺斯艾利斯去了。但是可以肯定，“大头”从来不向他的女人透露一丁点儿真情。这两个傻女人虽然住在一条街上，带着同一个父亲生的孩子，而她们彼此竟还不认识。我们一直不知道“大头”为什么要抛弃我们，而采取的手段又那样肮脏。也许是因为我们买了一面大镜子，放在我们的住屋里，这使他不高兴。房客们也都不赞成，每天晚上都威胁我们，但我们知道他们不会叫警察的，因为如果警察来了，会把大家都当成扒手和恶棍抓走的。

我们还是老样子，但由于我们感觉孤独，在街上作业少了。过去总是“大头”有办法，他给公共汽车司机送个小礼物就打通了。难怪大家叫他“大头”。他气宇不凡，打扮得象个阔佬，能随机应变，如假装要找律师去，甚至因为有人给在公共汽车上卖唱的孤儿找麻烦要给报社写信表示抗议。所以他占有收入的大部分，而我没有表示反对，“光腚”也一声不吱。我们所以叫他“光腚”，因为我们自小认识，他跟我一样是要饭的。“大头”教会我们如何作业，而他最后却又抛弃了我们。难道是因为我们买了镜子，又向他要钱，并把我们的计划告诉了他，他就不高兴了？头儿抛弃了我们，现在我们没有什么可分的了。好在我们自信最终我们会成功的。这不只是靠本事，而且是靠信心。

我们对着镜子，“光腚”拿起吉他给我伴奏。我唱起一首波来罗舞曲，声音甜得似蜜一般。当我在公共汽车上唱起这首歌时，它能打动善良的妇女们的心，她们睁大眼睛吃惊而怜悯地看着我，好象我的“病”又要发作似的。“光腚”弹着吉他，还给我伴唱。我们瞧着镜子，矫正自己的表情。这时我产生了一个念头，我们是在瞧着电视的荧光屏。

因为我们已经被准许当众演出了。我们不再是“流涎和光腚”二重唱了，大杂院里就是这么叫我们的。那家杂志的那个家伙命名我们为“金银二

重唱”，当然他要的只是银子，有五十元差不多，后来又有三十元，而我们还期待着那篇附有照片的简讯发表出来呢。

幸好我们没有花二十万元去租用杂志的封面。现在人家就要叫我们“合作电台”了。这一回是真的，就在这几天我们会收到信件或会有象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穿着制服的信使来通知我们，叫我们上电台去演唱，你们瞧着吧。他叫我们耐心点，这是肯定无疑的，因为台长喜欢唱歌，而我们唱得又不错；他是坦率地这么说的。他没有向我们索取很多的钱，只是要了八十元给台长--他的朋友--送点礼，甚至他还指着冷饮店的橱窗，想给台长买一瓶威士忌；就是这个价钱，他一元也没有多要。但我们还是给了他两元钱让他买酒喝，因为我们对在公共汽车上装白痴，担惊受怕，已经厌烦了。同时，人们口袋里装的钱也越来越少，派不上什么用场了。我们对镜子唱，直到唱得精疲力尽。突然我们感觉自己分文不值，伤心地面面相觑。会不会有一天人家要说我们是电台上的臭公子呢？而我们已经给了他们很多钱了。这个国家到处都是骗子！

清洁工人的最后一次罢工

这是十二月二十二日上午发生的事。卫生局的一辆二〇七号道奇清洁车正在阿莱纳勒斯大街上作业，车上的四名清洁工人分为两组，每组二人，分别在两边人行道上打扫。

清洁车停在大街中央，这引起卡莫索的抗议，他是一位四十五岁的工业家，正驾驶着他的万里安特轿车，牌照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市 597, 905 号。

卡莫索不断地鸣喇叭，要求清洁车给他让路。司机从驾驶室探出头来，漫不经心地朝正在生气的驾驶轿车的人望了一眼，可是他那笨重的卡车却纹丝不动。这时，清洁车正在装运阿莱纳勒斯大街 1856、1858、1845 和 1849 号大楼的垃圾桶，这几栋大楼没有焚化垃圾的设备。前面已经说过，司机把卡车停在街道中央，阻塞了交通，而且对被阻的驾轿车的人的要求置若罔闻；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考虑到某些劳动操作的规程。卡车停在街道中央，和在两边人行道上操作的清洁工人保持相等的距离。这一点是重要的，因为垃圾桶很笨重，搬运起来十分费劲。自然，清洁车的司机从来不对性急的轿车驾驶员说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只是从他高出地面四公尺的驾驶室朝他们冷漠地看一眼。这虽然是一件平常的事情，但这一次却恼着了卡莫索。他一面按喇叭，一面骂街，并且不顾一切地开动了汽车。

年终时，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气温增高了，人们的神经也紧张了，这在上上下下的每个人身上都是如此。清油工人们还没有得到奖金，工会中传说今年卫生局不可能给他们发奖金了。至于工业家卡莫索呢，他打算这一天上几家银行去要求借款，以便给工人们发放奖金，因为他们正威胁着要占领工厂。由于这种担心，他便作了一次绝望的尝试。

他把方向盘转到顶头，把汽车一侧的轮子开上人行道，这样便可以从停着的卡车旁边开过去。但是他在开过去之前，忍不住向卡车司机骂了两句。他把脑袋伸出窗外嚷道：

“垃圾！卡车里的全是垃圾！”

卡车司机还来不及反应过来，他的笨重的卡车也无法追赶上去。这一点，那位恼火的轿车驾驶员是估计好的。可是十分遗憾，就在这当儿，一个清洁工人头顶着垃圾桶走了过来，他的双臂象一个篮球运动员那样轻松而准确的一动，满满一桶垃圾便从后窗倒进了万里安特轿车。

卡莫索感到车窗玻璃一震，他立刻想到：保险公司会赔偿的。可是当他回过头来一看：这根本不可能得到赔偿。荣誉是无价的，这位工业家觉得自己的尊严受到了侮辱。

一桶垃圾倒在铺着地毯的崭新的车厢里，满车发出污秽、腐烂的臭味，撕碎了他的心。

他停住车，跳下车来找那个工人算帐。这个工人很年轻，身上肌肉发达。但这位工业家也并不因此而怕他；他要叫人逮捕这个工人，虽然他的体格强壮得吓人。他要教训这个畜生，虽然这将会花费他一个上午或整整一天的时间。可是那个倒垃圾的家伙却非常狡猾，他装出无辜的样子睁大两只眼睛，张开双臂恳求道：

“请您原谅，先生。桶滑下来了，实在对不起！”

他又招呼同伴：

“小伙子们，到这儿来！这儿出事了！”

卡莫索被四个巨人围了起来，他们的眼神坚决，嘴边带着讽刺的笑意。卡莫索既觉得害怕，又觉得忿恨。他又钻进了汽车，可是那些人的笑声实在叫他受不了，好象他们在他脑子里注射盐酸似的。他从套子里拔出手枪，又下了车去找那几个工人。他朝那个向他车里倒了垃圾的工人开了枪，看见他倒了下来，好象滑倒在地，一动也不动。卡莫索被打翻在地，人们用脚踩他，用垃圾桶撞击他的脑袋。然后他们把受伤的工人抬进驾驶室，把卡莫索的身体抛过后面的车斗。司机开动压缩铲，垃圾车便把工业家卡莫索吞噬了。

警察被惊动了，一辆广播巡逻车全速从贝尔格拉诺大街开了出来，追赶往南逃窜的清洁车。到了独立大道，警察追上了卡车。在圣胡安大街的交叉处，巡逻车赶到前过去挡截卡车，可是卡车一点也不减速。据目击者说，道奇卡车不但没有刹车，反而加大油门，以更大的力量朝警车冲击过去。结果是：从被压扁的车身里抱出了三具尸体和一个重伤者。卡车继续往南逃跑，别的巡逻车也追赶上去。两辆警车赶上了卡车，用手枪和冲锋枪朝卡车射击。结果是打死了四名行人，卡车由于有钢结构的保护，因而得以继续逃跑。这时传出谣言说，由于政治和工会的原因，已下令逮捕或枪击全体清洁工人。这个消息立刻被一家乌拉圭电台予以广播，于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各条街道上的所有清洁车都迅速开往南区的垃圾场。二十辆，五十辆，三百辆清洁车从全市各地开到了这里，塞满了阿尔科塔塔街道。这些卡车在风暴俱乐部的运动场上，在附近的垃圾场和在高于帕特里西欧斯区的煤气塔周围构筑起堡垒，组成战斗队形，发动机开动着，准备用其牢固的铁甲向对方冲击。警车不敢向它们靠近。这时，卫生局的工人代表会议宣告，工会先后遭到政治寡头和警察不正当的枪击，因此决定举行无限期罢工。而市政当局也举行会议，听取市长讲话，他眯着一只眼睛，向报界代表们说，最聪明的办法是先过了这几天节日再说，而让罢工在这几天腐烂夺。

新年的节日过去了，大家知道，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这几天是要大吃大喝的。在所有的角落堆积起了一座座由节日剩余废料形成的小山。上面下

令焚烧这些垃圾堆，可是垃圾堆的燃烧效果不佳，一个个火堆冒着浓烟四处弥漫，发出比垃圾还要难闻的臭味。

这样人们看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垃圾的质量是不可摧毁的，而且其令人奇怪的特点是按几何级数增长。于是惊慌不定的市政当局跑去找武装部队商量。军队拒绝出动清除垃圾，因为他们认为这完全是民政方面的事。另外，众所周知，近几个月正在酝酿着军事政变，因此，这不是把军队提前拉到街上去的适当时候，而且又是去执行这样一次既劳累又不体面的差使，那更不行了。空军司令部被邀请去轰炸叛乱的清洁工人们的堡垒，但是它宣称，由于浓烟笼罩全城，要采取任何空中行动都是不可能的。至于海军的官老爷们，他们正在全国各地的疗养院里度假。

由于没有力量，当局只好求助于法律。颁布了一道法令，禁止在临街的大门口倾倒垃圾，违者将遭拘禁而不是罚款。可是这道法令很少执行，因为谁也不把垃圾倒在自己家门口，而总是倒在邻居的家门口。于是又颁布了几道更加严厉的措施，结果却引起了商业上的异常反应：几天之内商店里的花纸、彩色纸条和其他包装礼物的用品都被抢购一空。大家都满面春风、带着五光十色的包裹和精致的篋筐走出自己家门。毫无例外，里面装的都是一样的东西：垃圾（他们用无名氏或假名字寄送朋友或家属人说实在的，谁也不把自己的垃圾留下，而是同别人的垃圾搅在一起。结果，发生的事情与市长的估计恰恰相反，不是罢工，倒是整个城市开始腐烂起来。于是决定派一名官员去和罢工的清洁工人举行谈判，可是他带回来的消息却令人十分不安。清洁工人们已经不认为自己是清洁工人了。罢工者所占据的地区清扫得油光发亮。过去这个地区是城市中的一个垃圾场，现在不是了，它倒成了巨大的垃圾场中的一个令人神往的地区了。聚集在这个地区的清洁工人是如此之多，他们只要认真地履行其职业，一天干一个小时就够了。其他的时间他们都用来思考。

“就是说，他们开始后悔了？”市长抱着幻想说。

“不象是这样。”派去的代表懊丧地说。

“您把城里的情况告诉罢工工人了吗？”

“他们无动于衷。他们说他们在工作中早已看到，垃圾每天产生着更多的垃圾，太多的垃圾，尽是垃圾。现在他们拒绝清扫垃圾，他们说已经太晚了。”

由于垃圾山堆得太高，便开始崩塌。垃圾象洪水一样沿街往前流动，一路上把它所遇到的一切东西又都变成垃圾，即使是纪念碑、交通灯、行人、视察员或市内任何别的东西都难逃此厄运。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居民都呆在家里不出门。虽然这样恢复了健康的家庭传统，值得大书特书，但是从此家里的垃圾也象大街上的垃圾一样增加起来。两道垃圾的洪流通过门窗会合在一起，发出一阵可怕的吼声。两道垃圾的吻合使得新的再生产的周期提前了。于是禁止印刷报纸和刊物，因为印刷的纸张总是占垃圾中体积最大的部分，而且我们已经看到，它还为垃圾的走私充当包装和打掩护。这一对新闻自由的限制在国际上引起了震动，国际新闻协会的抗议电报雪片似的飞来，堆成几吨纸张，几乎覆盖了市府大厦。

这时出现了一位长者，身上几乎只披着一块破床单。这位云游者或预言家站在冒烟的垃圾山之巅，用手指向西方。人们从来不知道他说了些什么（如果他说了些什么的话），但此后人们便排着长队离开这个城市。高级官

员为了表示抗议而点火自焚（就象越南的和尚那样），但结果也只是用他们的尸体增加了垃圾的种类和臭气，并不能阻止市民的大规模迁徙。

当人群在城外从广播塔前面走过时，听到了最新的官方消息：“正当经济恢复时期，首都人民愉快地外出旅行度假……”播音员的声音中断了，最后是一阵令人心酸的沉寂，而在这当儿垃圾把广播塔完全覆盖了。数道胶状的潮流汇合起来，又转回去，象盘旋的蛇一样吞噬了自己。放眼望去，无边无际，只见一股粼光闪闪的力量吞噬了逃亡的人群，抹去了城市的痕迹。出现了一片纯净的荒芜的平原--正象罢工的清洁工人们所期望的那样--等待着布宜诺斯艾利斯重新兴建。

跳伦巴舞的玛露哈

那个加利西亚人把下巴一抬，指着那一伙人对我说：

“他们就是玩杂耍的。”

那四个人穿着破旧的衣服，和小狗穿的鲜艳的玫瑰色衣服恰成对照。

这几年，要说玩杂耍，那就是指古巴社会的最下层了。在哈瓦那，一个乞丐也比满街转的玩杂耍的要强得多。所以咖啡馆的侍者用轻蔑的神气指指他们，但是我的情况却和这位饭饱衣足的加利西亚人不同。饥饿象螃蟹一样在腹中咬噬着我，而我的最后财产就是提包里的两本书和一件衬衣，这也给我今天早上丢在公寓里了，现在我连象个行李样子的提包也没有了，而没有这个我就进不了学生公寓。

于是我走到那张桌子前面，向玩杂耍的人打招呼。他们给我让出了一点地方，我挪过一张椅子坐下。他们什么也没有请我吃，我也什么都没有要，我们都是身无分文。虽然他们连一口咖啡、一杯凉水都没有喝，可是他们的表演却获得了很大成功，并且计划着到内地去作一次成功的巡回演出。

他们中最年长的一个是他们的领班，他摇了摇系在小狗脖子上的皮带说：

“这是我们的精彩节目：跳伦巴舞的玛露哈，是这个戏班子，也许是全古巴最好的节目。你会表演什么？”

“我是个艺术家。”我拉长声音回答，可能是出于谦虚和饥饿：这是在我一生中常常伴随着我的两样东西。

“你会干什么？”领班又催问我。

“哑剧，我是演哑剧的。”

“你公开表演过吗？”

“当然。”

“在哪儿？”

“在学生联欢会上。”

“啊，是学生！告诉我：你能请我们喝点酒吗？连咖啡也不行？只是这一回，为了庆贺我们的合作。”

我断然地摇了摇头，于是他们都失望地看了看我。我想告诉他们我的节目怎样受到欢迎，我的瘦削的脸、凸出的眼睛和紧闭的嘴巴怎样引起阵阵

笑声，可是我什么也没说。

归根到底最要紧的是节省精力，我和他们都饿着肚子哩。

“我把提包和钱都丢在公寓里了。”我说这话的声音是如此之低，以致谁也不信，他们都笑了起来：

“你不去取你那个漂亮的提包了？”

我又摇了摇头。

“那我们走吧。”领班说道，他从桌子下面拿起笼子，里面装着小狗。

“要当心玛露哈，”老头对我说。“它值大钱啦。”

确实如此：小狗穿着美丽的衣服，有一只漂亮的笼子。而我们却什么也没有，只有一只原来装糖的麻袋，里面装着锅子，由一个人扛在肩膀上。

老头是领班，他走在头里，我们跟在他后头。在维也纳加斯大街有一辆从乡下运菜来的旧卡车在等着我们，我们就在那里上车出发。

开车的家伙就是我们的承包商。

“我们被雇到一家咖啡馆去。”老头一本正经地对我说。

我肚子饿，同行的人也是如此，所以我们一路上谁也不说话，尽可能节省热量。这时，卡车离开了通向马坦萨的公路，开上了一条土路，最后在一条七高八低的路上跳动起来。

我们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已是晚上了，正好赶上演出。那家所谓咖啡馆就是卡车老板的商行的后院，有几张桌椅围着中间的一块空地。观众倒不少，可是都和我们一样穷。

他们大概也和我们一样饿着肚子，因为我们进去时他们都毫无动静，既不惊讶也不奇怪，好象我们是老相识或者是一家人似的。

桌上有啤酒和汽水。带我们来的卡车老板一桌一桌地收钱，然后吩咐我们开始表演。

我们的三个人在桌子中间的空地上弹簧似的跳起来，轻如羽毛般的做了几个腾空翻。我还等着看别的更好的节目呢，他们却上气不接下气地停住了，开始讲起笑话来，最后又扮演小丑，互相打耳光。

“喂，”领班时我说，“该你了。”

我和其他人一样穿着衬衣，只用领班带的一点滑石粉涂了徐脸。我没有从照亮空地的三盏灯中间跳进去，而是慢慢往前走，在黑影中曲着身子，边走边伸长身子，象是橡皮人似的，到灯光照亮的中央时便象一根木桩似的竖立着。这时，我象木偶般直挺挺地鞠了个躬。这个表演以前在学生联欢会上总是受到热烈的欢迎，可是这里的观众却象夜间的动物似的坐在黑影里一动不动，对哪一个节目也不鼓掌。

接着我又表演椅子功。我把椅子放在院子中央，开始表演哑剧。这把椅子好象是石头做的或者是针牢在地上，我怎么也搬不动它。先是轻轻一推，椅子纹丝不动。接着我就逐渐加大力量，直至让人感到我连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但椅子还是一动不动。这一回我表演得很出色，部分是因为我想要露一手，也因为我饿得没有气力了，所以我假装使劲演得很自然，汗水都把衣服湿透了。最后我抓住椅子表演倒立，两脚朝天。接着，当椅子看来是动不了的时候。我突然飞起一脚，把椅子踢向空中。

然后我表演举重，这是我表演滑稽戏的特长。举重担是假想的，但这一回我的失望却是真实的。汗水模糊了我的眼睛。表演时我突然一屁股坐在地上，手里假想的举重担依然在握，我挣扎着站了起来，又跪倒在地。最后

我成功了，把举重担高高举起。吃了这么多苦头之后，我把举重担抛向空中，好象它一点重量也没有。

我的表演结束了，但不知观众是否喜欢。其实，这时我近无所谓。我的饥肠咕咕直叫，好象所有吃饱了的观众都在我肚子里鼓掌。

“下去。”领班吩咐我。

我手里拿着帽子，一张张桌子走过去，但谁也不扔一个比索，连一分钱也不给。

于是老头失望地喊道：

“现在，玛露哈表演伦巴舞！女士们，先生们，请往前看！”

观众都离开桌子，拥向准备让小狗表演的板子前面。

玛露哈穿着饰有花边的衣服在笼子中出现了。领班从袋子里拿出沙球，曾表演小丑的伙计们唱起了伦巴舞曲。

“现在玛露哈听见帕腔加舞曲的调子笑了。”领班大声嚷道。

小狗的确露出了牙齿，但并不是出于快乐。我们替老头的诡计打着掩护，他在笼子的金属板底下点起一盏酒精灯。玛露哈两脚着地，为了不受烤灼，便不断跳动，并摇晃身体，连它的衣服也随着伦巴舞的节拍飘动。

酒精灯灭了，玛露哈还继续在跳，乐师们也延长了伦巴舞曲的演奏。而我却听不见音乐的声音，因为我的饥肠咕咕响得厉害，小狗的跳跃也不引起我的兴趣。这时我倒想高高兴兴地在一口热锅上跳舞，以换取一碗饭菜。真正要紧的是观众最后笑了，为跳伦巴舞的小狗鼓了掌。领班拿着帽子讨钱，这时一枚枚钱币投了进来，发出的叮步响声象是久旱逢雨的水滴声。

观众做了，只有我们和卡车老板在一起。

“您有吃的吗？”领班问。

“我可以卖一点从哈瓦那带来的大米和肉给你们。”

“好吧。”

那家伙数了数钱，便拿来一包大米和几块肉。我们就在后院架起火；谁也不议论演出的情况。我们大家--包括那条小狗--注意力都集中在锅子上，锅子里已经开始喷出热饭的诱人香味了。我们围着锅子蹲在地上，不用盘子就吃起来。领班因为是头头，他使一把汤匙，所以吃得比别人多，因为我们其他人使的是叉子。我们都直接从煮着的锅子里捞着吃，锅里最后剩下的是最好的，因为大米已经煮熟了。玛露哈叫个不停，直到把它从笼子里放了出来，它也和我们一起吃。说实在的，它完全应该享受这种待遇，不仅是大米饭，而且还有肉，因为正是它的舞蹈拯救了我们大家。

第二天晚上的第二场演出，没有观众了，卡车老板拒绝赊一顿饭给我们。

“你们的表演观众不喜欢，我有什么办法呢？”承包商辩解说。

“起码您把我们从陷井里弄出来，本来是您把我们投进去的。”领班要求道。

“现在我不回哈瓦那去，”卡车老板说。“明后天我带你们到基内斯，你们就留在那里。”

我们把大米都吃光了，也没有钱再买了。领班是这么对我们说的。我们整天在村子里转，想弄到一点东西，但毫无结果：很显然，这些农民跟我们一样贫穷。

晚上我们又聚集在后院里。卡车老板关上他的商行的门，同他的老

婆关起门来睡觉了，他的食物也关在屋子里。要向他弄一块面包或一片奶酪，根本休想。

我们躺在地上，有些人垫一块毯子，而领班躺在麻袋上（不让人检查袋子）。我想睡，但睡不着。胃已经把上一顿饭的最小微粒都消化掉了，肠子又搅动得难受。正在这时，我看见一只火鸡，在月光下白得象一条船，这种火鸡是可以烤着吃的。它伸着脖子穿过院子朝前走来；我还以为是饿昏了头在做着梦哩。我在身上拧了一把，觉得痛，于是又拧了一把睡在旁边的领班。

“你看，”我对他说。“不是火鸡吗？”

老头也以为自己是在做梦。那火鸡真象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礼物。那实在是一只漂亮的火鸡，而且更妙的是后面还跟着三只和它一样雪白的小火鸡。

领班轻轻一声唿哨，大家都从地上跳了起来。我们知道该怎么办，两个人朝火鸡跑过去，抓住它的脖子，然后抓住两只腿往开一撕。其他人向小火鸡跑过去，抓住它们，不让它们叫起来。我们饿得发慌的双手足以消灭可能把老板或他的老婆吵醒的任何声音，那几只火鸡就在我们手里不声不响地了结了。我们一切都干得悄然无声：拔去了毛，挖出了内脏。领班把用来烤灼玛露哈笼底的所有酒精都倒了出来，燃起几根树枝，就地把火鸡烤起来。一面我们又掘了个坑，以便把火鸡的羽毛、内脏和头，以及那三只无辜的小火鸡一起埋进去。这可以称得上是第一流的墓穴。我们堪称是一批饥饿而天才的艺术家，我们的功绩在于迅速把火鸡变成了烤鸡，同时又不留下一丝一毫的罪证。

天亮以前我们吃起烤鸡来。烤得还不熟，而且又没有盐。但我们不声不响地嚼着，眼睛在黑暗中象野兽的眼睛似地闪耀着。小狗在笼子里吠叫，但谁也想不起它。我们唯一关注的是把所有的残骨都扔进刚才挖好的坑里，并把余烬也扔了进去，盖上土埋好，又小心地踏平。小狗仍叫个不停，一定是肚子饿了，所以我藏了一块肉在口袋里。

“我们照样睡觉，只当什么事也没有发生。”领班吩咐说，我们就都躺下了。天大亮了，听见老板嚷了起来，镇上的巡查手里提着枪跟他在一起。

“这些玩杂耍的人偷了火鸡！”

我们装睡着了，但巡查使劲用枪托敲我们的背，问道：

“谁是头儿？”

“我是领班，”老头不慌不忙地回答说。“这些人是我的演员，笼子里是跳伦巴舞的玛露哈。我们都是艺术家和正经人。”

“有人告发，丢了火鸡和小鸡……”

这时我插了嘴，而我认为我做得一点没错：

“是不是一只白火鸡？”

“是白的。”老板跳起来说。

“还有两只小鸡是不是？”我装着大傻瓜继续问道。

“是三只小鸡！”老板抢着说。

“三只也好，四只也好，我没有数，我正在睡觉呢！它们走过这里，往那一边去了。

也许它们看见生人受惊了，而且小狗又直对它们叫。它们从那边走了。”

“我们上这几家去看看。”巡查对老板说，又用枪指着我们威胁道：

“在我们回来之前你们都不许动！”

他们走后，我们决定继续睡觉，以表明我们于心无愧。可是小狗一直叫个不停。我上前打开笼子的门，把我藏在口袋里的那块肉放在地上，马露哈立即把肉吞了下去。火鸡的痕迹已经一点没有了，我仔细看了看地上，连一根毛也不见。我们在黑暗中用艺术家的手把地面收拾得干干净净。于是我又躺下，并且睡着了。

我很快醒来，心里蹦蹦直跳，好象梦见我从树上掉下来似的。但这一次从梦中醒来却一点也不轻松，恶梦不在梦中而是在现实中发生，此时此地，跳伦巴舞的玛露哈正在地上使劲刨着。它一边哼叫，一边露出巫婆般的牙齿，好象它记起了领班在它笼子底下点燃的火。难道它不明白我们当艺术家的总是要受点这样或那样的苦头的？

那条可恶的狗诚心要叫我们完蛋，它竟用嘴把火鸡的内脏从地下拉了出来，并衔着肠子满院子转，血污的鸡毛也四处飞扬。

我向小狗喝叫了一声，大家也都醒了来。

“妈的！”领班跳了起来，扛起麻袋就往外面跑，连玛露啥也不要了，把我们大家也撇下不管了。

我们跟着领班跑了出去。当我们赶上他时，他叫我们停下。

“大家分开跑！”他嚷道，说完就掉头跑了。

这时我感到茫然不知所指。没有领班，什么也没有，我独自朝着太阳升起的方向跑去，以为在这一边古巴可跑的地面更长一些。跑累了，我产生了一个可悲的想法；我第一次作为专业艺术家的演出，就这样无可挽回地告吹了。

旋涡

“旋涡是钓鱼的最好地方，”贝托对她指点着说。“看来是危险，但其实最安全。”

贝托抓住她的胳膊或衣服，防止她滑到河里去。

“你把钓竿往那边投。”

爱美尼希尔达一心想钓到一条财鱼或别的鱼，听凭贝托的手滑过她的胳膊，伸向胸前。要紧的是钓到鱼。如果她拿着鱼回家，妈妈会高兴得笑起来，父亲回家也会高兴。

当大家闻到香喷喷的红烧鱼味时，那真美极了。但如果两手空空地回家，就不好了。

“你跟贝托那个浪子在一起？”母亲责备她。她总是跟贝托在一起。有时当他们一起钓鱼时，她让贝托的手在她身上抚摸，或者当他们在堤上观赏河中的旋涡时，她让他扑倒在自己身上。堤上长满松软的小草，躺在那里令人心旷神怡。可是贝托从来不告诉她，他把她带到这儿来是为了玩弄她，而只是对她说：

“哪里有旋涡，哪里好钓鱼。”

在这个城市里，在火车站、广场和有些街道上，也有旋涡。人群同河

流一样是一个密集物体，看不出他们具有的肉体与思维。可是突然间这个密集而改观的人群走进了一个旋涡，随即旋转起来，在其旋转的运动中，它准许人们卷入，并和别人发生无关痛痒的联系。

旋涡使人离开其盲目的奋斗。他犹豫一瞬间，便被火车站吞没了。那时无须装出一副笑脸，只要眼睛微微一眨，嘴巴微露一丝笑意就可钓着鱼了。旋涡会带来鱼群，但稍有不慎，也会发生死亡。在这个城市里，危险的是招引人家注意。人的旋涡带来零散的人鱼，干瘦的鲸鱼或肥嫩的巴古鱼，但也带来多嘴的爱敲竹杠的警察，他们查问一番就不见了。最糟糕的是年轻人，他们怀着强烈而有害的好奇心，一味寻求和素不相识的人搭讪。应该好好加以选择，而十一号广场上的旋涡却把一群尖嘴的鱼和穿裤子的鱼搅杂了。

一个家伙提着公文包出现了。她向他打个招呼，便停下来看着玻璃橱窗。那人转过身来站在她旁边。她戴的帽子压得很低，好象要把脸部遮住。

“我们走吗？”她提议道。

“附近有便宜的地方吗？”

“拐弯就是。”她带着他穿过旋涡。

他把公文包住椅子上一丢，发出铁器的撞击声。

“你不会带着武器一类的东西吧？”

“那是工具，”男人回答，并又骄傲地说：

“我是技师。”

“哪一行的？”

“电视和整个电器这一行。”

“你挣的钱不少，是吧？那你该送我一件好礼物(口罗)？”

男人给了她一张一千比索的钞票。她把钱放在床头柜上，还要。男人又给了她一张票子。

她闪电般迅速脱去衣服，只穿着白色的短裤和乳罩，这更突出她深棕色的近乎黑色的身体。男人仔细地端详着她，她脚大腿粗，幼年时是打光脚并且经常走路的。她的两只黑色的眼睛闪闪发光，象是两只不驯顺而警惕的小动物。那副眼神和她丰满而平静的身体互不协调：那副眼神就是一条宽阔而平静的河中又黑又深的旋涡。男人估计她是从远方来的。

“你是哪儿人？”

女人对这样的问话很不满意。她认为，把她看作外乡人是瞧不起她。

“就在附近，我是圣塔菲人。”

她本来可以说是查科人或福莫萨人，这样更准确些。但她愿意就这么说，她喜欢说她是圣塔菲人，这样比说是查科人更高雅些。

男人呻吟着，要她吻他。她推开他的嘴，站起身来，把两张钞票塞进皮包里。男人用被遗弃者的目光望着她，感到不快。

“那么你是外地人，是吗？”

女人不回答。她把两张钞票塞到皮包底部。现在这是我的了，就象我的身体和我的嘴巴一样，这一切我都带走。让你一个人去，比刚才我遇见你时更加孤单，垂头丧气，口袋里少了两千比索。

男人热切地望着那女人，想要留住流逝的时光。他突然发现了那女人的丰满和诱人之处。但旋涡在迅速转动，在那黑女人的机械般准确的动作面前他感到无能为力。她很快地套上乳罩，穿好衣服。房间里由于她的存在而显得光亮起来。

“你叫什么名字？”男人问道，徒劳地企图止住正在吞没他的旋涡。

她一面穿鞋，一面告诉他，她叫尼莉或贝蒂。随便哪个名字都一样，这跟她粗壮的腿和棕色的肉体没有关系。在她离开以前，她正象太阳一般照亮着房间。男人想，是那女人的白色的内衣使他产生了这样的印象，那上面没有一点装饰，一色素白，宽大而饱满，象是船上的帆。

最后，女人穿上花外衣，把皮包夹在腋下，催男人道：

“你快穿好衣服，我们走吧。”

那家伙不满地看看她，说：

“你是暗娼，哎？”

暗娼，黑皮肤的暗娼，象蠕虫一样从土地中爬出来，带着土地的颜色，抱着邪念要夺取城里白种男人的安宁、财富甚至健康。

“暗娼，哎？”

她是隐蔽的惯偷，两脚沾满内地的尘土。

这位城里的男人是清白，高雅，富有而热情的。他所在的城市在暗娼带来虚伪、掠夺、社会苦恼以及一切和她的肤色一样阴暗的东西以前，曾经是一座汇集着全世界的神圣品德的殿堂。现在她把两张钞票塞好在皮包里，穿好紧身的花色外衣，准备离开那里了，她那两只闪亮的黑眼睛象是夜间活动的动物。也许她得过什么病。为什么不会呢？暗娼，黑皮肤的暗娼，身上和心里都是土地的颜色。一个想要象小偷一样逃跑的暗娼，她一定是个小偷。

“我们走不走？”

出门时她想挽着他的胳膊，他们进旅馆时她就是这样挽着他的胳膊的，但这一次他拒绝了她。

“为了打掩护，”她坚持说。“这儿常有警察，你知道吗？”

她正要这样呢，让警察来审问他，把他投入监狱。让大家都看见他在大街上挽着那个黑皮肤暗娼的胳膊。

“我们在这个拐角分手吧。”

他加快了步伐，她象是被他牵着似的跟在后面，直到看不见他为止。一切都很快地在旋涡中消失了。这个飞速的运动真叫人头晕。

在布依雷东咖啡馆她看见一张桌子刚刚空出来。这是家庭专用的单间，不然她还不敢进去呢。布宜诺斯艾利斯教会了她要小心谨慎，千万不要抛头露面。一个女人走进一家坐满男人的咖啡馆是不合适的。但在家庭专用的单间里却是另一回事。男人们可以从一扇屏风上面看到她，也许他们还互相交换眼色呢。

那个棕色女人要了一杯牛奶，她要很热的，而且要有地方风味，这使侍者觉得好笑。

她喜欢来这一家用经过装饰的金属架搭起来的咖啡馆里喝牛奶。她几口就喝完了，便坐在那里等着。她看见窗外大街上的旋涡在转动。她想再出去转一二圈。喝了牛奶如同喝了暖酒似的增添了信心。她不象前几次那样担心回到自己住的镇上太晚了，这一次决定回家前再转一圈。她走了许多路。十一号站上的旋涡从布依雷东大街卷到了科连特斯大街，又从里瓦达维亚大街卷到了国会大厦。钓鱼的旋涡在全城，在她回家的路上转动着。

鲜花广场上的旋涡，到了林内斯大街就以更大的规模和更快的速度转动。这是在潘帕斯平原的夜晚，在这个由东向西伸展的城市中，由人群和灯光组成的旋涡。那个女人在风味小吃店吃了一块点心，喝了一杯葡萄酒，然

后乘公共汽车到了贝利托大街。她在通往埃赛萨机场的高速公路的交叉口下了车。高塔上聚光灯强大的桔黄色灯光照亮着这一片地方，这种灯光比郊区的黑暗更为危险。高速公路上的汽车和卡车呼啸着疾驰而过。女人加快步伐，想躲到有黑影的地方。公路上一辆亮着前灯的汽车拐了个弯，很快开了过去，随即折回来，又急速开上了高速公路，“嘎”的一声，车子在女人身旁停下了。这是一辆乳白色菲亚特汽车，里面坐着两个蓄长发的小伙子。

“你在这儿干什么？”

“回家去，”她说道，一边继续往前走。

“站住！”开车的那个人喊道。他是个胖乎乎的家伙，穿着花衬衫。另一个是瘦子。

“我要是不愿意站住呢？”

“你最好还是听我的话，”胖子接着说，“你看，我们的汽车会压死你的。”

“家里人在等着我呢。”

“让他们多等一会儿吧。”

她停住了脚步。

“你看怎么样？”胖子问道。

“黑人没多大意思。”另一个尖声尖气地回答。

“我可喜欢。”

“我们不等别的人了？”

“他们不来了。大概他们没有弄到车。”

“我们约定十二点以后碰头的。”

“可是现在已经快三点了。我跟你说不来了。下次再说吧。”

那女人想从一边逃走，但胖子跳下车，一把抓住她的胳膊。

“别跑。我需要你，你就留在这儿。你怕什么？别装腔作势了，陪我一会儿再走。”

他转过脸去对他的同伴说：

“你把那东西给这黑女人看看，让她学学。”

那另一个人的瘦削而苍白的脸探出车窗，三个人的眼睛盯住那支在高塔的桔黄色灯光照耀下闪闪发亮的手枪。

“我早跟你说过，你最好听我的。”

他把女人从后车门推上车去。

“好吧，”她表示同意，“但你要快点。”

她脱下衣服，把皮包裹了起来。她担心那两个家伙会抢走她的钱，正好这一天晚上她弄到的钱比以往要多。

“你丢下这个臭黑人，我们上泛美公司去。”瘦子生气地说。“我想他们在那里等着我们。”

“我们约定是在这儿，我不走。”

“你放开这个贱货，”瘦子要求道。“她不是供我们玩的。”

“她不是供你玩的，”胖子笑起来。“这一个不是，别的谁也不是。”

“昨天你跟我谈话不是这个样子。我给你搞到了钱，今天又搞到了车子。”

“你为什么不下车去舒展一下呢？”

“你要把我从我的车上赶下去吗？”

“你在旁边我没法干。至少请你闭上嘴巴。”

瘦子向后座探过身去说：

“把这黑人丢开，不然我就崩了你。”

胖子转过脸来，看见瘦子的两眼在狠狠逼视着自己，眼珠象两个玻璃球，手枪在他手中颤动，他大吃一惊。

“把那东西收起来，你这个笨蛋。你是不是眼红啦？”

“我不收。你们都下去，不然我就把你们两个都毙了。你把衣服还给这黑人，叫她快走。”

“皮包，”那女人喊着索要。“我要我的皮包，强盗！”

“下去，”瘦子对她说。“拿起你的衣服。你不害臊吗？穿上，快走，走得远些。”

可是那女人站在汽车旁边，伸着手，嚷着还她皮包。于是瘦子朝她开了两枪，她慢慢地转过身，双膝跪下，倒在柏油路上。汽车开走了，很快开上高速公路：这是围绕那个棕色的丰满的女人呼啸的（最后一个）旋涡，她象一滩油渍似的躺在柏油马路上，桔黄色的聚光灯守望着她的身体，直至天明。

